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3

1976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 经济问题 •

- 经济发展的两条路线 叶伯乐 (1)
- 对中国经济政策的探讨 [西柏林] 喻钟烈 (4)
- 退回到利润的老路上去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修正主义的发展
..... [西德] 菲利浦·瑞曼 (17)
- 新的经理 [西德] B·K·卢德茨 (40)
- 七十年代苏联经济展望概述
..... [美] 约翰·P·哈特 (42)
- 修正主义的垄断阻碍了技术的发展
..... [新西兰] 《人民之声报》编辑部 (53)
- 现代经济学的动向 [日] 浅野荣一 (56)
- 汽车制造业和汽车工人 [英] 赫·贝农 (64)
- 大城市在消瘦下去 [美]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71)

• 国际政治问题 •

- 苏美海上争霸 (78)

印度洋和海湾地区的军事均势……〔日〕浦野起央（80）

东地中海——世界强国的支点

……………〔英〕内维尔·布朗（89）

超级大国在欧洲水域的争夺

……………〔美〕《号角》月刊编辑部（96）

索马里和苏联在印度洋的活动

……………〔美〕丹尼斯·查普林（99）

亚速尔基地在控制大西洋中的战略地位

……………〔美〕《前卫》周刊（104）

小资料

印度洋沿岸各国的海军……………（106）

*

*

*

骂街世家……………岩文（107）

骂街杂谈……………〔苏〕尤里·伊瓦金（109）

*

*

*

对马之战……………〔美〕诺埃尔·布希（111）

东帝汶的独立和革命……………〔日〕鹤见良行等（133）

蒙古建国五十周年……………〔美〕W·R·希登（142）

◀ 三月二十五日出版 ▶

经济发展的两条路线

叶伯乐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迎头痛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广泛深入地展开。由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中，有一股是所谓“经济台风”，妄图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刮到资本主义经济的邪路上去。本刊这一期发表的外论，一篇是谈中国经济问题的，题为《对中国经济政策的探讨》；一篇是谈东德经济问题的，题为《退回到利润的老路上去》。把这两篇文章对照阅读，并同那股右倾翻案风加以联系，颇能发人深省。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东德应该说是一个工业现代化的国家了吧？它不但有希特勒德国遗留下来的工业化的雄厚基础，而且又在这个基础上干了三十年，当然是很现代化的了。而在旧中国，现代工业却少得可怜，遗留给我们的只是“一穷二白”；经过解放二十多年的努力，面貌虽然有了很大改变，但也还只能说是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离开现代化的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可是奇怪得很：那个高度现代化的东德却越搞越糟；而并不那么现代化的中国则越搞越好。单是这一点，就够人们深思了。

东德是苏修的势力范围，苏修把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强加给东德人民，因此，尽管东德工业早已现代化了，但是由于在一九六三年按照利润挂帅、物质刺激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实行了所谓“新经济体制”，到一九七〇年就发生了“经济严重失调的

危机”，以至于市场上连牙刷也买不到，更不要说其他日用工业品了。在东德的企业里，“可以不靠增加生产，而靠公开或暗中提高价格，用损人利己的手段多赚钱”；因为利润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核心”，是“灵丹妙药”。生活在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下的东德劳动人民的苦况，是可想而知的。工业固然现代化了，而劳动人民却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如果说，无产阶级追求的是这样的现代化，那和拿绞索往自己头上套又有什么两样？马克思早就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6—477页）。今天的苏联及其控制下的一些国家，越是现代化，劳动人民受到的剥削和压迫就越重；那种所谓的现代化，只会加剧“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因而也是畸形的，漏洞百出的。苏联、东德经济一再出现比例失调，都是证据。

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历史已经宣判它走不通了，但总是有人想走。这也是事实。刘少奇、林彪一类想走，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想走，他们摆出架势，吓唬人们说：“四个现代化实现不了，总有一天，我们大家全部完蛋。”好家伙，真是世界末日将临，天就要塌下来了。可是，怎么实现“四个现代化”呢？他们的答案尽管各式各样，但归根到底是取消阶级斗争为纲，搞利润挂帅，搞物质刺激，搞管卡扣罚，搞专家治厂这一套。这条现代化道路，苏联以及东德这样一些国家不是正在走吗？《对中国经济政策的探讨》一文的作者，远比刮右倾翻案风的人高明，他说：“中国虽然穷，但强调的不是经济第一而是政治第一。中国急需提高生产，但却不为生产而生产。在正确路线受到干扰时须要斗个明白，不惜少产减产。这一点是中国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主要不同之处。”这一段话，除了“不惜少

产减产”不合乎我党实行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以外，都是对的。我国当然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已经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正式规定下来了。但决不能走苏联、东德这样一些国家的路，而一定要走毛主席为我国人民规划的金光大道。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路线，使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壓力，任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风潮起伏，我国经济始终扎实地蓬勃发展。我们要永远坚持这条路线。

为了把这条路线坚持下去，就要彻底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所谓“三项指示为纲”的复辟资本主义纲领，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那股右倾翻案风打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永远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对中国经济政策的探讨

〔西柏林〕喻钟烈^①

“两条腿走路”

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文化大革命后可以说是走上了“正途”。它已找到了规律，有了动力，因此它今后的发展是乐观的、远大的。所谓“正途”就是“工农并举”、“土洋结合”和“群众路线”。规律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必须“两条腿走路”，而推动力就是不断的革命与阶级斗争。

这些话乍听起来似乎在喊口号，在旧调重弹。详细审视，才知道它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在中国获得实践而在实践中又屡受反对、打击和挫折，直到文革后才能彻底在中国推行。由此可见，要认识客观规律是多么不易，认识了以后，要彻底去执行，又是多么的困难。

“两条腿走路”的政策，是基于对立统一的规律，也就是辩证的规律。如果我们说中国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对立统一体，那末，在这个统一体内对立着的正是工业与农业。面对着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统一体，我们可以主观地拟定两种不同的经济政策。简单地说，第一，优先发展工业，不惜牺牲农业；第二，工农并举，互相支援。在选择这两个政策之前，要先考虑中国

^① 作者是西柏林自由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的国情。假若中国是象新加坡那样的国家，农业在全国总生产量中所占比例极小，农业人口又少，不妨先用第一种政策。可是，中国地大人多，农业在总产值中占比例极重（一九四九年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农民至今仍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多，是千万不可执行牺牲农业、优先发展工业的政策。因为这将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去发展工业，那末工业建设的目的又何在呢？要执行这种政策，只有一个可能：中国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国家。这样不仅可以牺牲自己的农业，还可以向外扩张。譬如让东南亚所有的农业国家来做中国工业发展的垫脚石——做原料供应地与工业产品的倾销市场。

中国不采用第一个而执行第二个政策，不仅符合中国的国情，也明显地指出了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对内顾及大多数人的利益，对外防止扩张侵略。因为农业既是工业原料的来源，又是工业产品的市场，有了发达的农业，工业自能稳健地发展，当然不需要向海外扩张了。中国敢说现在，甚至将来都不做超级大国，这是有根据的，不是在唱高调。

可是经济政策是由人制定的，也要靠人来执行。如果人的思想变了，政策也会变。政策一变，经济发展的方向将跟着变，意即第一种经济政策可能代替第二种政策。那末，中国将为此质变：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甚至变为帝国主义国家。这正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基因，而这斗争却事关中国前途以至世界命运。因此中国虽然穷，但强调的不是经济第一而是政治第一。中国急需提高生产，但却不为生产而生产。在正确路线受到干扰时须要斗个明白，不惜少产减产。这一点是中国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主要不同之处，也是很多人，包括国内的人民难于理解的地方。譬如，有很多干部犯了业务主义的错误，还以为自

已勤劳无过。

话再说回来，“两条腿走路”的内容不只是包括“工农并举”。要办到“工农并举”，还必须要有一系列也是一分为二的政策，去配合它执行才能有效。首先要“土洋结合”。譬如农业要用土法炼钢铁、就地生产农具等，不能全部仰仗工业。工业必须大力支援农业，尽量提高农药、化肥、拖拉机……等的生产。既然如此，就得大小各型工厂一齐建立。不能只要洋的、大的，不搞土的、小的。大厂需资金多，让中央去办；小厂便宜简易，让地方去干。那末，办工业就得要有两个积极性：既要中央，又要地方。在中央大厂里用洋法生产得靠专家，在地方用土法办小厂就得靠群众。因而不能只靠专家，不顾群众（土专家）。

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这一系列的政策列表如下，以便看清它们内部及相互间的联系与辩证的关系。



工农、洋土、大小、中央地方、专家群众正是一对对的两条腿，又是一组组的对立统一体。它们既是独立的，又是彼此相连的。而在各统一体内，譬如工农是对立的，却又是统一的。在中国，工农相依，二者不能缺其一。但彼此间又是矛盾的：农业的生产力总是落后于工业，工农产品价格有距离（剪刀差），两者的收入间也有差别……等。可是工农的对立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工业的发展，农业会逐渐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当农业的生产力显著地提高后，工农业之间的矛盾就会逐渐减少；而当城乡差别消除之后，这矛盾就会全部消失。目前的问题在于工业应如何支援农业，农业本身又应如何努力

去达到这一个目的。可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在中国是一个艰巨长期的过程，是不可能一蹴而成的。因为中国工业对农业的依赖性比较强，就是说，农业丰收或歉收可立即影响来年工业的发展；而工业发展情况的好坏又会反过来影响对农业的支援，也就是说影响对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工农业就是这样相反而相成，是如此既对立而又统一的。

工业既然这样重要，就必须全民去办，让它遍地开花。不只在工业部门要办工业，在农村也要靠土法生产工业品。工业本身的发展就是一个从土到洋、从小到大的过程。今天的洋可能是明天的土，土发展下去就是明天的洋。为此，不应小看农村的土法生产。我们今天去中国观光，随处都可以看到极象样的地方工业，它们都是土发展而成的。很多公社的农机厂也是从几个人发展到几十人，从两间破屋发展到宽敞的厂房。一句话，工业的发展就是一个从土到洋、从小到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千百万的农民就地变了工人，土专家成了洋专家，使大多数人普遍地掌握了工业技术。单是它的教育价值和意义，已经是深远而不可估量的！因此大小、土洋、专家群众是对立而又是统一的，也是可转换的，不断地演进的。

再说中央与地方，其道理也是相同的。没有地方何来中央？没有中央又怎成地方？它们两者之间也是既相反又相成的。让地方办大厂这是苛求。如果中央连几个人、几十个人经营的小工厂都要管，那也是多余的，就是要管也管不好。中央与地方应当各尽其力，各用其长。这样非但大小工厂都能办，且动用了两个积极性，调动了两处的人力、物力、财力，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地方工业（包括农村的）有了发展就会购买更多中央的工业产品，尤其是生产资料如汽车、工厂设备、建筑材料、电动机、发电机……等。为满足中国拥有八亿消费者这样庞大

的国内市场的需要，中国工业将发展为世界一流。这是可肯定的。今天中国地方办的小化肥厂的产量已超过全国总产量的六成，小水泥厂过了半数，各省地方造的汽车有三十多种，拖拉机四十多型，这都是可喜的消息。而这些产品又是用于支援农业的，这样工农就挂上了钩，互相支援，终会走上轨道，形成自动的循环。工厂生产愈多，购买农业的原料也愈多。农民收入因此增加，就会更多的购买工业品。农民买得多，工厂必扩大，农民转业为工人的人数也会逐渐多起来。农村人口减少，这又反过来迫使农村生产力再提高，意即买进更多的拖拉机、化肥……等去代替减少了的人力。生产力的提高直接促进农产品的增加，间接使农民收入再往上升。这样农民将有购买力买进更多的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工厂为此必须扩大生产而将购置更多原料……如此循环不已，工农收入差别将缩小，城乡距离会逐渐消失。这不但能解除工农之间的矛盾，且为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铺平了道路。

这虽是远景，但不是幻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正确的经济政策非常重要，否则就会走回头路、走歪路，而这两条路都在文革前走过，文革后才幸好又走上了正途。这是中国之幸，也是世界的好运。要不然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变成一霸的世纪。那末，中国百多年来反帝、反压迫、反侵略的革命都将付诸流水。中国虽富，中国人将再堕落的。

政治挂帅

以上是就经济而言经济，多少有点机械论的腔调。在现实中，任何经济行为都脱离不了人与社会，因而也就离不开政治。我们已经说过，在中国能执行“两条腿走路”的政策，是因

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在此社会中，是没有私有生产资料的。可是，私有制度在中国已存在了起码三千多年，它的影响当然是深固的。在消灭了它二十年后的今天，这影响还经常在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言行。如果不扫清这些遗风流毒，它就会透过人的思想去左右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没有私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里，靠私有观念，如金钱至上、剥削有理、个人主义、升官发财……等去办工业、去搞农业，这一定会矛盾百出的。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同私有思想的遗毒作长期艰苦的斗争。单是铲除私有生产资料，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两点：第一，有私有生产资料就是有符合私有生产资料的思想、看法、言行、道德标准……等。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内容；第二，当私有生产资料经革命被消灭后，属于它的思想却并不会机械地随着消灭。大部分将仍然留在上层建筑里继续的影响人们的看法和言行。换句话说，在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后，上层建筑不会马上跟随着全部转变的。所以还得靠人们自觉的行为(主观能动性)去除旧建新，也就是说要主动地在上层建筑里搞革命。过去二十六年来，中国一方面虽在大搞建设，另一方面却从不停止搞革命，并在革命中去改变人们的旧思想，然后再用新的思想去搞建设，去促进生产。这样，上层建筑就在为经济基础服务了，而稳健的经济基础又再转过来决定上层建筑的内容、改变人们的思想，使它们尽量能符合已存在的公有制。由此，我们又可进一步看到：上层建筑是不会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自动改变的。它的转变还得靠人的自觉行为，靠主观能动性的努力。同时它又是与经济基础发展息息相关的。不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那末，新的思想会变旧，旧的思想会更猖狂。它一旦成为主流就会反过来侵蚀生产

资料公有制，并摧毁社会主义整个的经济基础。在这种情形下，经济也可以发展下去，但发展的方向就背道而驰了——再回到私有制，意即复辟资本主义。苏联就是一个例子。

二十六年来，中国从未停止批判含有私有观念毒素的新、旧文艺、戏剧、绘画等，这说明了中国领导人清楚地看到自觉改变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及正确的思想对促进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抓革命，促生产”）。

但是正确思想只有几个或几百个干部或学者掌握，还是不够的。正确的思想必须普及让人人都能通晓，这才能形成力量。为此，群众路线就非常重要。我们不要只看一面，认为中国搞水利、建大桥，动辄动员人力几十万，这就是群众路线。更重要的是全中国所有的劳动者都在学习，都要搞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要懂得如何在实践中应用。今天几亿中国人这样勤奋地学习，是史无前例的。它不仅对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大的推进作用，且对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发展也有不可限量的贡献。象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古国，能如此认真地学习马克思那一整套科学的社会主义，是东西文化交流中一件大事。其认真之处就在能普及，在讲应用。目前，中国人都在学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去分析事物并掌握其发展的规律，且在实践中用来克服种种困难，征服了灾害，提高了生产，批判了“孔孟之道”，讲清了两条路线斗争。这是了不起的成绩。单是儒法斗争这一项就使很多海外知识分子跟不上了，何况在国内每人还得学点政治经济学、《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等。我们可以肯定，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尤其是工人、农民会有这样的学习机会。我们不否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时会出现曲折、缓慢地发展，也承认这是多少与搞革命有关。但在革命中教育了几亿人民，使他们从旧思想中解放出来获得新的世界观，

学会了当家作主，这是比一年增产一百万吨钢更有意义的。而在一个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里，这意义就更大了。因为在那里，每个人都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们应学会去管理生产，去过问国家大事(政治)，去监督经济核算……要不然公有制就只会有名而无实。只要公有制存在一天，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一个客观的需要。谁不这样做，他就是违反着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也是为什么要不停的反“专家治厂”、反官僚主义的原因。

存在的问题

这样说，是不是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没有了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中国还有很多问题必须解决。因为中国还处于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单是缩短工农与城乡的差距就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同时，思想问题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其所以如此，有下列三个原因：

第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价值范畴如货币、价格、利润、交换价值、消费价值等等，仍有相当的作用并时时刻刻在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言行。换句话说，在过渡时期里，按劳分配、商品制度等，仍将长期的存在，而这些又都必须以货币作为媒介方能畅行。于是，金钱就仍有着一定程度的“魔力”；为钱做事，看钱办事，以钱量事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人和人的关系在很多地方也会多少因此表现为钱和钱或钱和人的关系。在今天的中国，仍有人那样的自私，为自己打算，总想升级多赚点钱就不足为怪了(中国目前仍有八级工资)。就是企业单位、商业机关、公社、大队也因为用货币(价格)核算成本、利润，常会“利小小干，利大大干，无利不干”的。金钱的存在支配着人

们的意识，这就使思想的革命化、世界观的改变等增加了困难。一方面要承认金钱、商品、价值等在过渡时期有存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要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去正确的处理和对待这个存在。对个人来说，他既要承认工资差别即按劳分配的必要，又要经常不计报酬为人民服务，为革命而工作。对企业、公社等来讲，它们既要精打细算去创造更多的利润(积累)，又要不惜工本去支援兄弟单位，为建设社会主义而生产。这些都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真不容易的。

几千年历史过程中留下来的价值范畴，不可能一下子把它消灭是有理由的。譬如按劳分配就要用钱付工资，工农产品交换要以货币作为媒介，工人、农民购买消费品也得照价付钱，还不能按需分配。再有，国家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也得靠价格政策去影响和控制。假如购买自行车的人太多而产量又不丰富，就提高它的卖价使人望价而止。收音机产品充足，就降低它的价格，让大多数人都能买到。为增加农民的收入，政府一面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另一方面降低工业产品的售价，这样也使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逐渐缩短，等等。事实上，农产品的收购价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〇年的二十年中，已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九十，工业品如医药在同一时期内，就平均降低了百分之八十。农民从中获益实在不少。可见，价格和价格政策在今天仍有很大的用处。问题在如何正确地去掌握它，运用它，而不是去消灭它。

但是，价值范畴的存在也正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有了金钱就可能“物质刺激”，有利润就难防某些企业或集体单位不“唯利是图”……而这一切又都会反映在党内政策的制定上，形成鲜明的两条路线斗争。这斗争将长期的存在，直到社会主义获得最后的胜利、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才会停止。因为只有

共产主义社会里，按劳分配将被按需分配取代，那末，商品制度、货币交换等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了。价值范畴也将如其他一切的历史范畴一样一去不复返了。

第二，组成生产力的成份，除工具外，最重要的是人的劳动力。工业愈落后，人力就愈重要。而人的劳动力却不是孤独存在的。它是客观的存在于人们自己的身体内，因此，它又是受人的主观意识所支配的。世界上也只有人才是主、客观合于一体的。因此，人的劳动力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譬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此时，劳动力就是商品。工人在工作时间内对自己的劳动力作不了主，所以他是痛苦的，只希望八小时尽快过去，回家好做“自由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同样必须工作，但他不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了。在工作时间内，他既工作又能参加企业管理，讨论业务，设计产品，甚至进入厂办大学学习（如上海机床厂那样）。因此，工人有热诚，有兴趣，对工作肯卖力。当然，这也不是在革命成功后一蹴而就的，而是渐进的，是经过不断斗争而得来的。这点我们将在第三个原因里作进一步的讨论。

既然人的劳动力是生产力构成的主要部分，那末，要动员劳动力（客观）参加生产，首先就得动员人（主观），而要使动员了的人能积极的工作，就得进一步先提高人的觉悟及政治水平，否则就算有了一大群人也做不好工作的。这样，我们就会更明白为什么在此文开始讨论经济政策时，一再强调思想的重要性的原因了。同时，我们还得进一步去审视人的主观意识及其对劳动力私人占有的观念，是如何受着不同社会制度的影响支配的。简单的说，在一个奴隶社会里，奴隶的人身已属于奴隶主了，他的劳动力当然也百分之百是属于奴隶主的。除了终生象牛马一样地替奴隶主做苦工外，完全不可能自己作主或靠自己

的主观意识去支配自己身上的劳动力的。所以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在封建社会里，情形就不同了。农人租了地主的的地，除交租外，还有一部分产品是自己的（譬如百分之五十）。那末，他的劳动有一半是属于地主，另一半则是属于自己的。可是，在佃租过高和劳役很重的情形下，佃农也会经常处于半奴隶的状况，同样无法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一遇天灾人祸，就会立刻无求生之地，甚至弄到卖儿卖女，使自己再度沦为奴隶。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农人被迫失去了生产工具——土地。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已一无所有了。但他却因此“自由”了，劳动力完全是他私有的了。他可随时出卖他的劳动力给资本家，几小时、几天、数月、几年都行。当然，在工作时间内，他将听任资本家支唤使用，完全不能自己作主。一旦进入社会主义，私有财产制度虽被铲除了，但劳动力的私有仍存在于人们主观的意识里。加上按劳分配、自留地的存在、儿女教养费大部分由家庭负担等，就很难使人们对自己的劳动力不视为私有。一个高中毕业的学生下乡去做农民，多少仍会引起他父母的反对。因为双亲辛苦地付出了大部分教养的费用和时间，总希望孩子升大学，将来多赚钱。一个大学教授下乡或工程师下厂会感到难堪，他们总觉得这是委屈了他们经多年培植起来的专业劳动力。这些现象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法权”在作怪。究其根源，则是人们仍以劳动力为私有，劳动主要是为私，也必须求得适当的报酬。这就同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和国有化有了矛盾。所以，要大力提倡“破私立公”、“为人民服务”及“为革命工作”等，去改变人们对劳动力私有的这一现象。相反的，也可能采用苏联现行的办法，用金钱去刺激人们工作，让大学教授治校，让专家治厂。这非但不能根本地解决问题，反而更加强了劳动力的私有和劳动为私的观念，更凝固了按劳分配这一分配原则，

当然也将助长了“金钱万能”的威风。那末，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最后将落得有名无实，被压在下面受苦的仍将是劳苦大众。可见，要改变思想，要提高人们的觉悟，在过渡时期中是如何的重要而又是多么的不容易。

第三，是刚才已提到过的工农是否真能当家作主的问题。首先要明白当家作主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今天也不是全国一致，十全十美的。它同时表现为人和人的关系，又是生产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既然生产关系在未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不会完美无缺，必须不断地改进，而人和人的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构成部分，当然也不会完美，也要不断地改善才行。加上人和人的关系在一九四九年前是那样的恶劣，它的遗风流毒也不是在一夜之间可以清除的。所以，去旧更新在此也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譬如在文革前，工厂里实行的是厂长制，是专家治厂。在那种情形下，工人除了做工外，并无参加业务计划、行政管理、经济核算的权利，上大学就更不用提了。这样，即使没有私有制，也没有资本家，工人在工作时间还会同样感到痛苦的。因为这不符合公有制，工人们也就没有作主人的感觉，做工当然不卖力气。文革中大力推行的“鞍钢宪法”，就是针对此症下药。它规定了工人要参加管理，干部要下厂劳动，不能脱离生产，不能脱离群众。这就替工人的当家作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要确实掌握这些条件，达到真正当家作主这个目的，工人们还必须进行不断的斗争。一天工人不能真正作主人翁，那末就是最好的经济政策也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的。若是以为可以靠金钱去刺激工人们工作，就又会走上苏联现行的道路，收效不过一时而已。因为从长远看来，人和人的关系及整个生产关系不可能靠金钱去改善，相反的，整个到共产主义的过程会因此陷于停顿，甚至倒退。

上面提到的这三个原因，看来似乎是非经济性的，却同中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幸而中国的领导人早已看清了这些问题，且正在面对现实地去解决它们。这样，再配上正确的经济政策，双管齐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是远大的，其发展的方向也是正确的。在八十年代，我们就可以看到显著的成绩。

（原载香港一九七六年一月号《七十年代》杂志）

退回到利润的老路上去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修正主义的发展

〔西德〕 菲利浦·瑙曼

〔内容提要〕 本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蜕变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第一部分介绍东德的所谓“经济改革”的前后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东德的那一套完整的修正主义经济路线，完全是苏修所谓“经济改革”的翻版。难怪作者要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样的情况要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经理身上，倒不使人惊奇”！文章的第二部分分析了一九七〇年东德经济严重失调的原因，作者认为，这是东德推行以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企业自治、专家治厂为内容的修正主义“经济改革”的直接恶果。

东德的新经济体制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共党内的右派分子利用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在苏联出现的政治困难和经济困难，从根本上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总路线。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他们篡夺了党的领导权，把一条修正主义的总路线强加给苏联共产党。

德国统一社会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与苏共保持着特别密切

的关系。当苏共还执行革命路线时，这对东德的阶级斗争是有益的。然而，一旦革命路线被苏共抛弃，德国统一社会党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它是否能抵制二十大的修正主义路线。

同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相反，德国统一社会党全盘接受了苏共二十大路线。对此，乌布利希写道：“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奠定了人类历史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标志首先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①

“二十大制定了对这一阶段具有决定意义的理论问题，因而也为我们党和全世界工人阶级指出了道路，苏共二十大的意义就在于此！”乌布利希在这里所说的理论问题，就是指反对“个人崇拜”，这是苏共新领导为建立自己对党的统治和排挤老一辈布尔什维克干部施放的烟幕。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二十大理论问题之一；它无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导致进行战斗的群众不断遭到严重牺牲，从而数十次地（最后一次在智利）被现实所驳斥。属于二十大理论问题的，首先是赫鲁晓夫用来作为同美帝国主义全面妥协的思想基础的和平共处。

尽管这条路线在东德几经曲折才得到贯彻，并且逐渐地明显起来，然而，德国统一社会党自二十大起就接受了苏共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是出于东德的特殊情况：由于民族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它在特定程度上受到西德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的威胁；东德大批的专业人才受到诱惑外逃；西德资产阶级长期以来大肆进行广播和电视宣传活动，用它的“黄金西方”的幻想迷惑部分东德居民；不合理的货币关系导致东德经济瘫痪。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日，柏林墙的建造，使东德有机会独

^① 乌布利希：《德国工人运动史》，1964年东德柏林版，第6卷，第321页。

立自主地改革经济和社会,以加强社会主义建设。从此,有可能缩小阶级差别,比如缩小工人和技术经济知识分子之间很大的工资差别。但是,情况恰恰相反,没有发动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进攻,而是通过“有计划和有领导的新经济体制”的实施,出现了生产关系的倒退,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

一、对旧经济体制的错误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东德经济增长的速度下降。尽管基建投资继续猛增,但国民收入的增加却适应不了这一增长。乌布利希自己在一九六七年提供了特别令人担忧的统计数字^①：

	基建投资增长数	国民收入增长数
1951 到 1955 年	320 亿马克	210 亿马克
1956 到 1960 年	630 亿马克	210 亿马克
1961 到 1964 年	660 亿马克	107 亿马克

从一九五七到一九五八年起,国民收入的增长停滞不前,在六十年代上半期甚至下降了一半,那末,基建投资怎么可能同时增加一倍呢?这种充满矛盾的发展,不仅是由于东德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一九六一年以前“边界开放”的特定情况造成的,而且无疑是很严重的经济损失。

可是,在批判以往的计划和领导时,却又象一九五四年那样,再次局限于纯粹实用主义地只谈现象,而忽视了经济问题的政治和利益基础。一般说来,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以前的局势和“经济方面某些教条主义的影响”^②,要对造成经济困难负责。

受到批判的经济上的失败,具体说来同一九五四年相似：
缺乏科学性的远景规划。

^① 乌布利希：《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676 页。

^② 《评有计划有领导的国民经济的实践》，见 1963 年 7 月 11 日东德《法律报》。

一切经济机构几乎完全是以完成年度计划为目标。

经济手段也完全受年度计划制约。“由此，人们力图制定轻松的计划，导致了经济单位和制定计划之间的不必要的矛盾。”

在计划的执行方面，人们批评了有始无终和只求完成计划数量的倾向，因为“国营联合企业和一般企业的领导人对从经济角度出发抓质量劲头不足”^①。

滥用资金。

没有充分地将利润和价格列入“经济范畴”。

没有把价格作为适当的价值尺度和管理手段；此外，一成不变的价格妨碍了新产品的制造。

确定劳动定额中极少考虑质量指标。

没有集中使用奖金，并且同工资很不一致。

最后，领导人的薪金“过于固定死板”。

这些缺点导致了“恶性循环”：经济干部和国家干部解决这些问题的传统办法，一般是“加强行政管理和采用具体的手段纠偏”。可是，结果反而使体制更为模糊不清；他们未能抓住毛病的根子，最后引起局势的激化。

上面提及的旧体制的所有缺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是情报方面。关键是如何获得正确的情报资料，以判明在可以采取的行动中，哪一种方针是社会所需要的。

第二是经济过程中行动者的利益方面，即计划部门、企业领导阶层以及工人的利益。

在情报体制方面，同一九五四年相比，存在着新的问题。这一期间，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分工越来越细以及科技革新的结果，经济结构变得更为复杂了。因此，有必要把计划本身提到

^① 《评有计划有领导的国民经济的实践》，见1963年7月11日东德《法律报》。

一个更高的科学水平，有必要超出五年计划的时间范围来估计和规划经济发展趋势^①，此外，还得系统地建立组织完善的收集、加工和介绍情报的工作。

着眼于较长的时期（预见到今后二十年之久），争取价格能促使工人在本部门的努力与国家的优先需要一致，是符合社会生产力新的客观发展趋势的。但是情报系统却跟不上，因为情报问题和利益问题是相互紧密联系的。国家计划当局迫切需要依靠反映确实经济形势的情报。然而，只有企业领导感到提供这种情报于己有利时，前者才能得到正确的情报。因此，归根结底，利益问题是情报问题的基础。

以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东德政府一再苦于四面楚歌的困境。确定工业价格的旧条例，却被企业以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用来获得额外利润。旧时确定价格的基础是成本，根据成本获取“正常的”利润。为了尽可能地提高产品的价格，亦即尽可能地增加企业的收入，企业热衷于采用昂贵的材料（包括那些在生产过程中完全用不着采用的材料）进行加工。这样，作为获取利润基础的成本提高了，随之，由于利润增多，自身的奖金也增加了。

这么多弊病可以归结为一点：企业领导人不是以整个社会的利益为目标，因而也不是以使用价值的生产为目标。他们不发挥企业本身潜力，而是用提高成本的办法增加利润；他们要求大量投资，增加流动资金，而不肯尽力厉行节约资金。国营联合企业和一般企业的领导人虽然完成了计划的数量指标，但是他们不求生产高质量的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脱节现象，充分说明了没有发挥企业潜力。所有这一切造成了国民经济资金的浪费，

^① 《东德经济规划》，1970年东德柏林版，第32页。

造成了技术发展的停滞不前，造成了整个经济发展比例的失调。

这些弊病说明了什么呢？显然，尽管规定了详细的计划定额指标，但具体到生产过程，每个企业、集体和领导人却有很大的活动余地，这一活动余地是不能由国家计划机构来填补的。生产的具体计划和每天的劳动组织只能由企业本身决定。计划系统向企业提供作决定的数据；另一方面，整个经济生产过程的完成以及国家计划的落实，却取决于怎样填补计划规定的数字以内的活动余地，取决于计划经济的金字塔的最基层单位为什么生产和怎样组织生产。

如果说，实践证明生产的劳动实效很糟，那末，首先应当怀疑的是领导人的质量和企业中的阶级关系。如果说国营联合企业和一般企业的领导人只是力图制定不花力气即可完成的计划，只是力图舒舒服服地、只求量不求质地完成预定的计划，那末，唯一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是以使用价值为生产目的，而是以尽可能快和尽可能舒服地获取高额奖金为目标。这样的情况要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经理身上，倒并不使人惊奇；对大多数资本家来说，首要的是获取最大利润和追求个人特权和名望。可是，一九六三年的改革是在东德成立十四年之后开始的，绝大部分旧资本家已逃往西方，大部分国营企业的领导是由社会主义制度下培养的新干部担任，大多数经理本身是工人阶级出身，又是党员和工会会员。

为了找到经济问题的更深刻的原因，必须提出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由党领导的学校和大学培养出来的新干部会有不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行为和目的呢？为什么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交换价值和他们自己的高奖金，而不是使用价值和人民的利益呢？必须要问，经济领导干部究竟是怎样培养的？为什么整个教育体制至今还不能克服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恶习（特别是表现在领

导干部身上)? 必须要问,东德在边界开放时期的那种技术和经济知识分子的特权制度是否非搞不可?其结果是,新培养的干部也道德败坏和脱离政治。

相反,德国统一社会党认为,旧体制的缺点在于物质刺激不够充分和配合不当;领导者的工资“过于固定死板”;必须使国营联合企业和一般企业的领导人“从经济上对质量感兴趣”。这就意味着,承认了维护领导干部利益的现状,而没有想到要改变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反而依靠更完善更系统地利用经理的物质兴趣来解决经济问题。因此,真正的原因并没有触及,结果势必引起新的失调和危机。

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应当对企业中的阶级关系和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进行调查研究:为什么企业党委不能确保发挥监督作用,抵制企业领导人的自发行为,在企业中维护政治的和整个社会的利益呢?是怎样处理党、企业、工会领导和工人群众的关系呢?为什么工人不是主动积极地起来反对这种浪费资金、浪费社会劳动、生产质量极差的生产组织呢?为什么工人阶级不能监督他们的领导干部呢?

上述弊病之一就是一九六三年工资体制的改革。有人责难说,劳动定额指标过多地讲求数量标准,而且在不应该采用计件工资制的地方也采用了计件工资制^①。可是,人们没有对差别极大的工资制本身提出疑问,这种工资制包含着分裂工人和使工人脱离政治的危险。特别是在各种变种的计件工资上反映得很清楚:工人们为了工资,不得不把精力集中在产品数量上。劳动定额指标是由所谓的“定额工程师”测定,而不是由工人自己规定。这意味着这种工资形式成了工人搞好生产质量的阻碍。他

① 1963年7月11日东德《法律报》。

们不是把生产使用价值看作他们的第一目标，而是为了养家活口，被迫追求高额计件，这种工资形式，导致了“定额工程师”和工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前者自己不劳动，他们的工资由工人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支付，所以他们是“食利者”。工人们发觉到企业中的这种状况，但并未起来自行组织这一工作。他们被迫一心考虑争分夺秒完成计件定额。工厂里的这种组织形式，最终使旧的雇佣思想重新抬头，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消极，放弃对领导干部的有效监督。

这些根本性的政治问题，没有在一九六三年的分析中反映出来。这一分析以及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只是停留在问题的表面。

二、新经济体制的基本方案

东德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革，是在一九六三年一月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宣布^①，并在以后的半年中制定的^②。在这之前，东德报刊转载了在苏联围绕利别尔曼的文章所展开的讨论，刊登了苏共二十二大的文件（其中同样提出了改组经济和加强企业独立性的任务）以及一些国营企业的试验情况。

对于新经济体制的基本思想，乌布利希是这样提的：“由国家对社会全过程进行集中的计划和领导，就是说，一方面要使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自行计划和自行领导，另一方面，通过国家权力的地方机构调整全国境内的社会生活，这两方面必须有机的地联系起来。”^③

这里包含着经济体制的两条主要路线：一条是改组计划的

^① 乌布利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社会主义纲领和历史任务》，1963年1月16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63年东德柏林出版。

^② 拜尔·坎切希：《从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到经济会议期间的新经济体制的创始》，1969年第12期《经济学》月刊，第1761页及以后几页。

^③ 乌布利希：《在第七次党代大会上的报告》。

体制和机构，另一条是通过建立一套巩固的经济体制以扩大企业的自主性。

按规定，计划本身不再涉及具体问题，而是只包括根本性的主要任务。它主要不是制订年度计划，而是阐明长期发展经济的主要路线。“计划工作首先要集中于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规划。”^①

为了提高整个计划工作的科学性，规定制定五年计划时，应着眼于长远目标，预见到生产力、国际市场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为了制定以年度计划为目标的短期规划，把长期规划和短期规划的制定分开来：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制定远景规划，而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任务则是年度计划的制定、执行和监督检查^②。年度计划也应作原则性的改变，同时不搞经济机械主义的细微末节。

第二个方面，“大家都必须懂得，不是以行政管理作风而是用经济手段来领导经济。”具体地说来，就是把原先的生产规划、原材料直接分配（特别是基建投资的直接分配）等一整套国家计划体制，看成是官僚主义的，并且不再采用。相反，“应该充分利用企业间的商品货币关系”。生产单位的协调，今后不再直接通过计划系统的渠道，而是间接通过经济刺激和经济手段的复杂办法实现。“这样也可节约行政监督的大笔开支和避免争吵。”同时，种种官僚主义的空想和过高估计中央处理具体问题的决定的看法，也会从经济生活中消失。

如果计划部门今后只限于制订主要计划的话，那末，它以前的一些职能必须由经济手段来行使。三级利益（社会、企业、个人）应该正确处理；国家计划要阐明整个社会的经济需要；经济核算手段（价格、成本、利润等）控制一般企业和国营联合企业的

① 乌布利希：《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 米勒·赖西希：《东德的经济奇迹》，1968年东德柏林出版，第249页。

行动；个人物质利益（工资、奖金）则影响每个劳动者的态度。

新经济体制新就新在“建立经济计划和经济手段之间的合法关系”。这意味着完全改变了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意味着大大扩大了企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执行有计划有领导的新经济体制基本方案，是同大大提高企业领导人的责任感相联系的。”于是，企业领导人的活动不再听从于上级指示，而是由他们独立经营范围内的目标来决定。目标就是利润。因为：“在正确使用经济手段中，利润总的体现了国营联合企业和一般企业的经济领导的最本质方面。”只要价格、经济定额标准、财政和信用制度以及合同制度正确，“一般企业和国营联合企业追求高额利润的努力，就和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是一致的”。

同利润作为衡量企业对国民收入作出贡献的客观标准相联系，利润也成了纯收入分配的源泉。只有通过这一职能，利润才成为名符其实的经济手段。在这一特性上，利润把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三级利益相互联系起来。从利润中提取税收上缴国家，从而获得用于非生产性开支和社会积累的资金。其次是根据现在竭力追求的“资金自理”原则，从利润中得到折旧资金、基建投资以及工资和奖金。

因此，利润从两个方面影响着“个人物质兴趣”：“一方面，投资决定着企业未来的生产力和职工未来的收入；另一方面，除了等级工资以外，通过奖金使工人不仅关心本职工作，而且关心整个企业的成果。”特别是要使领导干部和经济技术知识分子的薪金，取决于企业实际取得的成绩。

一九六三年前也搞过物质刺激等经济手段。然而，新的改革同过去的相比，则是更全面和更彻底。通过改革出现了一个完整的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内，所有具体措施都着眼于一个

总的目标,并且是相互配合的。

这一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企业和社会的新的关系,是企业以及企业领导人自主性的扩大。过去的物质刺激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实行,而且同企业成果和利润没有关系。现在改革的结果是企业独立性的扩大,利润的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物质刺激促使企业巩固独立经营的利益,并且通过金钱关系,使社会和劳动者从新经济体制中都得到好处。^① 这样,德国统一社会党也就意识到,东德的生产关系随着新经济体制有计划、有领导的实施而发生了新的质变。^②

三、改革的阶段

自一九六三年以来,东德经济关系的改革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九六三年一月)到第七次代表大会(一九六七年四月)的第一阶段中,通过改革工业品价格、对固定资产重新清产核资、扩大作为经济领导中心的国营联合企业、改变新的投资条例和其他措施,创造了逐步提高企业自主和以利润作为衡量尺度和经济手段的前提。

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〇年秋天的第二阶段中,使用新的经济改革法扩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人们首先优先发展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项目,同时运用价值范畴和国家长期规划,间接引导和调整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以此使远景规划成为主要控制工具。

这些措施在一九七〇年导致了东德经济严重失调的危机,结果是被迫进入第三阶段,即事前未曾预料的纠偏阶段。在这

^① R·瓦特尔:《经济体制的利益》,1970年东德柏林出版。

^② 艾伯特·科赫等著:《社会主义社会体制的经济法则》,1969年东德柏林出版。

一阶段中，一些分散权力的措施暂时被取消，但未触动业已执行的总的发展方案。

四、乌布利希天真地相信利润是灵丹妙药

推行新经济体制的初期，几乎所有东德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天真地相信，利润是根治企业领导人对社会利益不积极主动的灵丹妙药。直到一九六八年后，才慢慢地产生了疑问。

象苏联一样，东德的理论家也以利润的刺激职能，作为他们改革的基础。但是，早在确定新经济体制的各项具体措施时，利润的刺激职能和衡量企业成绩的职能，实际上即已联成一体了。现在，为了从理论上粉饰一番，便将一部分来源于利润的收入，美化成是社会主义形式的劳动报酬^①。

新经济体制推行前夕，召开了经济会议。乌布利希在会上指出：“必须以利润为整个经济体制的核心”，由于所有制关系不同，“……资本主义利润和社会主义利润有着原则性的区别”。资本主义以利润为生产的主要目的。“社会主义的利润，完全反映了集体努力和社会主义生产者的经济成就。因此，关键在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利润的原则性(1)作用。”这是因为，“在民主德国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有领导和有计划的国民经济给社会带来的好处，只能表现为企业利润。所以说，利润“不仅是财会部门的一个计算项目”，而且是“衡量社会劳动效率的客观标准”。^②

利润不只是被动地作为“单纯计算项目”。它要通过价格、

^① 乌布利希：《1970年以前的远景规划》，1965年第51、52期东德《经济》周刊。

^② 乌布利希：《国民经济有计划和有领导的新经济体制的实践——1963年6月24日在经济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东德柏林出版，第59页。

折旧率、生产基金、国家定额标准等各种因素，刺激企业经营，同时，利润也成了企业领导人“生产的主要目的”，“他们的社会地位，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以及他们个人收入的多少，都取决于此。”^①

这也说明，首要出发点是刺激企业的积极性。统一社会党的根本看法是，着眼于利润和提高国民经济效率完全一致。“因此，如果能够正确注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价格、财政和银行的作用，如果内在比例和结构形式能保证企业独立地作出决定，保证注意节约，那末，商品生产者尽可能地争取获得高额纯利的兴趣，必然符合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效率和最大限度节省时间的需要。”^②这样，利润既是衡量企业对国民收入贡献大小的标准，又是刺激的基础。

一九七〇年的危机及其根源

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原来准备把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五年的十年时间，作为有计划有领导的新经济体制的试验阶段，然后进一步扩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为此，确定了如下经济领导体制：将最重要的增产部门相当严格地置于中央领导和监督之下，其他经济部门，则基本上通过间接影响的办法使它们长期稳步地发展。

将“具体结构计划”或“客观计划”^③与其他经济部门这样分开，是符合统一社会党“不赶而超”^④的经济策略的。

① 乌布利希：《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 同上书，第259页。

③ 《东德经济规划》，1970年东德柏林出版，第110页及以后几页。

④ 乌布利希：《不赶而超——我们经济政策中的重要原则》，1970年第9期《经济》周刊。

这一口号概括了如下策略：集中全力抓稳产高产的部门，使它们超出平均发展速度，借以突破整个劳动生产率。集中力量发展重点部门，在尖端工艺成就方面超过“世界水平”。“我们不能满足于老是一步步‘跟踪’世界水平”^①，而是要“在某种程度上抛开目前最高科技标准，制定并实际掌握崭新的工作纪律、劳动纪律和新工艺方法，制造为此所需的新的成套机器和生产工具，从而建立新的最高科技标准”^②。为了实现这一突破，开始着手大规模研究工作和改组科研机构。

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部门实行“体制自动化”，其目的在于短时间内改变经济结构。制定计划的依据是稳产高产和两阶段体制，借以首先实现具体结构的平衡，接着进而实现整个经济的平衡发展。

采取这些措施的背景，是东德的整个经济形势：一方面，重要部门的工艺水平同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差距；另一方面是劳动力来源枯竭。东德居民人口百分之五十在业（西德为百分之四十五），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就业水平。十五岁至六十岁的妇女中，在业者占百分之七十九，也可算得是很高了。

相反，未来几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则将下降，也不可能从农业方面抽调劳动力搞工业。虽然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仍占百分之十二（西德只占百分之十），但其中包括辅助劳动力和手工业者，这一部分西德不统计在农业之内^③。

因此，只有使现有劳动生产率翻一番，才能提高国民收入。还应看到，东德工人的每周劳动时间正在逐步缩短，退休年限也

① 施图本劳赫、奥斯特尔合著：《不赶而超》，1970年第6期《统一》月刊。

② 乌布利希：《不赶而超——我们经济政策中的重要原则》，1970年第9期《经济》周刊。

③ 所有数字见东德柏林出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70年统计年鉴》和威斯巴登出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70年统计年鉴》。

在逐步放宽。

一、不搞群众路线，反而相信专家

面对这一现实情况，在一九七〇年底以前，统一社会党号召大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创造促使劳动生产率飞速提高的最新工艺方法，以及集中投资于几个部门搞全面自动化，通过这几个部门的尽快发展，达到提高平均劳动生产率的目的。

但是这种做法失败了。重点部门所规定的增长速度没有达到，或者只达到了一部分。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不平衡，例如化工、电子、重型机器和工业设备等制造部门都没有达到规定指标，特别是后者更由于冬季严寒和气候条件不利导致的农业歉收而受到严重影响。“部门和行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未能全部消灭。因此无法按原有计划满足生活用品工业迅速增长的生产需要。不能如期执行合同，重要原材料和电动机、齿轮装置、水泵、铸件、塑料等产品供应落后。”^①

造成比例失调的部分原因，是计划主管部门工作上有差错，例如由于低估了用电量的增长，没有相应地增加发电量，以致一九六九年末一九七〇年初和一九七〇年末一九七一年初两个冬季，许多工业部门受到干扰，一度缩短生产时间。

但是，将一九七〇年的危机完全归之于具体计算差错是不对的。这一差错不至于会使东德一九七一年计划中基本建设投资有史以来减少百分之一一点五^②，必须联系东德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来寻找根源。

首先，“不赶而超”的处方集中精力只抓极小部分的国民经

^① 《1971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法令》，1970年12月16日《新德意志报》第3版。

^② 同上。

济,并且依靠技术人材中的尖子,而不是依靠广大工人群众。乌布利希在东德技术知识界的“技术协会”上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发挥大研究中心抓尖端技术成就和选择重点部门搞体制自动化的方案,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东德就对“科技革命”奉若神明,其主要角色不是工人阶级,而是搞技术的脑力劳动者。这样将资金、政治、物资都局限在经济上的一个狭小方面和一小批劳动者的骨干身上,必然使其他经济部门落空,无法充分调动多数劳动者的社会积极性。

在旧的方案失败后,这一倾向曾经遭到东德报刊的抨击^①。经济历史学家于尔根·库钦斯基指出这种选优发展的危害性:“我们赖以迈步向前的欣欣向荣的原野,包括整个经济领域在内,既包括老企业,也包括我们昨天刚建立的企业。”他告诫人们不要过高估计科技革命的进步,指出现有知识的重大作用还有待于通过生产实践加以证明。参加这一工作的不能光是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应该是所有直接从事生产的人。这篇文章有些提法引起了激烈争论,一些主要负责起草现有经济体制的经济学者(尼克、施利塞尔、哈特曼)表示不同意,工长和革新者以及党的理论家(米尔克、艾伯特)则认为言之有理。一个工长强调说,有些领导人“坐在半天云里吹喇叭,大谈体制自动化”,而看不到“我们通过合理化运动(即使办法是靠节省纸张墨水)增加的收入,同依靠自动化增加的收入一模一样,都是一马克等于一百个分尼”。

此外,人们还从政治上分析了科技进步是在何种社会形式下取得的:“恕我直言,难道我们不是片面强调追求综合性自动化,而将百分之九十的劳动者排除在为争取经济发展进行的斗争之外么?这同我国社会中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相符吗?”^②

① 《新德意志报》，1971年4月14、25日，5月1、12、22日和6月30日论文。

② H·D·沙伊歇尔，1971年5月1日《新德意志报》第3版。

对于新经济体制本身，却不曾有人提出疑问。

二、追逐利润的后果

一九七〇年危机的根子恰恰是新经济体制本身。这个体制一方面是优先考虑重点部门的平衡和满足这些部门的供应，另一方面是通过几年不变的经济定额控制的其他国民经济部门，两方面相互脱节是比例失调的根源。其原因是，未列入优先考虑的企业占绝大多数，几乎包括所有生活用品工业。这些企业的生产不是直接遵照国家的指示，而是根据在允许的范围内以追求本身利润为原则。

这些企业通常根本得不到那些重要经济物资，供应给它们的东西，也经常不符合几乎所有企业的需要。显然，没有任何办法充分利用这些企业的潜力，使之有益于国民经济。于是，两个按完全不同的计划方法控制的经济“领域”之间，就必然要出现严重不平衡的现象。

这就引起了各方面的问题；不言而喻，新经济体制的中心思想无法使各个企业超出经济手段和金钱范畴之外取得利益一致。一九七一年初，东德报刊登载了各种讨论文章，开始对这种方案表示怀疑。例如，维利·施托夫批评许多企业领导人搞“企业利己主义或企业盲目性”^①；阿尔弗雷德·宾茨强调指出：“计划和决算的制定不应当只考虑企业的作用，这种作用会干扰国民经济和居民的供应。”^②

然而，只要物资供应仍然以企业盈利多少作为分配标准，只要领导和职工的收入仍然取决于企业的盈利，上述号召就无济

^① W·施托夫：《国民经济计划的任务》，1971年第6期《经济》周刊，第3页。

^② A·宾茨：《决算机关确保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任务》，1971年第12期《经济》周刊，第5页。

于事。“企业利己主义”的根子在于新经济体制本身，是这个体制促使企业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

新经济体制实际上在企业利益同社会利益之间造成的一些矛盾，可以从报刊报道和讨论的几个典型问题中看出来。

1. 价格纪律问题

由于制定价格的权力分散和新的价格形式五花八门，企业可以不靠增加生产，而靠公开或暗中提高价格，用损人利己的手段多赚钱。

一九七〇年中，单是消费品部门就出现了两百多次计划外加价^①。据东德报纸报道，因为出售高档商品利润优厚，许多企业拒绝供应低档商品，或低档商品品种供应不全。企业还通过“不按实际开支虚报成本”^②的手法提高利润。

针对这种情况，人们提出“采用行政手段”加以控制，但由于企业和企业之间条件差别太大，这样做无异于骑着马儿去撞风车，完全是白费力气。

2. 生产规划问题

一再听到关于部分企业停产或削减生产的消息，原因是企业无利可图。

这样，一九七〇年市场上买不到牙刷、内燃机火花塞和许多日常用品^③，原因是企业缩减了生产或者干脆改行生产其他产品。在生活用品工业中造成的后果尤为严重。对此，也归罪于“企业和联合企业的利己主义思想”^④。曾经有一项新指示规定，

① W·赫斯勒：《执行价格纪律是工商业部门的政治责任》，1970年第31期《经济》周刊，第8页。

② 1970年第39期《经济》周刊，第16、17页。

③ P·费尔纳：《在第十四次中央全会上的报告》，第6页。

④ 1970年第17期《经济》周刊，第7页。

改行生产任何其他产品须经有关部门的主管部长批准决定^①，可是一如往昔，不遵守这一规定的仍然大有人在^②。

通过自行扩大企业之间的关系，以保证按花色品种和如期供应商品的设想，还是不能实现，“这是因为，不少企业没有明确固定的生产规划，它们停止生产某些品种或改为生产其他品种，从而破坏居民和经济的正常供应。”^③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事情，原因恰恰在于企图刺激企业端正对待国民经济的态度的那种经济手段。例如据报道，企业以“生产清洁”为口号，停止生产化学溶液，实际上则是因为生产这种产品（尽管其他单位迫切需要）利润不高。零件缺货已经成了长期慢性病，原因是“企业领导人只顾使生产的零件用于装配成品，因为出售成品可以盈利和得到奖金。”^④某些钢材品种突然停止生产，理由是生产这些品种缺少“物质利益”，却不管钢材加工工业因此大受其害。在这一点上，报刊也指出，“没有积极鼓励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以整个国民经济的效果作为衡量自己行动的标准。”^⑤

有人报道，洗衣店“优先得到了‘有利可图的大批货物’”，而造成民间家用供应不足^⑥；人们老是“将低档商品供应某些‘专业’单位”，以此达到“暗中加价”的目的^⑦。另外，服装商店

① 《关于停止生产和改行生产其他产品的规定》。

② H·许格尔：《赚钱犯法吗？》，第9页。

③ 许格尔、卡尔合著：《环节不能打乱》，1971年第17期《经济》周刊，第6页。

④ G·瓦尔特：《提高经济合同的重要性》，1971年第18期《经济》周刊，第6页。

⑤ 莱本、马尔茨合著：《确保计划和决算过程的有机结合》，1971年第5期《经济》周刊，第14页。

⑥ U·艾伯特：《财产是我们大家的，我们用之得当否？》，1971年第18期《经济》周刊，第6页。

⑦ H·许格尔：《赚钱犯法吗？》，第9页。

对滞销商品叫苦不迭,而“大量需要的品种却一再脱销”^①。

3. 合同制问题

随着企业独立性的扩大,需要增订各种规章制度,用以克服各自为政的生产单位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早在一九二八年,E·帕舒康尼斯就认为有必要制定法律,并且提出了对付商品生产(不单是对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法律设想^②。

在东德,这种观点得到了认可,在推行新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出现了经济法律。有了经济法律,合同制和司法部门就相应地扩大了。以前,企业之间的合同只起次要的、辅助性的作用,只是确定计划范围之内的问题。

现在,合同的作用变为可以全面地积极地影响企业相互之间的关系了。根据国家合同法院受理案件的许多报道来看,可以断言,企业之间有待解决的利益纠纷案件越来越多。单是罗斯托克区合同法院,一九七〇年一年内受理的案件就有一千多件,判罪的主要是由于违反合同^③。

企业往往拒绝同定户签订合同,原因是定户不给它们相应的好处,因此法院不得不愈益插手签订合同的工作^④。鉴于案件众多,仲裁处理不胜其烦,人们号召企业尽可能自行排解纠纷,只有特殊案件才诉诸法院。

说到底,经济法律的实际效果也是一个问号,因为打官司和

① 《顾客的要求和滞销品充斥的成衣店》,1971年7月15日《新德意志报》,第3版。

② E·帕舒康尼斯:《法学概论和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1966年版,又见P·J·斯图赫卡:《法律的革命作用与国家》一书序言,法兰克福1969年版。

③ W·伯米希:《计划和领导的分度尺》,1971年第7期《经济》周刊,第10页。

④ 拜埃尔:《合同法不适用于生活用品工业吗?》,1971年第28期《经济》周刊,第15页。

治罪都是马后炮。而且是治标,不是治本,无法从根本上消灭违反合同的现象。所以报刊也无可奈何地承认:“采取司法手段强制供应商品的可能性完全有限。”^①在多数情况下,违反合同的判决根本就不起作用:“最近,国营柏林妇女时装公司情愿罚款,不肯按原定合同供应大量需要的品种。”^②

企业常常早已把违反合同罚款计入成本之内。再说,打官司需要时间,等到最后裁决时往往已经无法挽回经济上的既成事实了。因此,人们指出,“即使法律规章订得再好,仍然可能给企业或部门利己主义者有机可乘”,而“主要关键在于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主义态度”。^③然而,人们却忘记了分析研究,是什么样的物质关系(经济手段体制和物质刺激)在决定商品生产者的态度。法院所起的作用,只是在事过之后平息几件“企业利己主义”造成的严重影响。

企图主要依靠经济办法协调企业之间的关系,结果不仅是经济发展出现严重不平衡,而且导致产生企业经济法院和司法部门的新型官僚阶层,这个阶层可以靠牺牲社会中饱私囊。

三、结论

说明东德结构困难的事例不胜枚举。它们的共同点是,没有一件不反映出企业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利益矛盾,这种矛盾自然对社会不利。企业和社会两者之间的这种不协调由来已久。为了克服矛盾,旧体制往往是不给企业以决定权,强调集中领导。待到效果愈来愈成问题时,就改用扩大企业独立性和通过经济手段的办法,加以间接控制,促使利益协调。然而经验证明,采

① W·伯米希:《计划和领导的分度尺》,1971年第7期《经济》周刊,第10页。

② 《顾客的需要》一书,第3页,又见1971年2月2日《新德意志报》,第3版。

③ R·G:《合同还算数吗?》,1971年第31期《经济》周刊,第8页。

用权力分散的形式，搞利润挂帅和扩大金钱关系，恰恰不是消除而是扩大企业的利己主义，从而导致比例严重失调。

这些决定只能说明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远远未得到解决，或者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尽管私有制已经从法律上被废除，但生产单位就是它的领导人或小集体的准财产，在生产中不会自觉自愿地以社会利益为目的，而是尽力以它们本身的利益反对社会利益。

在旧体制下，人们力图不给分散的生产单位以主要决定权，强调集中统一，以此解决企业和社会之间利益上的对立。可是由于这一体制缺点甚多，旧社会的工作方法和指导思想到处可见。

在新经济体制下，人们同意了企业利益的独立性；规定用物质刺激和经济手段（不强调觉悟，背着群众）使它们同整个社会目的协调一致。这就完全放弃了消灭传统的利益关系的任务。

严重的后果是：1. 长期经济困难和比例失调阻碍了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2. 利益结构的巩固，必然形成新的阶级关系并促使其两极分化。

鉴于这一局面，自一九七一年以来，德国统一社会党采取两手策略：一手是重新部分取消企业的独立性，加强国家对企业的监督作用。“如果企业手中有权对于自己有利的问题说了算，要合理地摆平国民经济和企业双方的利益肯定是难事。”^①因此，企业拥有的决定权再次被部分削减。

计划指标的约束范围扩大了，统一决算的作用加强了；国家机关发号施令的权力作了新的调整，比过去大得多了；对库存数、定额工作和月计划的完成采取严格措施加以监督。不搞长期

^① R. G: 《合同还算数吗?》，1971年第31期《经济》周刊。

性的定额,不搞远景规划,而是回到过去以年度计划作为主要控制手段的办法。^①

人们希望,通过上述措施重新控制经济的发展。

另一手是大大扩大个人的物质利益:“劳动者从经济工作成果中得到个人物质利益这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必须广泛采用,并使之更好地和精神刺激结合起来。”^②

根据这一方针,开始实行给工长发特别奖金和新的奖金规定。奖金方面的普遍差距,特别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许多特权,都被固定了下来。

一九七一年的这一转变还要持续多久,目前尚难估计。人们事前没有从理论上进行深入辩论,也未听到作自我批评。在统一社会党“八大”上,埃里希·昂纳克避免引起改弦易辙的印象,不过并没有把话讲绝:“现在,有些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同志们,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发展情况良好,只是它不能作出太多的‘超出计划的奇迹’。它需要的是能有平衡的计划作为可靠的基础。”^③如前所述,足以说明比例失调的原因归根到底不是“超出计划的奇迹”,而是结构本身有毛病。可以肯定,这种毛病也不可能通过恢复集中统一领导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西柏林出版的《退回到利润的老路上去》一书 杨寿国、钱顺德译)

① A·宾茨:《决算机关确保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任务》,1971年第12期《经济》周刊。

② E·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1971年6月16日《新德意志报》,第6版。

③ 同上,第7版。

新的经理

〔西德〕B·K·卢德茨

在东德，一个新的、由领导无数企业和大公司的年青经理和技术官僚所组成的上层分子社会集团产生了。“新经济体制”的成就之一是，经理们和技术官僚们在六十年代比在五十年代更容易在国营企业中找到合意的工作。一九六三年重新引进“总经理”头衔就是根据按表现计酬原则所建立的严格的、等级制的管理结构的缩影。这些总经理是当时八十个左右（现在大约是一百十个）国营联合企业的领导人。

更具有实际重要意义的是，在一九六三年，工业部门的经理们获得了新的决策机会：他们现在积极参与新的资本支出和投资的决策；他们可以作出产品定价的建议；他们可以知道托付给他们的那个部门的技术计划和发展的秘密；他们各自负责同西方以及东欧国家的企业建立联系；他们还为自己的工业部门培养新干部。

工业和经济界出现新的上层分子集团的现象，也许是最明显不过地表明，一个独一无二的“企业家阶层”正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兴起。年青的经理们和技术官僚们通常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所名牌技术学院或工商管理学校学习三至五年。他们学习了下列一些课程：关于组织工作的社会学，决策论，运筹学，数学，控制论，电子计算机资料处理，社会心理学，关于工业和劳动力的社会学，教育学，以及有新的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

治经济学。采用研究实例的、讲究实用的教学方法的课程约占学习时间的百分之二十五。在这些课程设立之前，还曾经仔细研究过美国的某些商业学校和管理人员培训计划的教育原则。另外，按照中央统一规定的课程，挑选了一些国营联合企业，定期地开办进修班，让这些联合企业的领导人再学习一段时间。设在东柏林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学院就是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为了这一目的而专门设立的一所学校。

经过三至四年的学习、考试成绩超过中等的学员，可以立即在规模巨大的企业中找到象经理助手这样的职位，或在中央或地方的经济机构中担任要职。在他们胜利地完成一段试用时期后，通向经理的宝座或国家经济机构的领导岗位的大门就向他们敞开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企业中，工厂经理或负责技术或销售的经理只是三十到三十五岁的人，这是并不稀奇的。一九六六年，在一百十个国营联合企业中工作的几千个工厂经理中，有大学或技术学院毕业文凭的占百分之三十五，有高级技术学校毕业文凭的占百分之五十五。这样的职位，其政治上的必要条件就是党员资格。通过象这样的纯粹是专业上的鼓励，统一社会党把部分青年同党和国家的命运拴在一起了。

（摘译自一九七〇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的《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书 钱志坚译）

七十年代苏联经济展望概述

〔美〕约翰·P·哈特

一九七二年五月最高级会谈和同年秋季签订贸易协定以后，苏美两国领导人宣告了一个国际和贸易关系新纪元的开端。但是，苏联的军备设施和对外政策却仍然是美国决定国家安全开支的基本因素。尽管在经济上落后于美国，苏联在军备、宇宙空间和援外方面还是继续投入了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当可观的物力和人力。

苏联领导人通过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五年第九个五年计划的贯彻执行，着重指明了技术改革和提高消费水平的重要性。由于愈来愈重视使苏联经济现代化的投资并强调关心消费者的需要，调整民用和军用计划的问题便提到前面来了。技术的日新月异也促使苏联扩大同美国、西欧和日本的贸易关系，特别是那些涉及引进技术的贸易关系。

正当经济上的成就对实现原订计划指标具有极其重要影响的时候，一九七二年苏联却遭受到它计划经济史上最坏的年头之一，这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勉强增长了百分之二。不但总的增长额被农业歉收拉下来了，而且其他部门也没有完成计划。由于农业仍然约占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显然它就是造成这一情况的罪魁祸首。（见表一）

本书中的三十篇文章，是四十来名美国和欧洲政府机构及学术机关中的专家关于苏联最近的经济活动及其对将来的影响

表一 1970—1972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指数

(按要素成本计算,以1968年为100)

	1968年的构成	1970	1971	1972
工业和建筑业	39.2	112.7	120.0	126.2
农业	24.4	109.5	108.0	97.3
运输和交通业	6.8	114.9	118.8	124.8
商业和劳务	29.6	109.7	114.6	120.0
其中:商业	6.9	115.6	123.5	132.0
劳务	22.7	107.9	119.9	116.3
国民生产总值	100.0	111.0	115.4	117.2

所作的评价。本书各章共分为七个部分:计划和政策,苏联军备对资源的需求,工业,农业,消费,人力资源和教育,以及对外经济关系。以下各点就是这些文章所提出的主要问题。

一、苏联领导人在考虑制订政策时是怎样看待经济问题的?现在有没有发展新策略?在当前第九个五年计划和经济上多灾多难的一九七二年中,优先发展的次序是怎样改变的?

主要的经济决定权仍然集中在党的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手里。虽然重要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然而即使是在一九七二年生产很差劲的压力下,变化也并不显著。但是,斯大林主义分子那种在外贸方面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观点,在苏美贸易关系的新时代,即使没有被取代,也还是遭到了非议。

目前,苏联领导人采取的新的经济策略是:改变当前生产构成以有利于消费;改变投资构成以提高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强调技术革新、改进经营管理和提高生产率。尽管苏共二十四大对第九个五年计划着重讨论了技术革新和提高消费者生活水平的问题,但要求加强军备和重工业的传统观念,在短期内的变化是

很有限的。此外，一九七二年的歉收，使得即使是低标准的技术革新和提高消费者福利的指标也未必可能完成。

二、当前的第九个五年计划比以往三十年中的任何一个五年计划都规定得更为详尽。这是不是因为已改进了计划工作的方法？当前的这个五年计划内部是否协调一致，并且切实可行？

尽管国家计划委员会受到过指示，要根据一九六六年苏联投入产出表来制订计划，但这个计划显然还是用传统方法来编制的。这只要引用下一九六六年苏联投入产出表以及其他苏联资料就可以得出结论：已公布的计划内部既不协调一致，也不是切实可行。既然已经出现了一九七二年这个未曾预料到的坏年景，一九七五年的指标看来就更难以完成了。

借助于新采用的投入产出表，对计划内部是否协调一致所作的一次测验表明，除非苏联在节约原材料和动力方面以及在为紧张物资找到大量代用品方面能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进步，金属、木材，也许还有电力的计划产量将不能适应需要。

计划存在着另一偏向。为了达到预定每年百分之八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五年计划要求，工时和固定资本的联合投入量每年应增长大约百分之四点五，比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计划和一九六六至一九七〇年计划分别增长百分之六点四和五点五要低得多。这样，生产率就得每年提高百分之三点七才能完成计划指标，而这比过去十年的平均增长率要快三倍。

由于生产率指标是如此之高……因此在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五年计划中，技术进步的指标就显得格外重要。虽然技术指标的完成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赖于引进外国技术，但苏联的技术进步必须首先以本国机械工业部门的成就为基础……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五年生产工具的计划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三点四，比上一

个五年计划快得多,看来恐难以完成。在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某些化学工业、卡车工业和仪表、计算机部门中,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是最突出的。但是,苏联外汇来源有限,而一九七二年多次购买粮食,可能已经迫使原定进口西方机器设备的增长率不得不放慢下来。

三个其他部门(黑色冶金、石油产品和化学产品)的情况如何,对工业计划的完成也极为重要。

由于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五年计划过紧,按照以往历次计划与执行结果之间总存在显著差异的惯例,以及本次计划开始以来进行得并不妙,工业产量计划看来是无法完成了。

苏联领导人对其他两个指标越来越注意了,他们认识到制订技术革新和环境保护的综合政策的必要性是比较晚的,而他们在技术革新方面所作的努力要远远超过对环境保护的努力。

三、多年来,苏联领导人就感到计划工作和管理体制需要进行改革,目前这方面的进展情况和未来变化的前景如何?

当前苏联计划工作和管理体制改革的目的是集中于以下几点:1.增进五年计划和长期计划的作用;2.加强各种类型、各种期限计划的“科学”基础;3.拟订技术发展的详细规划,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4.利用数学模式和计算机,包括投入产出法技术。

迄今所取得的成果是,在根深蒂固的苏联计划和管理机构中已经为将来进行改革建立了一些数量不确的研究基地,而更为确切可靠的则是那个官僚机构的扩大。

同时,官方对“非官方”经济的纵容,也许减轻了要求改革物质刺激办法的压力。根据某些苏联逃亡者所述,“灰市”、“黑市”、上班之外的第二职业或者叫作“月光下的活动”的现象可能遍及苏联各地。最近在格鲁吉亚共和国揭发出来的一些非法活动也

许是典型的和普遍的。

四、十年来，苏联分配给军备的资源，已经建立起足以与美国相匹敌的战略武器，并增加了足以陈兵中国边境和驻兵捷克的兵员人数。苏联的军备负担是否增加了？这样继续不断地把军备放在极端优先地位，其预期的结果将会如何？我们对苏联军费开支和军备负担的估计精确到何等程度？

据估计，目前仍然有强烈的迹象证明，在军备费用同用于投资及私人消费的费用之间有着逆转的动向……从计量经济学的分析中可以得出推测性的结论。苏联的军备开支对苏联经济的增长已经产生不利的影响。

同公开的苏联人力支出相比，苏联军事人员的实际支出是大大地被少说了。是让计划不能完成，还是精简部队人员？苏联领导人不得不作出抉择。

劳力紧张，缺少用于购买资本设备以提高资本对劳力比率的硬通货，两年农业歉收造成的恶劣局势，劳动生产率指标连续不能完成，又不能输入多少国外劳动力，这些都使苏联政府除了降低计划指标以符合有效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外，别无其他选择。苏联政府和党能够考虑认真裁减武装部队吗？

苏联军备计划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后果，可能已经影响了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共同均衡裁军谈判中的地位。

五、农业产量在苏联经济中的作用比在美国经济中更大。近年来，这两个国家农业发展的变化如何？苏联经济由于一九七二年的农业歉收，发生了什么特殊问题？

虽然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迅速下降，但苏联的农业产值仍占国民总产值的五分之一以上，并使用了全部劳动力中的三分之一。在美国，农业产值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点二五，使用了全部劳动力中的百分之五。

苏联农业净产值的增长比美国快得多。苏联农业产量增长指数(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一年比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五年)为一百八十四,而美国则为一百三十二。

六、据说消费主义已经出现在苏联经济之中,从优先次序、计划和执行结果的变化来看,这个说法确有依据吗?

指标没有提高多少,计划也没有多大不同,但是目前苏联领导人看来确在认真对待消费者需要的问题,不过要满足苏联消费者的需要却是更加困难了。

近年来,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除了汽车和高档食品如肉类以外,都出现了有利于买方的情况。在本计划期间,要想买到汽车是个大问题。在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五年期间,如果能按计划向公众出售汽车,就可以回笼当前六百亿卢布存款中的六分之一,从而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并提高消费者的情绪,……据估计,到一九七五年,苏联将有三百万辆私人汽车,将近一九七〇年的三倍,但仍然是大约每一百个苏联公民中才能有一辆汽车。

尽管农业受灾,却进口了牲畜饲料,以维持野心勃勃的增加肉类生产的计划。然而,当食品改善、餐桌上有了肉类和其他高档食品的时候,淀粉类食品却少了。苏联政府仍然未能满意地解决那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人民提供高质量的食物。

在另一个主要的消费领域——住宅方面,情况更不美妙。

按照目前城市住房的增长率,至少还要再等六年,才能为每一个家庭提供一套住房……

按西方标准来说,苏联建筑的质量低劣,设计没有创造性。此外,城市中大约还有百分之二十的公家房屋没有自来水和下水道。就城乡全部住房而论,这个数字可能超过百分之五十。十年来,每人平均居住面积从九平方米左右增加到十一平方米。

汽车虽然多了,但缺少加油站、修理所和良好的道路,从而

降低了汽车的作用。

苏联的国土虽然比美国大一倍，但公路长度，包括城市街道在内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一九七一年为八十四万七千五百英里，其中仅有百分之十六为柏油或水泥路面，百分之二十四铺了砂砾，硬面道路合计仅占道路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左右。百分之六十的道路是烂泥路，一遇雨天就难以通行。

七、一九五九年以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是现在可用以进行分析的资料，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劳力的缺乏会限制苏联将来的发展吗？劳力的缺乏在多大程度上是熟练技工不足的问题？对教育的投资是否有助于克服劳动质量的问题？

六十年代苏联人口统计趋势的主要特点是，出生率的稳定下降和随之而来的人口增长率的降低。

如果出生率保持在一九七一年的水平，那末，苏联人口到公元二千年初将达到三亿二千万，即比一九七三年的两亿四千九百万增加七千一百万，也即增长百分之二十九。如果出生率象六十年代那样下降，那末，下个世纪初的人口总数将为两亿九千二百万到三亿零六百万，即增加百分之十八到百分之二十三。

苏联各民族不同的人口增长率，可能同整个人口增长率下降一样，使苏联领导人感到头痛。包括大俄罗斯地区的苏联欧洲部分人口增长率低于平均水平，而中亚各共和国则增长最快。这可能促使苏联领导人采取明确的政策以鼓励出生率低的地区增加人口。

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将会限制苏联当前的和今后的计划发展。

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业增长计划，或许就是当前苏联经济活动受到劳动力供应限制的最明显的例证。一反过去工业从业人员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三到四的惯例，当前的计划只要

求每年增长百分之一·三，产量的增长几乎全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鉴于一九七二年的劳动生产率计划没有完成，看来劳动效率问题将会影响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而且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劳动力不足的限制还会更严重。

教育制度影响了劳动力的质量。

苏联宣称，它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七的居民都是识字的，而在一九二〇年只有百分之四十四。目前已经实现了八年普及教育，并且还要在全体青年中实现十年普及教育。尽管有这些成绩，但是劳动力却并没有象近来的教育成就所力图暗示的那样，是受到过高度训练的。目前约有三分之一的苏联劳动力只受过不到八年的教育，而且每十个工人中甚至连一个大学毕业生也没有。

苏联的教育只对工程师和科学家有利。

在一九五〇年，苏联在研究和发展部门中工作的人数只有美国的一半。一九五一到一九七〇年期间，苏联这一部门中的工作人数比美国增加得快，苏联每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三，美国为百分之六点三。结果，一九七〇年苏联研究和发展部门中增加的工作人数为美国的两倍半。

八、同美国及其他经济发达国家发展贸易关系，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的稳定因素，从而在政治上是有利的。同发达国家进行贸易对苏联的经济活动有什么重要意义？增加经济交流的前景受到些什么限制？苏联航运、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增长主要是为了政治的扩张还是经济的发展？

一九七二年十月的贸易协定，是当年五月份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以来美苏关系正常化进程的继续。关于债务、商业便利、信贷、航运以及其他有关问题的协定，展开了大幅度扩大贸易的前景。然而，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国会批准给予最惠国待遇

的问题。其他一些涉及到贸易关系的问题，将由专门为继续正常化关系而设立的美苏联合委员会来处理。

虽然对贸易的限制已经减少或消除了，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其中包括有关联合投资工程及改变项目等问题。这些不仅涉及法律上的障碍，而且同两国经济制度的差异有关。美苏之间的工业合作，要求进行认真的谈判，双方都要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作出重大让步才行。

扩大苏联同西方贸易关系的最大障碍，是苏联缺乏对进口的支付能力。

苏联无力迅速扩大对硬通货国家的出口，以便支付不断增加的进口，结果从一九六〇到一九七一年中，苏联同这些国家的贸易差额年年都出现赤字，平均每年达到两亿七千万美元。一九七二年大量进口西方谷物，贸易赤字至少达到六亿美元。直至六十年代中期，这些赤字主要靠出售黄金，其次靠西方政府提供的中期信贷来弥补。

由于黄金储备的减少和能够得到更多的西方信贷，苏联越来越多地使用由西方政府担保的中期和长期贷款，代替黄金作为弥补贸易赤字的手段。

一九七二年，苏联总共出售黄金两亿五千万到三亿美元。由于西方市场黄金价格较高，因而苏联可以增加黄金出口以便支付从西方的进口。苏联也希望增加值钱的原料、尤其是石油制品及天然气的出口。但是，由于苏联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苏联国内和东欧对石油的需要越来越多，如果没有东西方大规模的联合开采，增加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前景将是暗淡的。

缺少硬通货，是苏联领导人急于要同西方公司商谈联合生产的原因。

为了能长期保证有足够的硬通货供应，苏联正试图用国外

信贷来发展不供出口的产品生产，然后用生产的产品抵债。一九七三年，在为数三十亿美元的长期和中期债款中，约有百分之二十是这种以产品清偿的合同。苏联正在同西方商谈许多大型联合项目，其中有同美国商谈的 LNG 项目以及开发各种石油、天然气和矿山的工程，都要求以产品清偿。

苏联还把扩大对外经济关系的注意力伸向发展中国家。斯大林死后开始的苏联援外计划保持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但也带有部分的经济动机。

在这时期内，苏联对外援助的基本目的仍然照旧不变——损害其他大国利益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并把自己作为受援国经济发展的模式。虽然，这些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动机依然还是苏联援外计划的决定因素，但是经济上的动机也越来越重要了。近来，许多援助协定的签订主要是为了增加燃料、原料和消费品的进口，并推销苏联的机器和设备。

苏联对外经济扩张活动的结果是，苏联商船队的增长比整个经济的增长快得多。一九七二年十月份的美苏航运协定兼有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

渔业方面，苏联北极圈内的北海航线以及与经互会成员国的海运关系，都具有经济的和政治的意义。

当苏联商船队的迅速发展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政治和军事利益以后，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经济上的原因了，主要是为苏联外贸提供运输工具，增加出口，提高苏联的硬通货支付能力，特别是减少租用外轮所引起的外汇消耗。

和美国相比，苏联的人口多而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劳务却少。尽管苏联工农业生产比美国增长得更快，而且自一九六〇年以后投资增长的比例也更大，但实际上两国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差距并未缩减。

两国都把相当大的资源用于国家安全计划，因而就限制了用于使经济现代化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民用计划资金。将有限的资金和人力优先用于军事，是对苏联民用计划的主要限制；而在美国，看来则是财政上的限制成为联邦政府改善人民生活的主要阻碍。美、苏之间究竟谁的军事负担更重，取决于对优先次序选择的主观估价如何。

表二 经济数字

	苏			美	
	1970	1971	1972	1971	1972
国民生产总值(10亿美元, 1971年价格)	551	570	580	1,050	1,118
人口(年中, 百万人)	242.8	245.1	247.5	207.0	209.0
平均每人产值(1971年美元)	2,269	2,326	2,343	5,072	5,349
工业生产指数(1960年为100)	195.2	207.0	217.5	161.3	172.7
农业净生产指数(1960年为100)	144.4	144.6	134.7	123.3	124.4
劳动力总数(包括武装部队)					
校正后的年平均数(百万人)	124.2	126.0	128.1	86.9	89.0
非农业劳力校正后的年平均数(百万人)	86.7	89.1	92.1	75.7	78.2
农业劳力校正后的年平均数(百万人)	37.5	36.9	36.0	4.5	—
总投资额指数(1960年为100)	195.3	208.7	223.2	146.7	—
平均每人消费指数(1960年为100)	147.8	153.5	158.7	135.9	—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美国国会联合委员会编的《苏联七十年代经济的展望》一书 人民出版社供稿)

修正主义的垄断阻碍了 技术的发展

〔新西兰〕《人民之声报》编辑部

在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的竞争中，苏联在武器的数量和技术方面都遥遥领先。但是，苏联的其他工业部门，正如西方报界所评述的那样，是个挂着“军事巨人招牌的叫化子”，在技术方面正陷于困境。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哀叹说：“最薄弱的环节是那些同科学成就有关的实际应用和大规模的生产问题”。《真理报》在去年一月的一篇社论中也抱怨说：“许多部门已连续几年没有完成引进新技术的计划和在生产中实现机械化及自动化的计划。”这就清楚地表明：苏联是腐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提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指出：“这种垄断也同任何垄断一样，必然要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向。既然规定了（虽然是暂时地）垄断价格，那末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消失了”。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把国营企业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那些对生产力的发展毫无兴趣、对人民的需求毫不关心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新型的资产阶级分子，却对牟取最高利润这个主要目标以及在企业管理中追逐最高定额最为关心。他们根本没有对新技术流露出任何喜爱，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垄断地位的实

力，制定垄断价格，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利润。

在一九七二年第九期《货币与信贷》中的一篇文章指出：“一九六九年，当苏联工业的实际利润率比通常水平高百分之四十的时候，仪表和机电工业的利润率则分别高达百分之一百九十和百分之一百六十。这种高额利润率扼杀了企业改进产品的兴趣。”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真理报》上一篇文章说，采用新技术操作、新工艺和新设备，在一定的时间内，可能导致生产下降，从而使奖金和利润下降，这一切对企业管理来说，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灾难，因此，车间将会拒绝采用新技术。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报》在今年四月二十五日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是全俄设计院的院长，他在文章中指出，在设计院里“已经设计出许多种新机器、仪器和设备”，但是“没有任何一种机器或仪器在连续生产中被批准使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价格低于劳动力价值，资本家就是以此作为加强对工人剥削的手段。对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来说同样如此。苏联修正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在苏联的家庭中，每人平均收入低于最低物质生活水平的是太多了，至少有二千五百万人。因此，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情愿使用庞大和廉价的劳动力而不愿意进行技术革新。正如一九六九年第十二期的苏联《共产党人》杂志所说的：“廉价劳动力阻碍着技术进步，因为，从提高利润率指标来说，使用体力劳动比使用机器是更为有效的途径。”今天，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在苏联工业部门的工人总数中仍占一半以上。苏联《劳动报》在今年四月六日的一篇文章中透露，甚至在西伯利亚最大的秋明毛纺联合企业中，“体力劳动仍占百分之五十以上，此外，几乎全部的运输、装卸和车间的其他工作，迄今都没有实现机械化”。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社会主义工业报》的

一篇报道中透露，在卡拉干达冶金联合企业里，将近有一半的工人从事体力劳动操作，这家联合企业曾被吹嘘为“最年轻的基本上实现高度机械化的黑色冶金企业”。为了赚更多的钱，苏联机器制造工业部门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任意提高新设备的价格。一般都要比革新前的产品高几倍，极其严重地阻碍了新技术的普及。对上述问题，《货币与信贷》杂志写道：虽然目前广泛使用的新自动钻孔机的实际效率较之过去提高了两倍，但它的价格却提高了十倍。一九七二年第二期《经济问题》杂志报道说，拿苏联毛纺织工业的新旧机器设备来比较一下，可以看到，新机器价格的增长率大约是工作实际效能增长率的四倍。

由于未能引进和普及新技术，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人为的障碍。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整个苏联社会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按照一九七三年公布的《苏联政府决议汇编》的说法是，在苏联每年的创造发明中，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用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一九七五年第三十五期的《经济报》泄露，一九七三年的化学和石油机械制造部只使用了百分之十二的正式鉴定过的新技术。因此，苏联工业的设备依然是过时的，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这也就成为苏联国民经济的一个严峻问题。据苏联报界的统计，在一九七一年，百分之三十四的金属切削机械设备和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纺织机械是过了时的产品。在黑色冶金工业中，甚至有百分之二十多的滚轧设备还是沙俄时代的遗产，占全国三分之一的一百多万台过时的机床每年必须进行耐心的维修。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第三十一期新西兰《人民之声报》安徽省庐江县插队知识青年庄勤译）

现代经济学的动向

〔日〕浅野荣一

经济学的第二次危机

英国女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经济学现在正面临着第二次危机。这里所说的危机，是指我们今天所遇到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通货膨胀、公害、南北问题、精神的饥饿等问题，今天的经济学完全不能给它下诊断，并一点也提不出给它适当治疗的处方。实际的情况正如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保罗·塞缪尔逊所说，今天的通货膨胀，正如生物体所生长的癌一样，并不是今天的经济学所能治疗的。此外，对于这些问题，各国各式各样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对它们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对策，但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发生过一点效果。

但是说到第二次危机，当然已有过第一次危机。罗宾逊认为，第一次危机发生在一九三〇年。第二次危机和第一次危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先从最初的危机来说明。

在三十年代的十年中，是充满世界经济大危机和大量慢性失业的黑暗时代。一九二九年十月从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很快地扩大到全世界，以前活跃的繁荣时代，一变而为沉浸在企业倒闭、失业、社会不安的灰暗的状况。经济危机从一八二五年以来，差不多以十年为周期，不断地袭击着资本主义经济。从一

八五七年的危机以后，以世界的规模，几乎在各国同时发生。危机以后的萧条，一般是一、二年就结束了，不久就是复苏。但三十年代的萧条，却年复一年的日益深刻化，美国一九三三年的失业者人数达到一千五百万人。

在这种事态面前，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和政治家们，除了重弹自由放任的主张之外，什么对策也没有。这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学，都是教导大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之下，由价格机构的巧妙活动，实现自动的经济调节。国家对于经济的干涉，只会搅乱这个自然秩序。如果商品的供给过剩，价格自然下降，因而需求增多，供给减少，最后供求趋于一致。失业也是一样，会由于劳动力价格的降低，自然会趋于消失。

长期的危机，深刻化的失业，使人对上述经济学的权威产生了怀疑。在经济学第一次危机发生时，使历来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基础，原子论的社会观崩溃了。树立起新的经济学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他认为历来的经济学把社会进行分解，还原为平等的原子，即企业与家庭，或者认为社会是由平等的个人所组成，因而把各个人、各个企业和家庭的合理的经济活动加以调整，就能够把握作为单纯的总体的社会经济的合理运动。在资本主义经济之下，各个企业和各个家庭，各自为追求最大的利润和最大的满足而进行合理活动；从这个想法来推断，作为社会全体，也要为满足某种极大的需要而合理的活动。但是奇数和奇数的和并不是奇数，各个构成部分的行动，并不是单纯合计起来的全体的活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各个企业和家庭即使是合理的行动，作为社会全体，却产生了失业这样的不合理的结果。凯恩斯认为，这种不合理的结果所产生的经济机构，是当时失业和危机的原因，为了解决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他提议国家采取积极的经济政策，以代替自由放任政策。就

是这样，第一次经济学的危机，由于凯恩斯登场而解决；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全面地采用了凯恩斯的政策，到那时为止，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宿命的难于治疗的三种疾病，就是危机、失业和贫困，得到了减轻。

但是在今天，作为采用凯恩斯政策的结果，又面临新的资本主义疾病。它到底是由什么原因所引起的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凯恩斯政策，在减轻和治疗古典资本主义的三种疾病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战后采取这种政策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面临过真正的危机，或长期深刻的危机；失业率大幅度减低了，差不多能连续地出现充分就业的状态；同时全面地提高了生活水平，消失了极端贫困的现象。但是在战后，在治好这种疾病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三种新的疾病：代替周期的危机和萧条，是那差不多十年为周期的国际通货危机；代替失业的是通货膨胀的发展；代替国内的贫困，发生了南北问题（北的先进资本主义各国的繁荣和南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停滞和贫困的对称）或物质的贫困代之以精神的饥饿的进展。这种新的疾病的产生，明显地是和战后采用的凯恩斯政策有密切的关系。

凯恩斯为了克服当时的疾病，提倡由国家创造有效需求的政策。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陷于危机，或者不能摆脱危机的原因，是对企业生产物的社会需求、也就是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就需国家增加财政支出，来填补这不足的部分。他只从增加有效需求的一点来说，主张建造金字塔和大寺院，甚至发动战争都可以。在战后，根据凯恩斯这个药方，使国家的财政规模对

国民收入的比率，从战前(在平时)的百分之十以内，实际上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如果包含地方财政，则增加到约百分之三十，结果是增强了财政对经济的影响，大大增加了国家控制危机的可能性。

骤然看起来，似乎这个政策是无视经济的生产方面，而偏重于它的消费方面。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认为，对于经济供给方面，过去的理论已经作了充分的分析。他在这书中，主要是对需求方面进行分析。正因为这个原因，凯恩斯的理论，被称为有效需求原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关于增加需求的手段。目的是增加生产，进一步说，在于使当时经济萧条的情况下闲置的生产设备全部发动起来。在资本主义经济之下，产品虽然生产出来了，如果没有需求，企业就不能够由出卖而获得利益，因而使设备和劳动力不能得到使用。因此，要由国家创造需求，来帮助企业的生产活动。凯恩斯的基本想法，是把资本设备的充分周转看作为克服危机和消除失业的特效药。需求的创造，不过是手段，在这里资本设备的充分周转是医治资本主义疾病的特效药，因而由国家创造出需求是唯一最好的手段，这是凯恩斯政策最重要的特性。

所以，战后的经济政策，是由国家创造需求来刺激生产的增加。通过以财政为杠杆的增大需求政策，刺激生产的不断扩大，向各国政治家显示出国民生产总值的急速增长和走向大国的道路。人们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内容一点也不加审查，把分配的不公平，看作是小事，也无视由于国民生产总值扩大而产生的资源的浪费和公害。因而，到了由国民生产总值扩大而来的副产品的毒害使人不能忍受的时候，人们才开始来重新考虑国民生产总值的万能主义。代替国民生产总值，转而注意到国民总福利。饼子的增大，的确是福利增大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饼

子对各人分配不公平时，可能并不能使全体的福利增大。如果在饼子增大的过程中，有破坏福利的情况，那甚至会使全体的福利减少。现在的情况，可以说正是把这种可能性发展为现实了。

对成长政策的反省和价格机构的再检讨

关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神话，现在已从各个方面崩溃了。首先是从国民生产总值的实质来说，虽然没有生产的扩大，不会有较高的就业水平和丰富的消费，这是事实，但并不是说只要生产，什么都是好的。曾有过这样的事，有某个南方小国，为符合人们的需要而进行充分的生产，结果是经济反而停滞；并产生了失业。就在这个国家，来了原来没有的疟蚊，并繁殖起来，于是，很多人生病了，为了加以治疗，开始生产治疗这种病的药品。结果，失业没有了，国民生产总值扩大了。但是，这个国家人民的福利真的增加了吗？这样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并没有使人们幸福起来。应该做什么，这是社会必须选择的。但应该怎样做？如果不慎重的决定，就会陷于公害之苦。

关于刺激扩大生产的方法，也要进行重新的考虑。根据凯恩斯的诊断，由于需求不足，即使不扩大生产，也会发生失业现象。所以，战后由国家来创造需求，企业也运用通过广告等刺激消费需求的做法。流行着“用了就丢掉”时代的语言，把浪费看作美德，由不断改变新的式样和生产新产品，使人们去追逐新的需求。结果是使人们的欲望无限地提高，进入到无论买多少也不能满足的状态。这就是所谓精神的饥饿。人们被丰富的物质所包围，但却苦于贫困感。于是，人们就要想，对于自己来说，究竟什么是真正的需要？

关于国家创造需求的学说，也引起了批判。在美国，扩军备战是扩大财政支出的主要内容。在日本，幸运的是这方面支出的比重还是比较小。和西德的把重点放在进行住宅建设相比较，日本是采取把重点放在道路、港湾建设和企业设备的扩充上。这使日本的居住情况，在先进各国中是水准最低的，成为人们生活痛苦的最大原因。另外在它的反面，建筑业、汽车工业等，则获得了不相称的巨额利润，和政治联系起来，更加深了它的腐败情况。

对于战后成长政策的重新考虑，也发展到了对价格机构的再检讨。作为到现在为止的经济政策基础的经济理论，与其说是凯恩斯的理论，还不如说是和凯恩斯以前的理论相结合起来的自称为新古典学派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如果真的放任其自流，确实会如凯恩斯所说，由于有效需求的不足而陷于经济停滞状态；但是，如果通过凯恩斯的政策，由国家来补充有效需求的不足，就会使价格机构顺利活动，创造出经济内部的均衡状态。战后由这种理论所支持的国家政策，只限于财政支出，在自由主义经济的名义下，保证着企业的自由经济活动。但是，企业已经成为今天这样大的规模，与其说是依据市场机构而行动，不如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行动。这种企业普通被叫做寡头垄断的企业。在寡头垄断企业出现之后，价格机构就不是象经济理论所说的起自动调节作用了。由于提高价格，生产限制，销售地区协定等，实际上是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为企业的盈利而行动。因为新古典学派理论是无视这种市场的现实，提倡的是成长政策。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平等经济上的缺陷，并年年扩大起来。现在就是要问，在寡头垄断之下，市场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如要纠正现实的这些缺陷，应该采取什么对策。

最近经济学的动向

国家经济活动的范围，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广泛。它不局限于凯恩斯所提倡的补充民间经济部门有效需求的不足，环境问题、都市问题、土地问题、医疗问题、年老和残病者问题等等，今天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犹如山积，而这些问题，几乎都是民间经济部门所不能解决的。因为这些问题，几乎都不是通过市场来供给财物和服务，因而也不是诉之于人们的利己心和利用价格机构所能左右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国家采取一定措施来应付。究竟国家经济活动所及范围有多大？因而国家究竟要根据什么原则来进行活动呢？这方面的考察是最近经济学的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在公共经济学的名义下，很多人正在这方面进行研究。

历来的经济学，只要处理好关于市场的各种问题就可以了。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在破坏了过去的自给自足经济之后，把一切都包摄在商品经济中的缘故。但是如上面所说，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不能包括在这个市场中的领域扩大了。不仅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一天一天的增加，而且，必须注意到，原来为市场所全部包括的部分，现在却未必如此。例如，随着生产而来的费用，虽然认为可以由企业的成本计算，把它全部包括进去，但现在却发生例外。工厂的煤烟，使附近的田地受害，受害者要求赔偿的金额，向来在工厂产品的成本计算中是看不到的，但从社会来看，是生产上所牺牲的费用，那是不用说的。最近这种私人的费用和社会的费用的背离，成为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受到广泛的注意。这个问题是在广义的公共经济中来处理。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加尔布雷思，把今天的经济体制

称为大法人企业体制或新产业国。今天的法人企业是过分的巨大化，它有为自己的利益对一切进行计划的能力，结果是大法人企业与其说随着价格机构来行动，倒不如说它支配着价格机构，特别是由于和国家结合的加强，已经达到了能够支配的境地。原来由于经济寡头的垄断，而使价格机构被歪曲的情况，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加尔布雷思则更进一步，从经济体制变化的问题中来考察。还有，加尔布雷思是把巨大企业问题作为国民经济内部问题来处理，今天则更注意到跨国公司活动对于各国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总之，由于最近石油危机而表面化的大企业问题，不必说今后它的重要性将会日益地增加起来。

最后，对于如此巨大企业的消费者方面的研究，也比过去增强了。到现在为止，在象帝王一样的大企业体制之下，消费者事实上只是企业所玩弄的工具。因此，在对消费者主权究竟是什么进行重新考虑时，为了恢复消费者主权的消费者运动，和对于企业进行法律上的限制的问题等等，也在开始研究。

现代经济是把它所积累起来的毛病都爆发出来了，并急迫的要求解决。历来的经济学，都没有能够加以充分的解答。在上面所说的各个领域，还处在暗中摸索的状态，正如罗宾逊所说的，正确的解答，是要经济学的思想方法进行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才能产生。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三月日本《中央评论》月刊 吴斐丹译）

汽车制造业和汽车工人

〔英〕赫·贝农

在美国，每天有六十五名汽车工人在工作时倒毙在工厂的场地上。每年平均大约有一万六千名汽车工人在工厂内死亡，其中半数以上是由于心脏病突发而致死的。再加上另外的一些数字（不包括因工伤事故所造成的后果），六万三千个失去工作能力和一百七十万个丧失或损伤听觉的病例，你就会发现汽车工业有如越南战争一样，它给美国工人阶级带来了惨重的伤亡。

福特汽车公司的詹姆斯·阿拉尔迪斯先生在一九七三年写的一份报告中，更确切地证实了这样的看法：在装配线上的工人们忍受着异常的、高度的紧张。但是这份报告一直没有能够发表。在该公司的一份意见书中，也承认装配线上暴露出来的问题远远超过估计。

在汽车工业部门工作有时是危险的，经常是处于闷热、尘灰、臭味和嘈杂之中，而且这些工作往往还是死板乏味的。在一次又一次单调而疲劳的操作中，需要注意力集中，需要灵巧敏捷和精神上的忍耐力。有些工作根本不需要什么技术。早在一九二五年，亨利·福特曾经估计过，在所有新工人中，百分之七十九的人只要经过八天时间的训练就能成为熟练工人，而百分之四十五的人只需要一天时间的训练就足够了。

一九二〇年，动作和时间研究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克·W·泰勒以典型的傲慢的口吻议论着：“在现代化工业中不再需要打

手般的彪形大汉了。”但是他却忘了补充说，手工业工人正在变成同时代不相容的人。在机器统治历史舞台的机械化世纪里，不需要技术已经成为时代的主要特征。象鲍勃·莫里斯那样在报刊上被称作“使克莱斯勒汽车厂瘫痪的人”，在锅炉间已经工作了二十五年。他的女婿在那里每晚要工作十小时，每小时要从输送带上卸下七十二根车轴并把它们装在货盘上。他说，他宁愿进温逊·格林监狱。

在美国，装配线以尽快的速度运转着。在俄亥俄州洛斯顿的通用汽车公司的装配线上，每小时生产一百零五辆汽车；每三十五秒钟工人要操作一次；在超过八小时的上班时间内重复同样的动作达一千次。

有些人确实无法忍受这样的工作条件。詹姆斯·约翰逊在美国埃尔斯顿的克莱斯勒汽车厂的车轴车间工作。他和领班吵架后离开了车间，回来时带了一支猎枪，把两个领班和一个工作调度员杀害了。辩护律师认为埃尔斯顿厂的工作条件是如此的恶劣，约翰逊对他的行动可以不负责任。法官和陪审团访问了这个车间，他们发现那里的情况是“非常令人不满的”，因此同意约翰逊在杀人时陷入了暂时的精神错乱的意见。

还有另一些多少带有戏剧性的事件也反映了同样的紧张情况。杰拉尔德·威廉逊在一九六〇年时也曾经在克莱斯勒汽车厂工作过，他现在中部地区的赖顿厂工作。他淋漓尽致地描绘着自己的工作：“我被指定在车厢顶部安装塑料类的物件。我做这种工作已近两年了。最近，我的健康状况已经变得如此之坏，以致我不能很好地得到休息。我无法从工作中脱身出来，即使在梦中，我还是在装配线上。这使我的家庭生活处于极度的紧张中。装配线上的每一动作都好象一次急速的冲刺。人们匆忙地东奔西跑，为的是想提前完成几辆车子，以便在十分钟的休息时

间结束时，能为自己留下几分钟的余暇。看来劳动就是这样的无休无止地进行着。”

为威廉逊治病的医生劝他调换一下工作，在他健康没有恢复前，他必须离开装配线。但是克莱斯勒汽车厂并没有这样的怜悯心。他要么留在装配线上，要么就离厂。最后他只好离开工厂。

在福特汽车公司的霍尔伍特工厂里，降低了招收新工人的年龄标准，让许多十八岁的小伙子在装配线上工作。他们是受金钱的引诱去到那里的，但是，不久他们发现那里并没有有利可图之处。他们不喜欢装配线。他们做的最后一道工序是装上车轮。他们不完成应做的工作。他们讨厌工头，还把土制炸弹掷到垃圾箱里，引起火焰直冲工厂的屋顶。一九六九年夏季的某一天，他们联合霍尔伍特厂的其他一些工人拒绝工作。天气太热了，装配线可以运转，但是他们不愿操作。福特公司需要汽车，管理部只好同这些小伙子们和解。他们掀开了屋顶，情况好了一些吗？是的，稍微好一点儿，但是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冰冻柠檬水。好，有冰冻柠檬水。但是小卖部里只有橘子水，他们勉强同意把橘子水当作代用品，但喝完后就回家了。

象这样的一些事例，促使汽车工业的资本家、工会领导和政治家们意识到在汽车工业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要使企业获得利润，生产就必须持续不停地进行，从装配线上下来的汽车必须是完好的，数量是按计划完成的。但是，工人中的无纪律行为严重地影响到这一逻辑。这一真理的深刻性早已表现在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身上了，他在肯尼迪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之前，曾于一九五〇年在福特公司任职。他对公民权利和正义事业持有明显的自由主义的观点，但是对于工人和有组织的劳动力却是例外。戴维·霍尔伯斯坦在他的《出类拔萃》一书中说，“麦克纳

马拉的观点是出奇的强硬。”他之所以强硬，是因为在麦克纳马拉的数字和图表中，“劳动力”是固定在装配线上的，任何扰乱，整个平衡就会陷于混乱。“劳动力的作用不是人的作用，而是一个超过人的作用的因素。”

但是随着骚动的继续，汽车业的经理们不得不——不管怎么难以理解——把劳动力当作人来看待。底特律的福特公司工会副主席马尔科姆·L·丹尼斯告诉我们，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间，福特厂的旷工率上升了一倍，在每百个工人中就有一个不遵守纪律的人，而人员的流动率也上升了两倍至两倍半。他说，这些“困难”是由于“工人们的坚韧性普遍下降”的结果。他继续谈到在工人中滋长着的一种“对接受严格的工厂纪律的对抗”和“几乎习惯地破坏我们工厂的规章制度”的行为。所有这些，丹尼斯都归因于“劳工问题”的社会背景，由于他们是“在散漫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对于其他一些人的社会标准是不予理会的”。

路易斯·伦特伯格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举行的“改变工作面貌的西方集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警告说，令人厌烦的工作和无计划性已经把美国引向“最终毁灭”的道路。他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比其他的人更激进，但却是不可行的。那就是只有放弃机器大生产，重新让工人从事手工劳动，才能防止这样的灾难。

在大西洋的这边，人们表达了相似的意见。国际劳工组织的威尔弗雷德·詹克斯说，欧洲工人正在变成“一股危险的激流”。在一次汽车业联合会高级职员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吉尔伯特·约瑟普（劳工部新设立的劳工调查处官员）说，“在英国工业中，很多的企业情绪低沉，人们不安心于他们的工作，导致了劳动生产率下降、旷工、劳动力流动频繁和工业动乱等一些真正的问题。我们可以预言，如果现在再不考虑改革，这些情况将会变

得更坏。”

利用装配线从事汽车生产，到现在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威廉逊只不过是千万受害者的一个。在这个世纪的繁荣年代里，当底特律的劳动力流动和“骚动”高涨的时候，法官们在处理失职事件时，还关心小伙子们在“现代化车间”里的“令人腻烦的工作”，垄断资本家们也尝试着征询劳工的意见和采取“协商”的态度。但是，这一切都随着繁荣的结束而告终了。

现在，我们又再度处于萧条的边缘。英国汽车工业四月份的产量是十四年来最低的。英国的雷莱公司已最终走向绝境。到处都在谈论着“合理化的工业改革”，我们的注意力已不再是装配线上单调乏味的工作了。约翰·克莱尔在《观察家》上评述克莱斯勒汽车厂的罢工时写道，可以说“谈论那里的工作条件是闷热的、嘈杂的和令人腻烦的这一类话已不再是什么新闻”，每小时从输送皮带上卸下七十二根车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说得对，当然，这是司空见惯了的，肯定说不上是新闻了，因为当前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和萧条。这才是今天的新闻。要在我们大家没顶之前拯救沉船。因此，汽车工人还得等待，只能到经济复苏时，我们再开始来谈论工作的“单调乏味”。

但是，在目前的情景下，事情并不是那样简单。那些工作在装配线上的人们，那些制造出汽车使道路为之拥塞的人们，在战后时期的繁荣和大量销售中锻炼成长起来了。青年人为了赚钱来到工厂。正如福特厂的一个工人，他写出了嬉皮士乐队风行一时的一首名为《金钱》的歌曲：“金钱买不到世上的一切，这句话千真万确，可是，我要是得不到它，也就会没有这一切。”

多数人不愿作汽车工人。他们是为赚钱而来，在装配线上忍受着，但得到的却是解雇。汽车工业资本家们这种“今天在这里，明天就请走”的做法，促成工人在装配线上采取罢工、怠工、

破坏和敷衍了事的相应态度；这就是人们试图整顿市场并使之合理的全部情况。

沃克斯霍尔公司早已对劳动力作出了大幅度的裁减。这个公司宣布了一个自愿裁员的计划。虽然遭到了工会代表们的强烈反对，仍然有两千余人被裁减。“这个工业算是完蛋了，”他们中的一个人说道，“我们刚巧是第一批。傻瓜才会在那里再呆一个短时期，到头来只落得个解雇，我宁愿现在乘机离去。”一个工会代表告诉我说，“这些青年小伙子们来到工厂，他们借了房屋保证金，买了公司的一辆汽车，接着就负了债。你知道这里五十镑，那里二十镑，汽车库又花上十镑。你是明白这类事情的，在他们发觉前，早就被公司的锁链束缚住了。”确实如此，债务能使资本家束缚住工人。

劳动力市场对资本家采取自愿裁员的办法作出了限制。不会有多久的时间，一场斗争就会来临。一位工会代表说，“我看得出他们是多么想设法关闭这些工厂。为了资本家的利益，他们应该这样干，但是政府不允许。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犯罪率要因此而上升。”

当然，犯罪的原因是不同的，即使在个人犯罪和有组织的抢劫之间也是如此。但是我想，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每一次的工商业衰退——汽车工业受影响最早和最深——必然伴随着广泛的社会动荡，这是掌权的人们所熟知的。

现在英国的雷莱公司正准备“国有化”。对于在装配线上工作的人们说来，这一切看来都是一样。英国的雷莱公司正在变成另一个福特公司。这对资本家来说将变得更为有利，有些工作可能更要流水作业化，从福特公司传来的情况就是这样。

要是争论的问题不是仅仅涉及国家对个别企业所采取的特定的财政措施，而是在整个汽车工业中并在交通运输业中执行

社会主义政策的话——有计划地生产少数类型的汽车，重点增加生产公共交通工具，从生产私人汽车转变到生产公共汽车和拖拉机等，总之，在生产方面执行意味深长的转变的政策，那末，情况可能会不一样了。但是，这样的政策只能来自一个根本改造过的政治结构。

不如此的话，谁能知道情况会变得怎样呢？或许会发生动乱？肯定将会有一次斗争。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专门给汽车安装轮胎的工人，是难于照料好自己和孩子们的。用他们的话来说：“我们在一九二〇年没有能够取得成功，在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历程后，如今又重新回来了——五十年血迹斑斑的岁月。如果我们这次再错过机会，那将会有另一个五十年。所以我们要坚持斗争下去。”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二日英国《新社会》周刊
乌金译）

大城市在消瘦下去

〔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犯罪、捐税、破旧的学校、恶劣的住房——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加速迁出大城市。现在，官员们正在制订计划要刹住这种逃跑现象。

美国绝大多数的大城市，在几十年的不断扩大之后，现在发现它们的人口在下降了。人口向郊区和小市镇的倾泻，正在使一些城市的人口缩小到了本世纪的最低点。

圣路易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人口已达到了一八九〇年以来的最低点。波士顿、匹兹堡和泽西城的人口，自一九〇〇年以来还从来没有这样低过。芝加哥、费城和底特律现在比它们四十五年前更小了。纽约的人口几乎下降到了一九四〇年的水平。

人口从城市迁出，这是纽约和其他愈来愈多的城市之所以处于财政困难中的一个主要的但经常被人忽视的因素。

大多数逃离城市的人都是中、上层收入的白人。留下的是少数民族、穷人和老年人。这些人最需要市政府的帮助，却最付不起捐税。

衰落的原因是人所共知的。其中有不断增加的犯罪活动、简陋的学校、沉重的捐税和缺少适合的住房等。

美国人口统计局新的报告明确地勾划出了大城市人口下降的趋势。在五十八个人口超过二十五万的美国城市中，数字表明在一九七〇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之间，有三十

七个城市丧失了一些居民。这同六十年代的趋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时这五十八个城市中的三十四个都增添了人口。

“郊区好一些”

提起为什么大城市正在丧失居民这一问题时，人们可以得到各种的答案。

路易斯维尔地区商会研究干事理查德·威尔逊宣称：“这是老生常谈，但是郊区确是抚育孩子的好地方，而城市却不是。那里孩子可以在花园玩，附近有运动场，学校也更能提供活动项目。天哪！谁不知道郊区比城里街上能更好地抚育孩子啊！”

在威奇塔，人们却责怪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〇年的经济衰退。官员们回忆起这个城市的航空工业受到了严重打击，就业人数估计就此缩减了两万人。这些官员们报告说，就业情况自那时以后已得到了改善。

人们要的是什么？

一个担任好几个城市高级职位的广告部经理罗伯特·罗塞尔辩解说，住房是许多人离开底特律去郊区的主要理由。

“有些人希望有一个装有电气和其他设备的新住宅，”罗塞尔先生解释道，“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这样的住宅在底特律至少是难于找到的。如果你和你的新娘希望那种类型的住宅的话，那末，你几乎非到郊区去不可。”

明尼苏达大学的社会学家们报道说，要有土地和独门独户的住宅的欲望正在驱使人们到明尼阿波利斯郊区的愈来愈远的地方去了。近年来，月季票使用的范围已从三十五哩扩大到六

十五哩。

在费城，当局将人口迁出归因于犯罪、令人不满的学校、拥挤和捐税。

这个城市的商业局长哈里·贝林格说：“所有这些都是迁出费城或任何其他主要城市的因素。此外，还有要搬到更大一些和更好一些的房子这种欲望的因素。”

有职业的重要性

缺少就业机会是纽约州布法罗人口外流的主要原因。伊利和尼亚加拉县的地方计划局长小利奥·J·诺瓦克宣称：

“布法罗有非常高的失业率。有不少的人正在迁出——不仅迁出市区，而且迁到这个县的外面去了。”

缺少职位同样被认为是西雅图居民丧失的关键所在。这个地区最大的雇主波音飞机公司，将它的劳动力从一九六八年七月的十万零一千五百人减为一九七二年十月的三万七千二百人的低点。

缺少适当的住房，是许多有孩子的家庭为什么迁出旧金山的一个重大理由。一九七三年，这个城市的死亡率，自三十年代以来第一次超过了它的出生率。学生人数从一九六五年的九万四千名降到了今年的七万三千名。

某些地方在恢复旧观

匹兹堡城市设计人埃文·斯托达特说，他的地区的住房问题，因郊区住房的造价超过了市区而得到了改善。斯托达特先生报告说：“花一万五千美元左右就可以在我们这一带的一半地

方找到一个蛮不错的老住宅了。”

沃思堡计划局长乔治·休曼也看到了大致一样的恢复旧观的情况。他注意到汽油的涨价，使某些郊区居民经常往来于市郊之间的花费太大。

芝加哥官员们指出，正在建筑的几座宏伟的市区办公大楼、百货大楼和公寓是这个城市继续有活力的证据。

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区官员们同郊区一道开办了一个包括七个县的所有新工业和商业税收的捐税合征所。根据共同协议，百分之六十的税款交回给地方政府，百分之四十则在这个地区统一分配。另外一个合同则规定，在市里租费低廉的住房不得超过百分之十六。

明尼阿波利斯市长艾伯特·J·霍夫斯特德坚持说：“市政当局不是主权者，人民才是主权者。对于捐税和职位，城市和郊区不应成为竞争者。”

建筑一座三千五百万美元的会议中心和一亿五千万美元的办公室和百货商店综合大楼这样一类的工程，被看作是激发圣路易斯复兴的原因。这个城市并提出对新的和扩大中的工业予以减税的计划。

在费城，那里有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的有职业的人居住于市区之外，现在规定所有市政府的雇员都必须是市区的居民。官员们还发动了一个要花费一百五十万美元的以吸引新工业为目标的宣传运动。他们的目标是在三年内提供一万个工作岗位。

需要儿童

在一个要堵塞更多的人口丧失的行动中，旧金山最近颁布

一项命令：大楼的房产主不得拒绝将房间出租给有儿童的家庭。

路易斯维尔正在以改善低于法定标准的住房而进行补救。一个步骤是使用三百八十万美元的联邦拨款以建立无息贷款的基金，为附近地区的团体修缮房屋和开办抵押保证集合基金之用。人们要求肯塔基的立法机关允许对经过整修的住宅的财产税延期五年偿付。

象许多城市一样，路易斯维尔对所有在那里工作的人征收一项税款，而不管他们住在哪里。

有些专家预言，今天城市的问题将成为今后几年内郊区的灾难。克利夫兰计划局长诺曼·克伦霍尔兹断言说：

“长期趋势证实，城市不仅正在丧失总人口，而且正在保留更多的要依靠帮助才能过活的一大群人。

“看到我们的郊区大概到时候将继承我们市区的问题，这也不是什么可以令人感到安慰的事。这种趋势是颇为明显的，要想指望中断这个循环的前景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美国城市人口的变化

(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截至 1973 年 7 月 1 日的估计数)

主要城市	人 口	1970年以来的变化
纽 约	7,646,818	下降 3.2%
芝 加 哥	3,172,929	下降 5.8%
洛 杉 矶	2,746,854	下降 2.3%
费 城	1,861,719	下降 4.5%
底 特 律	1,386,817	下降 8.4%
休 斯 敦	1,320,018*	上升 7.0%
巴 尔 的 摩	877,838	下降 3.1%
达 拉 斯	815,866	下降 3.4%
圣 地 亚 哥	757,148	上升 8.6%
圣 安 东 尼 奥	756,226	上升 6.9%
印 第 安 纳 波 利 斯	738,656	下降 0.6%

主要城市	人 口	1970年以来的变化
华盛顿	733,801	下降 3.0%
密尔沃基	690,685	下降 3.7%
旧金山	687,450	下降 3.9%
克利夫兰	678,615	下降 9.6%
孟菲斯	658,868*	上升 5.7%
菲尼克斯	637,121	上升 8.5%
波士顿	618,275	下降 3.6%
新奥尔良	573,479	下降 3.4%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	558,006	下降 10.3%
杰克逊维尔	548,007	上升 3.6%
俄亥俄州哥伦布	540,933	上升 0.2%
圣何塞	523,116	上升 13.7%
丹佛	515,593	上升 0.2%
西雅图	503,073	下降 5.2%
密苏里州堪萨斯城	487,799	下降 3.8%
匹兹堡	479,276	下降 7.8%
亚特兰大	451,123	下降 8.9%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戴维森	449,109	上升 0.3%
辛辛那提	426,245	下降 5.6%
布法罗	425,101	下降 8.1%
明尼阿波利斯	382,423	下降 12.0%
托莱多	377,423	下降 1.5%
奥马哈	377,292*	上升 6.5%
俄勒冈州波特兰	375,948*	下降 1.1%
俄克拉荷马城	373,717	上升 1.5%
纽瓦克	367,683	下降 3.7%
沃思堡	359,542	下降 8.6%
迈阿密	353,984	上升 5.7%
埃尔帕索	353,226	上升 9.6%
长滩	346,793*	下降 3.4%
奥克兰	345,880	下降 4.3%
檀香山	336,000 ⁺	上升 3.4%
路易斯维尔	335,696	下降 7.2%
塔尔萨	335,444	上升 1.5%
塔克森	307,551	上升 15.7%

主要城市	人 口	1970年以来的变化
亚拉巴马州伯明翰	295,686*	下降 1.7%
奥 斯 汀	291,214*	上升 15.6%
圣 保 罗	287,305	下降 7.3%
夏 洛 特	284,738	上升 3.7%

* 包括 1970 年人口普查后归并给城市的地区。

+ 非官方估计数。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丘同译)

苏美海上争霸

编者按：这一期选译了几篇有关苏美海上争霸的文章。从这几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是越来越激烈了。

欧洲是苏美两霸争夺的重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不仅大力加强华沙条约国的军事力量，把它的总兵力的四分之三部署在欧洲；还竭力在欧洲的两翼海域里，掠夺军事基地，修建军事设施，派出大批军舰，企图对欧洲进行南北包抄，割断欧洲对外联系，实现孤立欧洲和称霸欧洲的目的。

欧洲的北翼海域包括北大西洋、挪威海、北海、波罗的海和巴伦支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控制了这些海域，并以此作为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欧洲各国和切断英美供应补给线的基地。今天，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把它的潜艇的百分之六十，舰艇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放在欧洲的北方水域里，显而易见，它正在走希特勒的老路，打算用这支海军来支援它对西欧发动的军事侵略。

在欧洲的南翼地中海和印度洋中，更是波涛汹涌，战云密布。苏修海军不断地向地中海疯狂扩张。一九六六年，苏修在地中海的舰只只有十二艘，四、五年后，增加到七十多艘。在一九七五年中，通过波斯普鲁斯海峡

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外国军舰总数达二百四十三艘，其中大多数是属于苏修海军的。在印度洋，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海军也是活动频繁，它借“友好条约”为名，向印度洋沿岸国家扩张，掠夺别国基地，兴建军事设施，派遣大批军事顾问，干涉别国内政，把一些国家变成了它在印度洋争霸的重要军事基地。

苏修在欧洲的攻势，当然激起了另一个超级大国的不安。现在，整个欧洲形势更加动荡，战争的因素正在进一步增长。这些事实都有力地戳穿了勃列日涅夫炮制的“缓和”神话。

印度洋和海湾地区的军事均势

〔日〕浦野起央

苏联在印度洋的活动

在一九六五年印巴战争中，苏联乘英国停止对印度的军事援助的机会，开始积极地给印度军事援助，这成为苏联舰队在印度洋上活动的开端。

在一九六七年的苏联海军节，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元帅吹嘘说：“目前，苏联海军的旗帜已在七个海域上飘扬。美国也许迟早将知道它已不是海上霸王吧。”一九六八年二月，这位元帅突然访问了新德里，同印度首脑进行了三个星期的会谈，商定了对果阿海军基地建设的援助及其他协议。同年三月，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访问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特别是视察了伊拉克的乌姆卡斯尔港军事基地的港湾设施。同年五月，苏联海军总参谋长查哈洛夫访问了伊朗，视察了潘塔尔·阿巴斯海军基地。同苏联海军首脑这样的访问相呼应，苏联太平洋舰队也对印度洋沿岸各国进行了友好访问：一九六八年三月，太平洋舰队司令长官阿美利科海军上将率领斯维尔德洛夫级巡洋舰一艘、克鲁普努伊级导弹驱逐舰一艘、卡辛级导弹驱逐舰一艘访问了马德拉斯和孟买。接着，由波普林海军少将率领舰队，在七月以前的四个月中，对摩加迪沙（索马里）、乌姆卡斯尔和巴士拉（伊拉克）、卡拉奇（巴基斯坦）、潘塔尔·阿巴斯（伊朗）、亚丁（南

也门)、科伦坡(斯里兰卡)、马萨瓦(埃塞俄比亚)进行了友好访问。其后,这种访问成为定期的形式,并扩展到东非一部分国家,大体上,每年十二月至翌年四、五月期间,大规模的苏联舰队就在印度洋上游弋。

一九七〇年八月,苏联同印度缔结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对印度来说,这个条约的缔结成为一九七一年发动印巴战争的主要动机。在这次战争中,苏联舰队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活动,从印度看来,可能是一种对它的军事支持和政治影响。印巴战争后,苏联舰队从一九七二年四月开始,在吉大港进行扫雷工作,其目的在于能够永久地利用孟加拉湾沿岸的军事设施,扫雷艇作为情报收集舰在印度洋引人注目地展开活动。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苏联乘英国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退的机会,显著地增加了它在印度洋的活动,其目标有下列三点:

第一,对沿岸各国施加政治压力。一九六六年索马里军事政变后,苏联舰队访问摩加迪沙,对新政权积极的中立政策进行干涉。一九七一年,由于苏联舰队在印巴战争中的作用,使苏联能按照它的意志来处理孟加拉问题。一九七二年四月在斯里兰卡的内乱中,由于苏联舰队的集结和施加压力,终于使反政府暴动陷于失败。

这样,苏联舰队在印度洋的存在,就成功地使沿岸各国处于苏联的影响之下。

表一 苏联和美国海军在印度洋上的活动情况 (船日)

	1968年	1969年	1970年	1971年	1972年	1973年
苏联	1,760	3,668	3,779	3,804	8,007	8,543
美国	1,688	1,315	1,246	1,337	1,435	2,154

资料来源:美国国会报告,1974年5月。

表二 苏联舰船在印度洋上的活动情况

年 度	水 上 军 舰	潜 水 艇	辅 助 舰	合 计
1968	6	2	6	14
1969	7	3	10	20
1970	10	7	12	29
1971	10	1	7	18
1972	13	7	?	—
1973	10	4	?	—
1974	6	5	4—16	15—27

资料来源：1968至1971年的数字根据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外交事务联合委员会《关于印度洋地区的报告》(1972)；1972至1974年的数字根据1974年5月10日联合国印度洋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表三 苏联舰队访问的地区分布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1—11月)
红 海 (包括亚丁港)	1	—	3	18	9	12
波 斯 湾	—	—	9	14	6	1
印度次大陆	—	—	14	5	7	1
东 非 沿 岸	—	—	13	15	16	10
新 加 坡	—	—	0	2	4	3
合 计	1	0	39	54	42	27

资料来源：同上引《关于印度洋地区的报告》。

第二，印度洋的苏联舰队负有保卫苏联在该地区权利的使命。苏联在中东产油国中保持着重要的权利，同沿岸各国政治和经济的联系也在扩大。苏联为了维持同这些国家的贸易关系，就必须保护印度洋沿岸的海上通路。

第三，苏联舰队在印度洋的游弋，与其说是对付美国海军，倒不如说是对付中国的。苏联的这个立场是同亚洲集体安全的设想相一致的，由于中国在第三世界中的影响日益显著，因此，苏联要确立它在印度洋的统治权。

美国在印度洋的活动

自一九五〇年以来,美国派遣中东舰队常驻波斯湾,并以巴林为母港,这个舰队除旗舰拉萨尔号以外,还有驱逐舰两艘。一九七一年印巴战争中,企业号(核动力攻击航空母舰)、特里波利号(两栖攻击舰)、导弹舰三艘、驱逐舰四艘、核动力潜水艇等一直在印度洋游弋。

美国的第七舰队是用来应付印度洋上的事变的。一九六三年,美国在西澳大利亚设立了海军通讯基地。一九七〇年在查戈斯群岛的迪戈加西亚岛上设立海军通讯基地,用侦察卫星侦察印度洋海域上苏联舰队的动向。

美国海军在印度洋上进行显著的活动,是从一九七一年印巴战争开始的。在这次战争中,美国的第七舰队的一部分被派遣到孟加拉湾一带活动,试图牵制印度军队进入巴基斯坦。美国海军的这一活动是对抗苏联舰队的措施。但是,美苏在印度洋上的军事力量,从一九六九年开始,苏联便居于优势,苏联舰艇每天平均出动的只数,比过去增加了五倍,比美国增加了四倍。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美国国防部发表了下列决定:美国政府将印度洋和波斯湾置于太平洋司令部的统辖之下,并把以恩特普赖斯海峡为中心的第七舰队机动军舰八艘定期地派遣至这一海域,作为对抗英国海军撤退后迅速增大的苏联海军的措施。后来,美国海军在印度洋上更加强了對抗苏联海军的姿态,美国在印度洋上的巡逻是一九七四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后的事。在这次战争中,美国命令全世界的美军处于紧急状态,把东京湾的以攻击航空母舰汉科克号、奥里斯坎尼号为中心的机动舰队急速派往印度洋,对阿拉伯各国施加压力,并且牵制苏联对中

东的介入。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一九七四年二月的英美协定,迪戈加西亚岛通讯基地的扩充,即实行补给基地化,使第七舰队能够常驻于印度洋。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二日,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詹姆斯·诺伊兹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就美国在印度洋的安全保障的目的,举出下列三点:

- 一、对苏联在印度洋影响的增大采取有效的措施;
- 二、确保对美国 and 自由世界其他各国的石油供给;
- 三、保证美国海空军在印度洋上的自由活动。

第四次中东战争引起石油危机以后,美国深切地感到,为了给予中东产油国以更大的影响,即施以外交的压力,也必须使美国舰队常驻于印度洋。不用说,这是根据炮舰外交而采取的行动。美国海军在印度洋上的活动,目前处于超过苏联的优势。但是,在苏伊士运河重新开放后,美国的这种优势地位正在崩溃,对苏联的限制可以说已经消除。苏伊士运河水深三十八呎,苏联海军可以利用这条运河进入印度洋,而美国企业号级航空母舰由于舰身太长,不能利用这条运河,这样,美国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对美国来说,这是必须扩充迪戈加西亚基地的理由之一,不用说,这个措施的目的在于确保印度洋上的石油通路。

印度洋的军事现状与安全保障

关于印度洋的军事现状,根据美国国会的证言等,概要如下:

苏联 一九七〇年四月到五月, E-II 级核动力潜水艇展开活动,但装载有核装备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潜水艇则没有展

开活动。这种配备洲际核导弹的潜水艇一般是在冬季（二月至四月）开展活动，并以亚丁、索马里海域为中心。

表四 各国在印度洋上的军事活动

(船日)

	1967年	1968年	1969年	1970年	1971年	1972年	1973年
法 国	—	3	4	5	6	8	7
苏 联	0	529	1,138	1,670	1,480	2,387	2,987
英 国	—	43	33	19	18	12	10
美 国	(1960到1969 各年) 800			872	858	990	1,410

资料来源：联合国印度洋特别委员会的修正报告，1974年3月1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对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中曾被引用。

军事设施如下：

索科特拉岛——有停泊地。

查戈斯群岛——有供永久性停留的停泊地。

伯贝拉(索马里)——有通讯设施，在苏联的管理下，海军设施正在扩充。

摩加迪沙(索马里)——军用飞机场正在建造中。

乌姆卡斯尔(伊拉克)——可供战斗舰艇和支援舰艇利用的设施正在苏联技术专家帮助下扩充。

亚丁(南也门)——苏联使用英国旧基地和航空设施。但是，南也门拒绝苏联提供这种军事设施。

吉大港(孟加拉)——由苏联船只进行清理海港工作。

科克斯巴扎尔(孟加拉)——同上。

维沙卡帕特南(印度)——在苏联的援助下，正在建设潜水艇基地。

卡尔喀多斯·卡拉乔斯(毛里求斯)——停泊用的浮筒正在整顿中。在路易港，正在给予苏联以补给上的便利。

此外，在科伦坡(斯里兰卡)、卡拉奇(巴基斯坦)、巴士拉(伊

拉克)、木卡拉(南也门)和荷台达(也门)的设施,苏联也能够加以利用。

美国 美国第七舰队的一部分,正以苏比克湾(菲律宾)作为基地而展开活动,关于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活动还没有正式资料。除巴林以外,美国海军在印度洋的任何海港都没有可以自由出入的条件;一九七四年六月,导弹巡洋舰芝加哥号、驱逐舰两艘、加油舰一艘,曾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

军事设施如下:

西北角(澳大利亚)——包括火奴鲁鲁、关岛、菲律宾、迪戈加西亚、阿斯马拉的美国世界通讯系统的一部分,在一九六七年已开始工作。一九七四年一月九日,美国和澳大利亚签订共同管理通讯站的协定。

阿斯马拉(埃塞俄比亚)——美国海军潜水艇及其他舰艇可以使用阿斯马拉港。

迪戈加西亚岛——该岛的行政权属于毛里求斯,一九六六年毛里求斯独立,英国以七百五十万美元的代价购买此岛,现列入英国的印度洋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为抗击日本舰队侵入印度洋,曾在迪戈加西亚岛上建有小型飞机场,现由美国加以扩充,一九七四年提出新的扩充计划。

博恩峡口(澳大利亚)——这是美国同澳大利亚共同使用的早期警戒站,从通过印度洋的侦察卫星接受通讯。

卢温角(澳大利亚)——有卫星控制设施。从通过中国上空的侦察卫星,接受发送的照片。

巴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美英签订了由美国中东舰队使用巴林的英国军事基地的协定。巴林成为美国中东舰队通讯核心基地。一九七三年十月,巴林提出美国军事基地的使用期限在一年后终止的通知,但目前美国海军还在使用这个

基地。

巴科阿斯(毛里求斯)——美国空军继续使用英国海军的设施。

阿赫岛(塞舌耳群岛)——美国有卫星追踪站。

此外,在喀丁岛(澳大利亚)上,进一步在澳大利亚南海岸建立海军设施的交涉正在进行中。

英国 作为澳新美条约军队的一部分,在包括香港在内的苏伊士运河以东有护卫舰和驱逐舰六艘,这些舰只在波斯湾巡航。其次,还配备有空中军事通讯系统,把九个地上站(英国本部、新加坡、冈岛、巴林、塞浦路斯、英国海军舰艇两艘、小型空中移动站两个)和两艘宇宙飞船联系起来。

迪戈加西亚岛——通信基地。

萨腊腊岛和马西腊岛(阿曼)——根据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英国和阿曼的协定,英国在这里建立空军飞机场。

法国 根据一九七三年六月四日同马达加斯加订立的协定,法军在一九七三年九月一日以前从马达加斯加撤退后,在印度洋上派出航空母舰克里孟梭号并指挥暗号为萨法依尔的海军舰队,这个舰队有护卫舰三艘、巡逻船三艘,并配备直升飞机和强力的通讯装置,基地设在迪耶果—苏瓦雷斯。舰队的活动是以联结法国和中东的石油通路、确保海上交通为目的。其基地如下:

吉布提——位于红海的入口处,有军事基地及其他军事设施。

迪耶果—苏瓦雷斯——一九七三年九月一日,法军从马达加斯加撤退后,根据协定,将迪耶果—苏瓦雷斯的设施移交给马达加斯加接管,同时,为了训练使用设施人员,决定法国军队仍留该地两年。法国拥有向该地登陆、停泊和加油的权利。

留尼汪岛——法军从马达加斯加撤退后，留尼汪岛成为法国在印度洋的军事本部。

在印度洋这样的紧张情势中，沿岸各国和有关各国都感到很大的不安和困惑，正如最先主张印度洋中立化的、以斯里兰卡为首的国家所提出的印度洋和平区宣言中指出的，要求美苏双方在印度洋停止霸权竞争。此外，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尼、马来西亚、孟加拉和毛里求斯也强烈地表明对印度洋的这种关心。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印度进行了核试验，随着核扩散的危险和印度加入“核俱乐部”以及对美苏在印度洋上角逐的微妙影响，从而引起人们对印度洋的更加注意。印度立场的强化，大概可以看做是对印度洋安全保障的新发展。另一方面，巴基斯坦的立场是通过使印度列入非核区而牵制印度，因此，除了伊朗提出的中东非核区的设想以外，巴基斯坦也提出了南亚非核区的设想。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四月号日本《国际问题》月刊
振扬、林海译）

东地中海——世界强国的支点

〔英〕内维尔·布朗

六十年代初期，在东地中海有一个不寻常的宁静时期。塞浦路斯已经成为一个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中的土耳其少数民族受到了国际保证。一九五八年埃及和叙利亚的合并到一九六一年就垮台了。巴勒斯坦游击队运动当时还微不足道。虽然在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赫鲁晓夫曾经间接地对土耳其发出威胁，但他并未采取行动。自从一九五八年阿尔巴尼亚人把苏联人从他们的发罗拉潜艇基地赶走以后，地中海的任何海域也还没有苏联舰只进驻。

但是，不多久情况又恶化了。一九六三年圣诞节前夕，塞浦路斯希土两族发生武装冲突，死了好几百人；一九六四年，一支苏联舰队重返地中海；同年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塞浦路斯希腊民族斗争组织”的恐怖主义领导人格里瓦斯将军暂时退出了塞浦路斯岛，这大大缓和了自一九六七年暴乱以来存在于该岛上的紧张局势。但是，这件事和以前发生的雅典军人政变一样，都没有象一九六七年六月阿以战争那样影响到东地中海的力量平衡。一九六七年五月的第二周，苏联人毫无根据地在开罗和大马士革扬言，以色列正准备对叙利亚大举进攻，他们说服了纳赛尔总统在西奈半岛集结大批兵力。这就使战争情绪迅速升级，一场血腥冲突终于不可避免。

说也奇怪，苏联竟能利用六日战争来扩大它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它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部分是由于它较大规模地部署了它的海军力量。停火后四星期，苏联军舰便对亚历山大港和塞得港进行了一次友好访问，从此就加快了这一海区苏联海军势力的增长；一九六六年夏天，苏联在这里的海军舰只共有十二艘（包括战舰、潜艇和辅助舰），但是四、五年后，苏联舰只达到七十艘左右。在地中海轮流服役的新建的苏联舰只中有两艘一万九千吨的航空母舰（“莫斯科”号和“列宁格勒”号），每艘配备二十架反潜艇直升飞机。目前，苏联正在建造四万吨的航空母舰，估计这种舰只将首先用于地中海。

但是苏联的这支海军力量也碰到许多困难。首先是如何开进的问题，特别是如何从黑海的本国港口开进地中海的问题。虽然一九三六年蒙特勒公约不仅有利于土耳其，而且有利于其他沿海国家，但是它对于其他沿海国家还是限制很严，在一般正常情况下，他们的潜艇是不许通过海峡的。

在和平时期，直布罗陀海峡当然是允许船只自由通过的，但是，即使是潜行海底的核潜艇恐怕也很难避免那里的英国皇家海军的监视。

从苏联的观点来看，最严重的问题是在东地中海沿岸缺乏稳固的海军或陆军基地。南斯拉夫一直拒绝向苏联提供海军停泊地。一九六九年，利比亚的半封建国王被一个信奉战斗的伊斯兰教的急进民族主义者所取代，这对苏联来说也不算是什么收获。一九七二年八月埃及发出的最后通牒使在埃及的两万名苏联军事人员骤减为几百人，它影响深远，使苏联海军丧失了宝贵的后勤基地和空中支援。当时约有二千五百名苏联军事教官和技术人员继续留在叙利亚，但这对于苏联海军的支持是有限的。而且这种联系的前途如何现在也还不能肯定。

美国在地中海的存在主要体现在第六舰队。这支舰队经常是由两个特混舰队和一支有一千八百名陆战队的两栖作战部队所组成。每个特混舰队有大约二十四艘舰船，并以一只六万吨级的攻击型航空母舰为中心。在一般情况下，这两个特混舰队分别驻扎在地中海的西部和东部。在一九七〇年九月约旦内战期间，不少于三艘攻击型航空母舰及其他辅助舰船集结在地中海东部。但是这样庞大的舰队要在比较窄狭的海域里摆开作战的阵势，也许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在地中海服役的第六舰队，大多数舰只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六个月轮换一次；而且这个舰队的后勤补给，从来都是直接来自美国东海岸或者经由西班牙的罗塔港中转。最近在意大利修建了两个机场，又在克里特岛修建了第三个。此外，现在有一小批舰只在地中海区域内得到了“基地”，最近有一艘攻击型航空母舰在皮拉尤斯港作了新的停泊安排，就是一个例子。实行基地停泊，可以大大延长船只在那里的停泊期限。

为了估计双方兵力的均势，我们可在第六舰队一边加上西方联盟其他几个成员国部署在东地中海的海空力量。下列事实是值得注意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控制着很大一部分北部海岸，并且在马耳他、克里特和塞浦路斯三个大岛上建立了基地。因此在这个区域，西方联盟是继续保持明显的海上优势的。尽管如此，苏联可能正在获得进行破坏活动的巨大能力。控制（潜艇）噪音的现代水平，对海水的温度和含盐成分的分析以及对海床的深度和形态的研究，这些都有利于攻击型核潜艇的活动，而这种核潜艇苏联已拥有三十五艘，并在世界各地活动。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双方舰船所进行的全面的和带有挑衅性的追踪行动，近年来在东地中海也屡见不鲜，这就使任何一方有可能通过一次先发制人的攻击而取得巨大的战果。

在这个地区内，有一个国家看来特别容易受到来自陆上的攻击，那就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的情况在许多方面和中国有些相似，尽管两国在幅员上大相径庭；两国都无视克里姆林宫的指示，而自己制定了本国的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且两国都有一个内容丰富、敢于斗争、实行人民防御的军事传统。但是，贝尔格莱德和北京都有一个暴露的边界，这个尴尬的事实，在某种情况下，也会使莫斯科容易施加微妙的压力。

南斯拉夫的情况更加复杂，它的国家是建立在多种自治体分散管理的基础上。一九七二年，克罗地亚人在南斯拉夫境内和境外同时开展了反对铁托政权的恐怖活动，当时，有几百名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从克罗地亚及其他地方的政府职位上被清洗出去。再者，由于将近一千六百年前罗马帝国分裂时所造成的南北差异，现在南斯拉夫北方诸邦比南方发展较快，这种发展的不平衡也增加了南斯拉夫内部问题的复杂性。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即在苏联入侵捷克三个月以后，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召开了特别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许多发言人，其中包括美国国务卿腊斯克都把南斯拉夫包括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灰色区”内，即对该组织安全利益有影响的阴暗区。因此，可以设想，如果苏联入侵南斯拉夫，西方就会给予海空支援，使南斯拉夫人能在他们的南部和西部山区里保持一块自由的土地。面对着这种旷日持久、后果莫测的长期斗争的现实可能性，苏联也许有所顾虑，不敢对南斯拉夫贸然动手。

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东部边界，考虑到当地的地理条件等限制以及预计的攻击规模来说，当地的兵力还是相当强的。意大利的野战部队包括七个师和一些独立旅。其中一个师驻扎在罗马附近，受本国司令部的指挥，同样在本国司令部指挥下还有几个旅，分别驻扎在意大利的其他地方。除此以外，几乎所有

野战部队都部署在东北部，受当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司令部的指挥。在那里，塔格里亚门多河防线是防御阵地的骨干，这条河从威尼斯的阿尔卑斯山区流至入海口，全长只有四十英里。因此，就防区面积与兵力部署的比例来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署在意大利东北防区的兵力远较部署在西德的兵力为多。

希腊和保加利亚的边界绵亘在一般高达三四千英尺的山脉地带；横跨这个庞大的天然屏障的是麦塔克萨斯防线，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开始建筑的堡垒群。这条防线有个大弱点，它缺乏纵深防御。防线上有一个地方距离海边只有十英里。一九四一年，德国第十二兵团用十个师，以斯特鲁马河谷为主要的前进基地，两天内就突破了麦塔克萨斯防线，四天内攻占了萨洛尼卡。因此，早在五十年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曾制定过一个利用土耳其部队进行反包围行动的应急计划。

土耳其三个野战兵团中最大兵团的司令部设在伊斯坦布尔，该兵团所属的几个师都部署在海峡的两侧。另外两个兵团的司令部，分别设在科尼亚和埃尔祖鲁姆。后两个兵团的主要任务是机动灵活地防守二百五十英里的土苏边境。这条边界线穿越的很大一部分峡谷、高地构成良好的防御区域，而且几百年来，为了加强这个天然屏障，已经广泛地建造了堡垒群。

现在，希腊和土耳其的总兵力共为二十六个师和二十二个独立旅；两国在总动员令下达后几天之内能够征召的总兵力可达一百多万人。但是，不论希腊或土耳其，防务上虽有其优点，但在武器装备的某些方面也还有着明显的缺陷。前沿的防空设施显然是个薄弱环节。部队的机械机动性也还不够高。为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了对希土侧翼实行外线增援，已经有了经过演习的周密作战计划。

毫无疑问，意大利是西方联盟南翼的柱石。但是，由于政治

原因，经常地令人焦虑。近年来，它接连受到“大纷乱”的困扰——物价高涨、罢工、城市骚乱、学潮和恐怖行为，不一而足。因此，虽然过去十年间组成的历届政府大多是中间偏左的联合政府，但是政治上走极端的可能性也是排除不了的。意大利还有一个和南斯拉夫相似的弱点，它的北方和南方在发展水平上久已形成巨大的鸿沟。

“赎罪日”战争的结果表明，以色列作为对抗苏联影响的堡垒地位在军事上是巩固的。若干年来，以色列已经引人注目地证明，它对于任何一级的冲突，从大规模的常规战争，到有选择的报复行动以至于公开的反暴乱和秘密的反恐怖行动等等，都能够胜任愉快。它在同阿拉伯人对抗中所享有的全面优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不会消失的。

但是，如果把眼光放远一点，我们就会看到，时间对以色列是不利的。因为这种现状维持愈久，以色列就愈难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解脱出来。

我们可以认为，以色列是西方联盟的一个预备成员国，至少在东地中海地区是这样。不仅如此，以色列还是东地中海现代西方世界文化摇篮的象征。因此，从以色列目前所面临的困难处境中更可以得出结论说，东方问题由于它在政治上经济上牵涉的面很广，在最近一二十年内是很难找到答案的。

事态怎样发展，归根到底要看苏联把东方问题推进到何种程度。在苏美达成核均势以后，苏联也许会更大胆地在局部地区搞渗透活动。对莫斯科动向影响最大的方面，首先是发展中世界的的不稳定性所带来的引诱力，第二是苏联内部压力已经达到了严重程度，这种内部矛盾可能弄得它走投无路，不得不通过对外扩张来转移视线或摆脱困境。不管局势怎样发展，前途都未可乐观。

俄国人对东地中海和近东特别感兴趣这一事实可以追溯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对印度通道的焦虑，在一八七八年的危机中，女王曾派遣印度陆军部队进驻马耳他岛。哈弗·麦肯德爵士的典型地理政治学论文不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可能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是抓住东方问题的要害还应该归功于他。

（摘译自一九七三年秋季号美国《环球》杂志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译）

超级大国在欧洲水域的争夺

〔美〕《号角》月刊编辑部

欧洲的北方水域已经成了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美国和苏联之间激烈争夺的舞台。

这些水域包括北大西洋、挪威海、北海、波罗的海和巴伦支海，在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控制权的角斗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就是控制了这些水域，并以此作为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欧洲国家和切断同盟军供应补给线的基地。

今天，苏联对欧洲北方水域的控制占了上风。它的海军策略威胁着所有的欧洲国家，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和平和安全。同时，苏联还疯狂地争夺北海的石油和挪威海的水产控制权，公然企图从经济上剥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些行动实际上增添了苏修头目们是滥用特权的帝国主义者的证据。他们为了取得独霸世界的统治者地位，力图压倒美国。

从苏修对北方水域的重视可以看出这个地区的重要意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苏联潜艇部署在北方水域，占苏联舰艇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的军舰经常在北方港口出没。苏联海军比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海军更强大，波罗的海已成为“俄罗斯内湖”，这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已成了公认的事实。

苏联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采取了公开的敌视行动。例如，在瑞典海岸附近的岛屿上进行登陆演习；苏联船只经常非法地侵

入瑞典和挪威领海；还派遣间谍船打着“货轮”和“油船”的旗号在沿海活动。去年五月十五日，一艘苏联潜艇闯入瑞典领海，直到瑞典军舰向它开火后，才匆忙逃跑。接着在十二月十七日，一艘苏联“货轮”非法越入瑞典领海，瑞典政府为此提出了正式抗议。

目前，苏联正在科拉半岛的海军基地加强巨大的军事力量，试图组成一条潜艇“防卫线”，由科拉半岛向格陵兰岛、冰岛和法罗群岛延伸。事实上，这完全不是一条什么“防卫线”，而是一条战略核潜艇的进攻性战线，用来支援苏联对欧洲大陆地区发动的任何可能的军事侵略。

海军的行动是日益增长着的苏联在欧洲渗透的一部分。它同苏联对塞浦路斯的干涉和分裂北约组织对地中海的控制是分不开的，也同苏联对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的威胁和阴谋推翻南斯拉夫现政权的企图是分不开的。苏联海军的行动，同样是由帝国主义的计划所引起的。这一计划已经把东欧变成了一个武装阵营，使得华沙条约国掌握的进攻武器两倍于西欧国家，军事人员三倍于西欧国家。美国和苏联在控制欧洲的苦战中干得难解难分，北方水域的浪花拍打着同形成这场争斗的战略要点有关的十六个国家的海岸。

几年前，自从在挪威海发现了石油后，超级大国的争夺步步升级，更增加了北方水域的战略意义。今天，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都企图成为攫取挪威海新财富的捷足先登者。美国和苏联，事先没有征得挪威政府的同意，竟派遣“考察”公司去勘探石油，严重地侵犯了挪威领海的主权。苏联对它和挪威在巴伦支海上的分界问题是从来不感兴趣的，当它在这里嗅出油香味儿后，忽然对这问题变得热心起来了。现在，苏联声称巴伦支海的石油丰富地区是在它的“天然边

界”之内。然而，挪威外交关系协会主席托尔·奥夫特达勒回答这个声明说：“挪威决不放弃属于它领海之内的一切东西。”

超级大国对欧洲控制权的争夺，对北方水域来说，就是一种广泛的威胁。这对于欧洲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提出了一个直接问题——那就是，它们是否愿意置身于超级大国争夺的交叉火力中，而作为另一次世界大战的人质。

然而，欧洲国家的修正主义“共产党”却忙于为苏联的行动辩护，把它吹嘘成是“热爱和平和缓和”的行动。北欧国家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正在发起一场揭露欧洲人民公敌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运动。欧洲国家的国防必须加强，但不是立足于依靠一个超级大国去反对另一个超级大国这样靠不住的基础上。

超级大国海军相互的对峙，庞大的海军和空军基地的存在，石油的争夺以及不断地派遣间谍，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在超级大国之间没有什么“缓和”可谈。

勃列日涅夫和福特握手之时，正是相互争夺在一步步升级之日。欧洲的北方水域不过是许多战略地区中的一个，在那些地区里，这种争夺正预示着一场新的战争的危险。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二月号美国《号角》月刊 上海
长征农场青年工人 陆惟信译）

索马里和苏联在印度洋的活动

〔美〕丹尼斯·查普林

一九六八年以来，亚丁接待了约五十艘苏联船只，伊拉克接待了二十艘，肯尼亚的蒙巴萨接待了十二艘，苏丹港接待了十四艘，埃塞俄比亚接待了八艘，印度接待了三十多艘，索马里接待了六十多艘。苏联在埃及的所作所为有力地表明它的海上扩张政策是有其军事目标的。在地中海，苏联的目标是在北约组织的南翼建立一个极为明显的军事基地。但在印度洋，苏联的海上活动在它对北约组织的关系上是更复杂了，这是值得探讨的。

值得探讨的有意义的焦点是在索马里。一九六八年以来，索马里已经接待了六十多艘苏联的船只，这一事实，表明了苏联对该地区的兴趣，这就不能不引起北约组织的怀疑。一九七四年夏天，苏联计划把索马里变成它在印度洋上海军的军事基地的决定性行动，表明了苏联的企图和目的。

一九七四年七月的苏索“友好条约”，标志着苏联对新的东方海军前哨基地搞阴谋的开始。它想借此补偿一九七二年从埃及被驱逐出境所蒙受的损失。这一条约包含着苏联一贯所允诺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换取在此地设置船坞的权利。苏联的援助包括一个野心勃勃的电气化规划、工业贷款以及一般的医疗和教育的援助，其中最重要的是苏联与索马里昏庸的左翼军事独裁者西亚德·巴雷进行的交易。

事实上，索马里由于同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长期领土纠纷，一直渴望同愿意提供现代武器、专门技术、维修保养和备用

零件的任何大、中、小国家达成协议。一如既往，由于俄国人表示他们极其愿意提供武器，这样，就很可能造成非洲大陆的进一步不稳定。世界范围的武器交易不但助长了共产党人感兴趣的地区的不稳定性，而且也为他们在探寻全球性海军基地网方面提供了理想的交易筹码。

一九六九年，当西亚德·巴雷上台时，他立即向苏联作出了种种友好的建议。两国之间的军火交易和军事援助加强了索马里的防卫力量。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索马里的武装力量已从四千人增加到一万八千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式装备已为现代化的苏联装备、运输车、中型坦克和装甲车所代替。索马里本来是一个没有空军的国家，现在有了一支相当大的苏联米格格式飞机部队（包括五十七名教练员）。苏联甚至开始输送萨姆3型导弹作为这个计划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索马里海岸进行蓄意的夺取，表明了苏联行动的军事目的超过了贸易目的。由于神秘的苏联军事顾问在索马里安营扎寨（至一九七四年底已达四千人之多），第二个埃及式的舞台在索马里建立起来了。象往常一样，他们借口是什么军事设置、设备维修和技术训练组织的成员，其实，这些顾问一向就是那些苏联海军陆战队、空军部队、导弹部队、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和海军部队的先遣队。随着时间的过去，“顾问”的含意已经扩大，它已远远地不是原来的意义了。在索马里有如此一大批顾问的严重事实，对苏联的军事意图足以敲起警钟了。在那里，他们本来就不愿意花费那么大的气力和费用来保证索马里人知道如何操纵这些新设备。

考虑到一九七二年的埃及事件，必然会引起对于在海上设备方面花去的大笔资金将会在最后被没收的担心。苏联立足于索马里的决定是为了反对北约组织的吗？并不完全如此。

苏联海军同美国的逐步扩大的海上巡逻部队还在针锋相对，并且苏联想阻止美国的弹道导弹潜艇进入印度洋活动。但是，如果 A 3 S 型北极星式导弹能够从印度洋轻易地打到苏联的话，那么，它也能够从全世界许多角落特别是从地中海，北海和太平洋打到苏联。所以，在印度洋的美国潜艇的活动对苏联并不特别形成威胁，以致苏联必须保证索马里沿海地区海上设备的长期支出。

苏联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预感到美国把它的海上基地推进到苏联附近的政策（如在希腊那样）是最紧迫的危险，因此，苏联需要在地中海扩张它的反击基地。埃及事件给苏联的海上计划以沉重的打击。苏联在印度洋上的活动可能是对地中海政策失败的安慰——也就是说，这一地区很有可能成为地中海基地的代替物，这总比什么也没有要好一些。

另一种观点，或许带有较多的常识性，那就是苏联的扩张旨在谋求全球性霸权地位。扩张海外基地是用以维护大国霸权，镇压反抗者的一个间接手法。戈尔什科夫使政治局相信，一个大国必须拥有一支有相当数量海外基地的强大的海军（正如他在一九七二年二月至一九七三年二月之间在《海军手册》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反复强调的），如同十九世纪帝国主义海上列强对扩大海外基地的兴趣那样，苏联也是在这里大搞基地。

如果我们认为苏联不可能天真到愿意花数百万资金于国外海军基地而只是单纯地为了取得显赫声望的目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它的军事目的。如果在印度洋上，全球核战略对北约组织仅具有有限的意义，我们就必须承认苏联在这一地区特别是在索马里的海上扩张和费用支出，是出于海上列强长期性的常规的地区战略的需要。

那么苏联政策中的地区性战略是什么呢？对北约组织航行

有直接威胁的是苏伊士运河。在过去的海洋史上，俄国人的海上霸权总是受到敌对国家控制的狭窄海峡的限制。因此，他们现在希望采用潜在的威胁手段占领运河的一端。埃及人把他们从运河的北端赶了出去，这样一来，他们就在运河的南端进行试探。

从战略上看，苏联对苏伊士运河南端的控制不是为了要阻止商船的通行，因为在长时期封锁苏伊士运河的情况下，商船航行也能够照样通行。然而，在五到六年的时间内，这种控制可能产生重大的意义。考虑到波斯湾的石油储备，印度洋在反对北约组织的政策中就更为重要了。由于波斯湾的石油储藏量占世界已知石油储藏量的百分之六十，在今后十年内，这些石油储备是关系到大国军事力量生死攸关的事情。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三年，西方已首先感觉到石油荒的痛苦了。在目前，苏联的政策似乎不是致力于切断对北约组织的石油供应。如果采取这样的行动，那将导致战争，而迄今苏联还没有作好这样的准备。

目前，苏联还有足够的石油，它不需要为石油而战争。当前，阿拉伯的顽抗和石油价格的高涨，使北约组织的经济受到极大的影响，苏联对此感到很满意。然而，一旦苏联开始感到石油供应急迫，它准备为此而插手时，在波斯湾控制着足够的供应常规作战的基地就是它的长期需要了。据估计，到一九八〇年时，苏联将每年缺少二百六十万吨石油，这可能标志着波斯湾激烈竞争的开始。这时，在印度洋上的索马里基地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由于北约组织在印度洋上的据点没有在地中海上的多，那么它在红海上的基地对保卫波斯湾油田的常规战来说，就显得极端的重要。自然，苏联也想在一九八〇年出现麻烦时，处于同北约国家相似的地位。索马里的苏联基地，旨在对付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美国基地、在索马里北部的法国基地以及对付在波

斯湾出现的英国武装力量。由于苏联在也门的势力和在索马里的基地，它将窃取红海上的美国和英国基地的利益。在紧急情况下，这些基地里的苏联海军很容易阻击美英海军进入印度洋。

苏联在印度洋活动的另一个军事目的，是直接针对共产党中国的，这一目的比对北约组织更为重要，因为它同前者的冲突，看来似乎比同后者的冲突更迫在眉睫。缓和目前的紧张局势，签订合作协定，举行裁军谈判等等，所有这些活动似乎都表明苏联想把它和北约组织之间的争执拖延下去，直到共产主义世界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再说。

对于从战略上控制中国，印度洋提供了两个重要的条件。首先，在印度洋上的苏联核武器对进攻中国辽阔的国土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同时，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印度提供了反对中国的压力。对苏联来说，最理想的是苏印联合起来进攻中国，苏联在印度洋的扩展，最终可能使这种联盟成功。在过去，苏联支持印度反对中国，这对印度人来说说是记忆犹新的，正象在印度—巴基斯坦战争中，苏联所持的态度一样。

在索马里，苏联正在扩大迪克黑德和柏培拉两个海军港口，同时在摩加迪沙建造机场，所有这一切表明苏联是希望呆在那里的。

苏联在印度洋特别是在索马里的活动意图是混乱的。它企图阻止美国海军活动，通过海上基地建立自己的威望，对埃及施加压力，掠取波斯湾的战略优势，遏制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并通过同印度的友谊关系从西南部包围中国等等，但是在二十世纪的末期，要搞新殖民主义是此路不通了，正象一九七二年埃及所发生的情况一样，甚至在适当的时候巴雷也要向北京卖俏。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七月美国《军事评论》杂志 上海长江农场农场大学翻译组译）

亚速尔基地在 控制大西洋中的战略地位

〔美〕《前卫》周刊

在美苏争夺海洋霸权的日益激烈的斗争中，葡属亚速尔群岛成了一个主要的前哨阵地。

随着政治斗争在葡萄牙风起云涌、势不可挡，五角大楼的计划制订者们最担心的倒不是亚速尔的空军基地（一九七三年时美国空运武器到以色列去时，曾使用该基地），而是那里的海军基地。这些基地是耗费了几十亿美元建成的，是监听大西洋海域苏联弹道导弹潜艇活动的潜艇追踪站网中极其重要的一环。

亚速尔群岛位于大西洋中部，由七个岛组成，距里斯本八百哩。它的地位具有战略意义，从这里可以监听到半径在一千哩范围内的大西洋或地中海上的苏联潜艇的活动情况。

美国海军部部长 J·威廉·米登多夫三月中曾对国会这样说过，“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可与亚速尔群岛和冰岛（美国在大西洋的另一主要基地）的战略重要性相比拟。”现在由于里斯本急剧地左转，美国正在为租用亚速尔群岛中特尔赛拉岛和圣玛丽亚岛作为基地一事重新进行谈判。如果这些岛上基地的租用权被废止了，五角大楼在潜艇追踪能力方面将会出现一个大漏洞。

除监听苏联潜艇以外，亚速尔追踪站还控制了西欧通向外界的主要海道，包括把波斯湾经由好望角同欧洲的鹿特丹等港

口联系起来的特大油轮(这些油轮吨位过大,不能使用苏伊士运河)使用的主要航道,以及把地中海的美国第六舰队经由直布罗陀海峡同它本国东海岸主要补给基地联系起来的四千哩长的海上通路。

如果丧失了亚速尔群岛,五角大楼计划制订者们担心,一旦欧洲发生战争,苏联潜艇就能切断上述两个环节,从而中断西欧石油、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供应,并孤立第六舰队。

在一九七三年十月的中东战争中,亚速尔群岛在美国支援以色列的活动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美国的北约盟友不同意美国使用他们的设施时,亚速尔变成了那些向以色列运输战争物资的巨型 C5A 运输机的主要加油站。然而,这种运输机现在能以储足飞机用油和少装些货物的办法直飞以色列。

总之,作为北约组织追踪网和其他军事计划的重要环节,亚速尔群岛在美国对里斯本政府以及对该岛上的所谓分离主义者运动的政策方面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美国要遏止葡萄牙左倾和可能会支持右翼的分离主义。

(译自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七日美国《前卫》周刊 一兵译)

小资料

印度洋沿岸各国的海军

国名	海军兵力	航空母舰	巡洋舰	驱逐舰	护卫舰	潜水艇	登陆艇	扫雷艇	各种用途艇	合计
印度	30,000人	1	2	3	23	5	4	8	18	64
巴基斯坦	16,500人		1	3	4	9		7	22	46
印度尼西亚	40,000人		1	8	19	27	18	17	178	268
澳大利亚	16,115人	1		6	6	4	8	6	38	69
伊朗	13,000人			3	8		2	6	36	55
缅甸	7,000人				2				94	96
孟加拉	500人								5	5
马来西亚	4,800人				2			6	59	67
新加坡	1,100人						10		15	25
斯里兰卡	2,400人				1				34	35
伊拉克	2,000人								45	45
沙特阿拉伯	1,500人								47	47
苏丹	600人						2		9	11
北也门	300人								5	5
南也门	250人						2	3	2	7
阿曼	200人								7	7
科威特	200人						2		27	29
阿布扎比	150人								9	9
埃塞俄比亚	1,380人						4	1	10	15
索马里	300人								10	10
肯尼亚	350人								3	3
坦桑尼亚	600人								6	6
马达加斯加	275人								2	2
南非	4,204人			2	7	3		10	16	38
总计	143,724人	2	4	25	72	48	52	64	697	964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六月日本《世界之舰船》上海
外冈农场周志方译)

骂街世家

岩 文

骂街，历来是被人们嗤之以鼻的。但是，在所谓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骂街却受到赞扬，谁骂得最恶毒，谁的水平也最高。如若不信，请看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九日苏联《文学报》上的《骂街杂谈》一文。

《骂街杂谈》的文字不长，但内容“丰富多采”：什么“骂街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之一”啦！“骂街的语言具有高度的艺术美学水平”啦！骂街可以给人以“美学上的享受”，可以“消除心理上的过度紧张”而有益于健康啦！等等等等。从骂街的历史到骂街的现状，从骂街的美学到骂街的心理学，作者都作了“精辟”的考证和淋漓尽致的阐述。看来，骂街早应该是一门科学，而作者也够得上是一位研究“骂街学”的专家了。

骂街“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之一”，这真是开天辟地以来罕见的奇谈怪论。如果骂街是区别人和动物的标志，那末，酗酒、吸毒和犯罪更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了。修正主义的文人居然用这样拙劣的手法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这些腐朽的社会现象作辩护，真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苏修的堂堂《文学报》也大肆宣扬这样的屁话，可见苏修社会的腐朽、没落已经到了何等的地步。

说实在的，这些奇谈怪论，只能令人作呕，其中的歪理也根

本不值一驳。但是，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在今天，苏修叛徒集团要把“骂街”这一腐朽丑恶的东西当作宝贝，而加以提倡呢？

不是别的原因，而是因为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实在无法再混下去了。特别是这个叛徒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径不断地被揭露；他们在第三世界搞假支持、真出卖的手法日益被亚非拉广大的革命人民所识破的时候，处境十分狼狈。在这种情况下，勃列日涅夫只有求助于谩骂以发泄他对马列主义政党和革命人民的刻骨仇恨，借助于骂街给喽罗们打气并为自己壮胆。这不过是苏修叛徒集团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的大暴露。伟大革命导师列宁说过：“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毫无思想原则、束手无策、软弱无力”（《列宁全集》第20卷，第383页）。

其实，“骂街”也不是苏修叛徒集团的新发明，当年的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人，不是也以骂街闻名的吗？《骂街杂谈》的作者说：骂街“作为祖传的现象一直保留到今天”。对，今天的勃列日涅夫确实是继承了祖上的遗风，保持了骂街的传统。鲁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南腔北调集》）同样，骂街世家的子弟，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苏修叛徒集团咒骂无产阶级政党，咒骂世界革命人民，到头来，他们也必将在苏联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痛斥声中，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而世代相传的骂街世家也将彻底地被打倒。

骂街杂谈

〔苏〕尤里·伊瓦金

骂街的历史及其社会学 骂街的本领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之一。任何一种动物,从单细胞的变形虫到类人猿,都不会骂街。骂街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时代的男人当中。当时,男人在和妇女的霸权作斗争时采用了骂街这一武器,用以确立自己在道义上对妇女的优势(即所谓“母系氏族社会式的骂街”)。这种骂街的某些形式作为祖传的现象一直保留到今天。

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中,骂街不断演进。例如,俄国革命前的社会分化也在当时骂街的多样化上有所反映。大辅祭和一等商人的骂法不同,靴匠和司务长的骂法也各异。当时,男人当中公认的骂街冠军是马车夫(其中又以敖德萨的马车夫首屈一指),妇女中则首推比萨拉布卡的女摊贩。

当代,马车夫已退出历史舞台,而女摊贩也因受过中等教育而不再觊觎骂街艺术的鳌头。目前争夺骂街冠军称号的已不是某些行业和社会阶层,而仅仅是一些个别人——骂街爱好者。

骂街的美学 骂街的语言具有高度的艺术美学水平是人所共知的。骂街的话语,其形象之丰富及语调之生动不能不使人瞠目。世世代代不断选择、积累和提炼出了一批艺术上最完美、感情上最丰富、骂起来最带劲的骂街词语和词组。

骂街词语从结构上来说,可分为单层(单元)的和多层的两种。从语义特征上来说,骂法可分为三大类:驱逐(如:见鬼去

吧!);愿望(如:你准完蛋!);下定义(如:傻瓜!蠢驴!)等等。

现阶段的骂街 必须坚决驳斥这样一种颇为流行的意见,即认为任何骂街都是有害的,某些未来学家认为随着文化的发展,骂街将完全绝迹,这种假设也是毫无根据的。

正如心理学家和神经病理学家所证明的那样,从医学观点来看,骂街是人类生活中一种重要的抗应力因素。当我们骂街时,便可以使自己坏的情绪在心理上得到缓和,而强行抑制坏的情绪对健康则是有害的。根据学者们的意见,通过语言的形式达到心理上的缓和比之通过运动的形式(例如打碎器皿,对论敌施以物理作用之类)具有一定的优越性。这甚至对于积极的情绪也是一样。因为积极情绪如果过度,也会招致不良的后果。

骂街之有益不仅在于它可以消除心理上的过度紧张,收到一种特殊的精神“发泄”之效。骂街还表现出一个人对生活的积极态度,表现出他拒绝他认为有害和陈腐的东西。骂街是批评和讽刺的亲姐妹。

最后,正如我们在前面一节中所看到的那样,骂街同时还能使人得到不少美学上的享受。

当然,这里谈的是文明的骂街。至于粗野的、放肆的、侮辱性的骂街,则(我们同意未来学家的意见!)它正在逐步绝迹。必须坚决反对一切旧时代的残迹以及骂街时使用的色情淫秽的词语,换句话说,骂街的词语不应是骂街式的。我们认为,未来需要的正是这种积极的骂街。

(译自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九日苏联《文学报》)

北京外国语学院外语系研究室译)

对 马 之 战

〔美〕诺埃尔·布希

编者按：一九〇五年的对马海战，是日俄之间由于掠夺我国东北等地、分赃不匀而引起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列宁在评论参战的俄国舰队情况时说：“一支巨大的舰队（它象整个俄罗斯帝国那样庞大，那样笨重、荒唐、无力、怪诞）起程了，把不义之钱花在煤炭和给养上，使欧洲大为嘲笑”。这场战争的结局是俄国海军的覆灭，它充分暴露了沙皇的昏庸，也“意味着整个沙皇政治制度的崩溃”。（《列宁全集》第8卷）

世界上最强大的战舰之一、日本帝国海军的一万五千吨无敌战舰三笠号旗舰停泊在佐世保港，统率着周围的舰艇。整个晚上，络绎不绝的汽艇越来越紧急地加速开到旗舰的舷门，一九〇四年二月六日凌晨一点，舰队的高级军官都聚集在最高司令官东乡平八郎中将简朴的房舱里。不出所料，东乡有重要的消息宣布：虽然日本曾不遗余力地设法避免战争，但是现在却不得不准备打到底。

“俄国舰队已在旅顺口集结，”他宣布，“准备立刻出航”。

东乡安闲自信地说着，他那咄咄逼人的神态，丝毫也没有因为他的五呎三吋的矮小身材而有所减弱。在他面前的台子上，放了一把显然出鞘的武士短剑，剑锋在房舱的灯光下闪闪发光。

这把短剑的出现，增加了他所宣读的天皇诏书的重要意义：“俄国政府并不打算维持和平，”诏书说，“因此，朕已作出决定，立即采取行动，保卫我国的独立。”

接下去是简洁的几句话，军官们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紧张气氛中聆听着。当他们鱼贯而出，返回各自的舰艇时，东乡将军的告别词在他们的身后飘入夜空，就仿佛是一道挑战书：“歼灭敌人，让天皇陛下圣心安乐。”

第二天下午，日本和俄国断绝了外交关系，没有任何人能比东乡更了解必须采取断然行动的了。他所指挥的舰队，根本不是横跨在日本海上生命线上的、停泊在旅顺口的俄国舰队的对手。俄国的主要战舰包括七艘战列舰，九艘巡洋舰，而东乡只有六艘战列舰和六艘巡洋舰。俄国还能够从波罗的海的欧洲港口集中另外一支强大的舰队。此外，俄国在满洲海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另外还有战舰。日本如果终究想取得胜利的话，就必须采取极其迅速而果断的行动，使敌人的优势兵力根本不能发挥作用。

作为海军军官候补生，作为学生，东乡曾在英国度过六年的生活，他非常钦佩英国伟大的海军英雄纳尔逊勋爵^①的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东乡了解，对付这种局势只有一个办法。“如果你的剑太短，向前跨上一步”，这是他最喜爱的格言之一。二月十八日，他采取了这样的一步，派遣十艘鱼雷艇，在黑夜的掩护下，攻击了旅顺口的俄国军舰。

东乡是幸运的。日俄外交关系虽然已经中断了两天，但是俄国人仍然愚蠢地骄傲自满，因此，奇袭成功。当俄国舰队的军官们正在出席招待舰队司令官的夫人和小姐的宴会时，俄国舰

^① 纳尔逊(1758—1805)，英国海军上将。

队实际上是从头烧到尾。正好在晚上十点钟之前，配备反鱼雷网特殊装置的十八枚鱼雷嘶嘶地飞向灯火辉煌的目标。三枚鱼雷直接命中，摧毁了俄国两艘战列舰和一艘重巡洋舰。

第二天，东乡出动巨型战舰，在长距离的范围内，重创了沙皇舰队的其余舰只。在几个小时之内，仅仅付出六个日本人生命的代价，东乡就在远东颠倒了日俄之间海军力量的平衡。

封 锁

对旅顺口第一次戏剧性的攻击以后，东乡定下心来，就象是守候在老鼠洞口的猫儿似的，监视着旅顺口的门户。东乡对于把俄国军舰围困在旅顺港内感到满意，他了解，正在拚命作战的日本陆军，要不了多久，就有可能用陆军的大炮摧毁敌人的军舰。但是当俄国老谋深算的海军上将、精明的斯捷潘·奥西波维奇·马卡洛夫奉命前来指挥被围的沙皇舰队时，这种战略就处于危险之中了。马卡洛夫立刻采取措施加强纪律，终止在岸上的娱乐社交生活，加强炮击训练，经常以搜索巡逻和进攻性的突击来骚扰敌人的封锁。

看来就象是东乡一时遇上了对手。接着，四月十二日，马卡洛夫的旗舰在返港时触发了日本的水雷，在旅顺口看得见海上爆炸，马卡洛夫葬身海底。有个专家认为，损失马卡洛夫，大约相当于损失五艘战列舰，对于俄国的士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东乡自己也碰到了严重的挫折，一九〇四年五月里倒霉的一天，他的两艘战列舰触雷沉没。损失战列舰总数的三分之一是一个惨重的打击，但是东乡淡然地承受下来。这类灾难仅仅是“战役中的小事”，他平静地让他的军官们放心。不过，为了使俄国人猜不透他的实力，他设法使损失掉的一艘战列舰保守秘

密，直到战争结束。

日本单薄的海军力量早已被战争弄得很紧张，在受到这次挫折以后，东乡加倍警惕，继续进行封锁。到八月，当沙皇舰队的残余舰只冒险出港，准备突围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时候，他立即开始追击，迫使敌舰缩回来。不过，一般说来，东乡谨慎地避免在重大的战役中让他的舰只遭受危险。他了解，在环绕地球的中途，俄国的波罗的海港口正在狂热地集中一支他必须对付的甚至更加强大的沙皇舰队，他必须节约全部可能节约的力量来应付它。

俄国策划复仇

在圣彼得堡，旅顺口战败的消息又怀疑又恐惧地被接受下来，有四个月的时间毫无行动。一直到六月中旬，才决定派遣海军增援，但是在新的沙皇舰队宣布准备启航之前，又过了四个月。

不过到十月九日，在宫廷半数大臣的陪同下，当沙皇尼古拉二世来到芬兰湾勒法尔^①海军基地来祝愿舰队成功时，又激起了一片骄傲和乐观的景象。这天早晨是寒冷的，飘扬在每艘战舰上的三角旗和舰旗在强劲的海风中啪啪作响；新建立的太平洋第二舰队满怀信心地去执行沙皇的圣谕：“向目空一切的、扰乱神圣俄国和平的日本人报仇。”沙皇和他的服饰华丽的全体随从人员都聚集在新建立的舰队的旗舰苏沃洛夫号的餐厅里。如同它的姐妹舰奥勒尔号、亚历山大三世号、沃罗季诺号一样，苏沃洛夫号是崭新的一万三千五百吨的无畏战舰，配备十二吋口径

^① 即现在的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塔林，是由俄国彼得堡出海必经之道。——译者

大炮四门，六吋口径大炮十二门，较小口径炮四十六门。舰身吃水线的装甲钢板厚十吋，甲板的装甲钢板厚四吋，航速性能超过十八节，四艘新的战列舰是组成太平洋第二舰队的支柱。

海军专家早已把这些战舰说成是不可战胜的。在三艘较陈旧的战列舰，六艘巡洋舰，九艘驱逐舰，以及武装的商业运输船和辅助船舰的支援下，拼凑成包括四十二艘船舰的大舰队。专家们说，当这支舰队加入旅顺口舰队的剩余舰艇时，足以打垮东乡所能投入战斗的任何海军力量。直挺挺地站在沙皇身边的是遴选来统帅这支威武雄壮的舰队的司令官。高高的个儿，铲形的胡子，超然绝俗的齐诺布·彼得罗维支·罗日杰斯特温斯基中将，是俄国经验丰富的海军将领之一，一个职业的海军军官，没有依靠贵族或者有势力人物的帮助而爬到高级军官的职位。他是一个执拗的、很难相处的人，有时发一通脾气，有时又显得沮丧，但他却是一位杰出的司令官，宽恕自己少，宽恕下属多。罗日杰斯特温斯基忠于职守，把每一点超越常人的体力和精力都注入舰队。自从圣彼得堡决定增援旅顺口的舰队的时候起，在十八个星期里，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干，他开除和提升官兵，监督舰队的修理工程，威吓造船人。从懵懂而腐化的海军衙门逼取物资和军火的时候，他一连好几个夜晚不睡觉。不晓得什么缘故，他组成了一支经得起风浪的舰队。

但是罗日杰斯特温斯基敏锐地感觉到，沙皇为数不多的有经验的海员，现在都被包围在旅顺口。为了应付摆在他面前的战斗任务，他不得不吸收上了年纪的后备役军人，或者从来没有见过海洋的应征农民。更糟的是，他的许多水兵显然都是献身革命的，企图用破坏的办法使这次战斗任务归于失败。罗日杰斯特温斯基手下的军官也没有感染到沙皇和他的圣彼得堡官员们的热情。在舰队出发的欢乐气氛中，他们极力隐藏自己的真实感

情。但是在告别宴会的那天晚上，亚历山大三世号坦率的舰长布赫罗斯托夫的愤怒突然发作起来。“你们希望我们胜利，”他对心神不安的来宾说，“但是那儿不会有胜利。俄国不是一个海上强国，说不定，在半路上，我们就会丧失舰队的一半。如果我过于乐观，我们的全部舰艇真的开到黄海，东乡也会把它们炸得粉碎。不过，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一件事。我们都知道怎样去死。我们不会投降。”

布赫罗斯托夫的同僚赶忙使他安静下来，因此他的愤怒的言词才没有让沙皇听到。舰队起锚两天以后，尼古拉在他的日记上虔诚地写道：“主啊！祝福舰队的航行吧。让它平安无事地到达目的地，为了俄国的安全和幸福，让它在可怕的战斗任务中胜利吧。”

漫长的东方航程

从一开始，舰队就给麻烦缠上了。在北海，极度紧张的俄国炮手，误把英国的拖网渔船队看作是日本的驱逐舰队，向它开了炮，击沉一艘，击伤数艘。最后这个事件虽然平息下去了，却给这些俄国人赢得了一个诨号：“疯狗舰队”，成为世界的笑柄。折磨罗日杰斯特温斯基的是一再出现的故障；是毫无经验的海员们的愚蠢；是革命党人中核心分子的煽动。但是压倒一切问题的是舰队艰巨的补充燃料和改装任务。在舰队整个一万八千里的航程中，俄国根本没有一处陆上基地；对于交战国的战舰，根据国际法，中立国家的港口都关闭了，在主要的几个强国中，只有法国和德国敢于给舰队提供维持航行所必须的港口设施。甚至那些强有力的同情国家，也难以藐视国际法（至少是公开地）来给俄国舰队提供支援。在西非海岸法国人管理的达喀尔

港^①，港监登上苏沃洛夫号，严厉地命令罗日杰斯特温斯基停止加煤，立刻离港。

罗日杰斯特温斯基的反应是干脆的：“除非你岸上开炮，否则我们打算自己动手加煤。”

但是俄国舰队还是离开了绝大多数的中立国家港口，不得不在公海上，从伴随舰队的煤船上加煤。

新闻记者报道了这支舰队在每一处港口的进出，到十月中，世界上对于这支舰队的舆论，以赞美代替了轻蔑。罗日杰斯特温斯基在困难而危险的航程中已经走完了一半，未折一舰一炮。他已经赢得了他的叛逆海员们吝惜的忠诚；在各种最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在公海上完成了舰队的加煤和装配任务。

但是，十二月十五日，在这支舰队驶往马达加斯加加煤停留的途中，它收到了灾难性的消息。旅顺口马上就要被日本陆军攻陷了，被包围的俄国战舰已被炮火摧毁。这就意味着罗日杰斯特温斯基为旅顺口解围的任务已经不存在了。他将不得不单独对付东乡。

罗日杰斯特温斯基决定，他的最好的航路将是驶往俄国在太平洋所剩下的最后一个锚地符拉迪沃斯托克，并且要行动迅速，使日本的谍报无法确知他的位置。但是在圣诞节之前，正当他准备驶离马达加斯加的时候，这位备受折磨的将军收到了圣彼得堡的断然命令。命令要他等待已在途中前来增援的、由海军少将涅博加多夫统帅的太平洋第三舰队。意识到这种“援军”只不过是一批破船旧舰，罗日杰斯特温斯基断言，这些东西仅仅是拴在他脖子上的磨石，在战斗中毫无用处，此外，在舰队的航速方面还会拖他的后腿。但是那些遥远的战略家们却寸步不让。

① 现西非塞内加尔共和国首都的港口。

一怒之下，罗日杰斯特温斯基向圣彼得堡提出了辞呈。但是辞呈被拒绝。伤害之外，再加上侮辱，圣彼得堡的命令说，等他打败东乡，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后，他得把舰队的指挥权交给从西伯利亚前来接任的维里洛夫海军上将。

当东乡威吓说，如果德国运煤船再伴随俄国舰队的话，就要把它们击沉，于是，一直供应煤炭的德国煤船突然撤离。这是对罗日杰斯特温斯基进一步的折磨。

他决定公然违抗要他在法属印度支那金兰湾等待太平洋第三舰队的命令，单独不停顿地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在最后一次加煤停泊以后，在进行日常检查中发现，要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战列舰亚历山大三世号却缺少足够的存煤，这打乱了他的全盘计划。

为了赢得舰队效率的竞争性的纪录，舰上的军官在每次加煤时都弄虚作假多报几吨，积累的缺额达到四百吨。要弥补这项差额，就得从西贡开来运煤船，而这样一个耽搁，就会使对日本人保密的舰队行踪全部暴露，因为日本在世界上有一个可怕的间谍网。

为这次打击所征服，激荡着被抑制的愤怒，罗日杰斯特温斯基命令舰队驶进金兰湾，等待涅博加多夫和那个多余的舰队。

发现敌人舰队

攻陷旅顺口以后，东乡急忙把舰队调回日本进行紧急检修，然后进行广泛的炮术训练。他把全部赌注都押在这样一个假设上：日本高超的射击技术，将压倒俄国大炮射程远、口径大的相当大的优势。他经常提醒手下的军官：“百发百中的一门大炮，要胜过百发一中的百门大炮。”

这时，他的先遣巡逻舰无法搜索到敌舰的行踪。不过看来可以肯定的是，罗日杰斯特温斯基一定会朝位于朝鲜和日本之间的对马海峡驶来，因为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其他一切航路都会带来极大的困难。在这种设想的驱动下，东乡派出几艘最快的巡洋舰，对海峡进行仔细的、有条不紊的全面搜索。

极度紧张了几天，这几艘巡洋舰什么也没有发现。然后，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在薄雾笼罩的黎明前的黑暗中，辅助巡洋舰信浓号的舰长成川看见了前面有一艘灯火通明但完全无法辨认的船只。信浓号在黑暗中几乎隐蔽了两个小时。

在东方刚刚透出一线曙光时，成川认出这艘船是俄国舰队的海上医院（它违抗了罗日杰斯特温斯基灯火管制的命令）；在海上医院船的前面是一串不少于十艘的俄国战列舰。信浓号在掉转航向离开时，它的无线电报务官早已发出等待已久的电报：“发现敌人舰队”。

在停泊在马山湾的旗舰三笠号上，东乡习惯地身着军服正在睡觉。清晨五点过后不久，当电报送到他的房舱时，他坐起来阅读电报，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在他那毫无表情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爽朗的笑容。

作为战前准备，舰队的战舰把贮存在舷侧额外的煤袋都扔到海里去，然后在甲板上撒上黄沙，如果在战斗中负伤流血，这样就不致太滑。分发了绷带，准备了例如腌海鱼这类可口的食物，官兵都换上崭新的军服来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

还在继续往海里扔煤袋的时候，三笠号就飞快地掠过其他舰艇，占据领先地位。在它以十八节的速度破浪前进时，在装有金属撞角的舰首下面浪花飞溅，在扇形的甲板上，为数达七十人的舰上乐队，演奏着海军进行曲。在三笠号帆桁的一端，飘扬着东乡的战斗信号（纳尔逊致参加特尔法耳加尔战役的英国舰队，

用的就是这种信号)：“国家命运在此一战。全体官兵奋勇杀敌。”

在俄国人中间也许还缺少统一的目的。虽然沙皇的联合舰队现在差不多达到五十二艘舰艇(在陈旧的舰队于金兰湾外面加入以后)，罗日杰斯特温斯基仍然希望在对马海峡的迷雾中人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去。但是，违反军纪的海上医院已经暴露了目标。现在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凡是容易燃烧的东西都从甲板上清除出去，栅栅栏栏都塞上湿帆布防备弹片，大炮上都喷洒了圣水。

刚刚在炮火的射程以外，尾随着的四艘日本巡洋舰，从容不迫地察看着沙皇舰队。这几条守望犬是如此地激怒了俄国战列舰奥勒尔号的指挥官，以致他没有等待最高司令官的命令，就终于向敌舰开炮。它的第一次齐射，就把日本人赶跑了，但是却招来了罗日杰斯特温斯基愤怒的信号：“不要浪费弹药”。接着，大炮沉寂下来。

虽然如此，这个短暂的插曲却使俄国全体官兵乐了起来。而且，因为刚巧又碰上沙皇和皇后加冕典礼周年大庆，所以就把伏特加打开，舰队牧师举行了感恩祈祷仪式，军官们从注满伏特加的酒杯里为圣上的健康干杯。全体官兵都松了口气。也许这一切终究不会太坏。

放长线，钓大鱼

中午过后不久，一长串灰色战舰和舰上的上层结构在天际朦胧出现。这是东乡现代化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主力分遣队。罗日杰斯特温斯基严厉地眺望着逐渐接近的敌方舰艇。“全在那儿啦”，他一面放下望远镜，一面喃喃地对一个随从参谋说。

正当迎面而来的敌舰纵队大约仍在四渚以外的時候，它突

然来了一个惊人的行动。它原来是一直朝罗日杰斯特温斯基的右舷逼来，现在却突然改变航向，对直从他的舰首前方穿过去，一直到左转舵，然后再回到原来的航向。接着领航舰作了一个紧凑的U形转弯，其余的战舰一艘接一艘地跟着转弯，这个机动行动就使得日本整个舰队和俄国舰队并排朝同一个方向前进。

这种行动特别危险，因为当每艘战舰作U形转弯时，它必须经过一个固定的转向点，就好像围绕一个无形的浮标行驶似的，这样就等于给俄国舰队提供一个固定不动的射击目标。但是不管这个行动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东乡决心要把这场仗放在顺风一侧打，这样炮弹掀起来的浪花雾沫就不会妨碍炮手望远镜的视线；风浪就会威胁接近吃水线有窟窿的俄国战舰。这场赌博的赌注是巨大的，因此，赢得赌注的决心下得很快。几年以后，根据东乡对一位朋友的谈话：“打赢一场海战的途径是抓住战机，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而判断战机的才能从书本上是学不到的，只有从战争中才能学到手。”

一旦发觉自己犯了错误，沙皇的炮手迅速掌握战机，在领航的日本旗舰三笠号还没有从U形转弯中改正动作时，十五发炮弹就在舰上爆炸了，一枚弹片在离东乡胸前只有几吋的地方撕裂了舰上的罗盘。东乡视若无睹，坚定地拒绝参谋们恳求他到比较安全的、有装甲的三笠号的司令塔去。

“我一生的全部战斗都是在舰桥上打的，”他平静地对参谋们说，“我是快到六十岁了，我这身老骨头不值得照顾了。但是你们还年青，有你们的前途。所以照顾你们自己吧，活下去才能报效国家。”

东乡长久以来就使他手下的官兵对战斗中的大流血场面有所准备。“每次海战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你们自己一方

损失惨重，”他强调说，“你们自己舰上的死亡和毁灭，全都呈现在你们面前，而对敌舰所造成的破坏，则大部分仍然是难以察觉的。”

有必要记住这一点，因为俄国密集的炮火立刻就在日本官兵中造成一场大屠杀。“一颗炮弹在后舰桥下面爆炸，”在战列舰朝日号的一位英国观察员帕肯汉上校说，“空中全是到处乱飞的碎片。落在脚下的是一名水兵半个右下颚。在二十码周围，每件东西，每个人身上，都溅得血迹斑斑。一发六吋炮弹击中一门发射十二磅炮弹的大炮，炸死了炮长、炮手和一些旁观者”。

在日本舰队完成它的冒险行动的十五分钟中，俄国舰队的炮弹炸毁了八云号的前炮塔，摧毁了浅间号的驾驶转向装置，使它失去正常的航行能力，总共重创日舰三艘，击中几艘，暂时使一艘失去活动能力。

如果在最初关键的几分钟，罗日杰斯特温斯基悄悄地溜到日舰纵队的后面，把炮火倾泻在它的易受攻击的后部舰艇上，他也许可以逃出陷阱。但是他自己的战舰仍然被日舰的突然行动弄得莫名其妙。此外，俄国舰队后部行动迟缓的陈旧舰艇远远落在后面，深怕误中自己的战舰，炮手们不敢向日舰开炮。就连苏沃洛夫号及其骄傲的崭新姐妹舰也比设计的速度慢，无法和东乡的现代化战舰并驾齐驱。东乡的战舰现在凭着更快的速度向俄国舰队的头部逼来，迫使它偏离预定目标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航向。

罗日杰斯特温斯基的暂时优势渐渐地溜走了。在最后几艘日舰完成U形转弯以后，日本舰队就采取了和俄国舰队平行的航向，距离俄舰还不到一浬，然后向俄舰开炮。东乡的赌账付清了。在日舰第一阵舷炮的齐射中，击中了俄国旗舰苏沃洛夫号的前部烟囱，炸死了附近的全部官兵。再一阵舷炮齐射，摧毁了

苏沃洛夫号的炮塔，炸伤了罗日杰斯特温斯基和舰长，炸毁了无线电设备，中断了苏沃洛夫号和其他战舰的联络。舰上是一片熊熊烈火。俄国人并不知道日本人所用的是新型的燃烧弹，碰到东西就起火（俄国炮弹的质量是十分低劣的，而且常常是哑弹）。在开阔的甲板上着弹的效果是致命的。

当苏沃洛夫号上的资历较深的军官之一、指挥官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攀上旗舰的前舰桥俯瞰战场的全景时，他被吓呆了。“敌人的战舰排成无懈可击的编队，”谢苗诺夫后来回忆，“平行地向我舰逼来，然后又逐渐加速前进。看不到敌舰上混乱的迹象。但是我们呢？我朝四下里看了一下。多大的浩劫！舰桥在燃烧，甲板上的废墟在闷燃，尸体枕藉。信号台、测距台、大炮指挥所全被摧毁了。位于舰队后部的亚历山大三世号和沃罗季诺号也笼罩在黑沉沉的烟火里。”

然后，东乡的炮手改用穿甲弹。距离稍稍超过一哩，结果是令人丧魂失魄的。在苏沃洛夫号的后炮塔上，两发摧毁性炮弹的爆炸，把其中的一门大炮炸得歪歪扭扭地翘上天，全部官兵，非死即伤。另一发炮弹撕裂了吃水线的舰壳，海水汹涌而入。第四发炮弹使挤满伤员的主甲板变成了屠场。主桅被抛到舰外，一只烟囱横坍在扭曲的钢板上面，另一只烟囱上弹痕累累，面目全非，烟囱底部，火舌四射。最后一发重型炮弹使苏沃洛夫号操舵装置操纵失灵。

身负重创的旗舰摇摇晃晃地失去了控制，舰尾拖着长长的浓黑的烟火。

在第一次猛烈的交火中，庞大但已过时的装甲舰奥斯利雅布亚号甚至比旗舰苏沃洛夫号所受的打击还要沉重。奥斯利雅布亚号甲板上超载的煤，使它的装甲区沉到吃水线以下。它被连续的炮弹所撕裂，炮塔一侧被击穿的裂口，用它的一位军官的话

来说，“不是一个小洞，而是一扇大门。”舰舱迅速进水，大炮沉寂下来，舰上一片烈火，摇摇晃晃地等待末日的来临。

过了没有多久。在日本巡洋舰把炮弹倾泻到它身上时，有十分钟时间，左舷的倾斜越来越厉害。鲜血从舰长光头的伤口上源源涌出来，他嘴上叼了一支香烟，站在舰桥上，叫喊着要水兵们跳海。

“我们快沉啦，再见吧，水兵们！”他嚷着，“快点游开！魔鬼吞了你！要是你不游开，旋涡就要把你卷下去啦。”

接着，奥斯利雅布亚号倾斜过去，露出长满海藻的舰底，然后沉没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

与此同时，旗舰苏沃洛夫号上的情况迅速恶化，舰上的烈火绝望地失去了控制。大约在下午三点，一发炮弹击中舰上的炮塔，早已身受重伤的罗日杰斯特温斯基被弹片击中，颅骨的碎片又伤了神经。虽然还有知觉，但是痛苦不堪，他被参谋们拖到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炮塔里去，靠在弹药箱上。接着的一发炮弹把苏沃洛夫号的舰长伊格纳特留斯炸得粉碎，在舰长站立的甲板那儿留下一个窟窿。

当日舰炮手转向其他目标时，在炮击声中迎来了暂时的宁静，指挥官谢苗诺夫摸索着到他自己的房舱去找香烟。路上他偶然碰到海军学校见习生维尔纳·冯·库尔赛，在长途航行中，他是餐厅里特别受欢迎的爱说笑话的人。现在他似乎是全舰唯一乐观的人了。在谢苗诺夫告诉他准备到哪儿去时，他咧开嘴笑笑。

“到你的房舱去？”他说。“我刚从那儿来。我跟你一块儿去。”

谢苗诺夫跟在冯·库尔赛后面，穿过烈火和残骸。当他走到官舱区时，他一楞站住了。一个巨大的裂口在那儿张开大嘴，直

接命中的一发炮弹早把他的房舱炸掉了。谢苗诺夫厌恶地掉转身就走，他对笑话的欣赏力，要比冯·库尔赛差，库尔赛一面大笑，一面给上司递过来一支香烟。

几分钟以后，回答了罗日杰斯特温斯基的参谋长克拉皮尔·德·柯龙固耳发来的信号，驱逐舰乌伊鲁号并肩驶近旗舰。德·柯龙固耳决定使受伤的、目前处于半昏迷状态的罗日杰斯特温斯基将军离开注定要沉没的、正在绝望挣扎的苏沃洛夫号，冯·库尔赛拿着话筒站在舰首，指挥乌伊鲁号从波浪汹涌的海上靠拢旗舰。

当驱逐舰乌伊鲁号用缆索和旗舰缚在一起时，一群苏沃洛夫号的水兵靠在战列舰的一侧，组成一条人工减震器，更多的水兵则等候在下面乌伊鲁号的栏杆那儿。在这艘小驱逐舰被海浪托起来的时候，毫无生气的罗日杰斯特温斯基半滑半滚地从伸出的手臂里传过去。乌伊鲁号驱逐舰早已装满了奥斯利雅布亚号的幸存者，不过毫无疑问还能够搭载苏沃洛夫号的人员。只有谢苗诺夫、德·柯龙固耳和另外几个水兵还能够在乌伊鲁号没有靠拢以前就跳到舰上。

“不跟我们一起走吗？”谢苗诺夫对冯·库尔赛喊叫。

“不，阁下。”海军见习生喊着回答，“我待在舰上。”

见到的最后的一面是，这位年青的海军见习生（现在他是留在舰上唯一的身强力壮的军官了），身后带着两名舱面水手，正在向舰尾跑去。他们在舰尾继续操纵旗舰上唯一可用的大炮，还击敌舰不断的进攻。但是，天黑时，东乡派来了几艘驱逐舰和鱼雷艇来毁灭这艘旗舰。对苏沃洛夫进行致命一击的光荣任务落在藤本梅次郎少佐身上，后来他写下了唯一亲眼目睹苏沃洛夫号覆灭的报道。

“虽然苏沃洛夫号只剩下一门可以发射的大炮，”他回忆，

“但是它仍然在开炮，表示抵抗到底的决心。最后，大约在晚上七点，在我们的鱼雷艇两次鱼雷进攻以后，它沉没了。”

苏沃洛夫号上没有一个幸存者。半小时以后，亚历山大三世号追随它的姐妹舰之后，葬身海底；九百名官兵，包括坦率的、当初在勒法尔告别宴会上保证说我们知道怎样死的布赫罗斯托夫舰长在内，全部被俘。

日落时分，东乡发出信号，命令巨型战舰撤退，为鱼雷艇提供毫无阻碍的战场。甚至在这场战斗的后期，进一步的灾难还在等待着俄国人。战列舰富士号临撤走时的一发炮弹，击穿了沃罗季诺号最前面的舷侧炮塔。这发炮弹卓有成效的爆炸，被朝日号舰上的英国观察员帕肯汉亲眼看见了。“巨大的烟柱，直窜到烟囱的顶部，”他说，“锅炉爆炸，一声呼啸，舰身沉入海底；留下一片黑压压的浓烟，笼罩在沃罗季诺号原来所在的那片海面上。”第二天一早，一艘日本驱逐舰救起一名赤身露体的、紧紧抱住沃罗季诺号上被击毁的救生艇桅杆的水兵。他是沃罗季诺号上唯一活下来的人。

鱼雷之夜

到天黑，正如许多较小的战列舰和辅助舰一样，四艘俄国战列舰，包括苏沃洛夫号在内的三艘已经沉没。对于被包围的幸存者来说，黑夜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喘息的时间。当俄国舰艇拚命往北向符拉迪沃斯托克前进的时候，成群结队的日本鱼雷艇（总数超过五十艘），就象是饥饿的鲨鱼似地逼过来。

急于要和东乡的大型战舰在白天的胜利争功，鱼雷艇的指挥官把要害的攻击压到近距离平射。“我们应该能够把攻击目标压缩到二十码之内”，就在这场战斗之前，一个指挥官给朋友

的信中这样说，“如果我们击中敌舰，我们就跟俄国人一起沉没；如果我们被击中，俄国人就跟我们一起完蛋，因为最后活着的那个人会施放剩下的鱼雷。人生只不过是一场夏夜之梦！”

在恩奎斯特少将指挥下的俄国的一些巡洋舰，窝窝囊囊地完蛋了。受到打了就跑的鱼雷艇的攻击，也受到出羽将军指挥的日本巡洋舰在暗中的偷袭，恩奎斯特以及他的四艘最快的战舰，在天亮以前就撤出战斗，放弃了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尝试，向中立的马尼拉驶去（根据国际法，战舰在马尼拉要解除武装）。另一方面，恩奎斯特的一艘过时的、行动迟缓的巡洋舰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号在沉没以前却击沉了两艘、重创了一艘日本的鱼雷艇。

五月二十八日晴朗而寒冷的黎明，发现了涅博加多夫海军少将统帅的、拥有仅有的几艘大型战舰的太平洋第三舰队，拚命往北急驶。这几艘大型战舰是涅博加多夫的旗舰尼古拉一世号，新战列舰奥勒尔号，两艘老式的装甲舰，以及快速巡洋舰伊鲁姆鲁德号。清晨六点敲过不久，当他们看到西南方远远的天际有浓烟出现时，这支被遗弃的小舰队距离符拉迪沃斯托克仍然有三百哩。接着渐渐露出三艘日本轻巡洋舰的烟囱。不久，较大的几艘日本战舰也逼上来了，到上午九点，一共有二十七艘日本战舰把俄国舰队包围起来。敌人的领航舰是东乡的旗舰三笠号。

那天晚上，日本舰队整夜往北开，以便占据现在所占的位置——正好处于俄国舰队逃往符拉迪沃斯托克通道的对面。不久，东乡发出信号，日舰的巨型大炮开始开炮。

“除了投降，别无出路”

第一排炮弹在俄国战舰旁边激起高达六十呎的水柱，涅博

加多夫少将问尼古拉一世号的炮术官敌舰有多少距离。

“一万二千码，阁下，”他回答。

但是俄国所剩下的大炮没有一门大炮的射程可以到达一万一千码。日本战舰刚好在这个射程之外，不慌不忙地用炮弹把它们撕成碎片。“我们怎么办？”涅博加多夫问他的下属军官。

尼古拉一世号身负重伤的舰长斯米尔诺夫向大家回答：“昨天我们已经尽了责任，阁下。今天我们的情况是不能再打了。除了投降，别无出路。”

看到别人脸上同意的表情，涅博加多夫慢慢地点点头。罗日杰斯特温斯基昏迷不醒地躺在驱逐舰乌伊鲁号上，福尔克沙姆阵亡，眼下他是沙皇舰队所剩下的全部舰艇的最高司令官，他下令升起国际法规定的 XGE 旗号：“我们投降”。

不相信俄国的五艘战舰不经一战就会投降，东乡继续进行炮击。“永远不要害怕强大的敌人，永远不要藐视弱小的对手”，这是他的格言之一。当同样扯起投降旗帜的俄国快速巡洋舰伊鲁姆鲁德号把那面旗帜降下来，向前猛冲企图逃走时，东乡怀疑这个信号可能是个骗局似乎获得了证实。他毫不留情地继续炮击。

站在东乡身边的作战处长秋山越来越紧张不安。秋山是个偏执古怪的人。习惯上，他跳进海里游泳从不脱裤子，到餐厅吃饭，拖拉着拖鞋，还有其他种种奇行怪癖，但大家都原谅他，原因是他在作战方面足智多谋。据说在他大脑的档案里，他能回答任何想象得到的海军战略问题。制订日军作战计划，在对马拦截并且有条不紊地切断俄国舰队的正是他。但是秋山对于规划战斗比战斗本身更有兴趣，眼下对于炮击一个不抵抗的敌人，使他感到厌恶。抑制着对东乡的敬畏，他迫使自己提出抗议：

“阁下，敌人已经投降了。不让我传令停止炮击？”

尽管东乡将军对秋山是敬佩的，但是他没有回答。他仍然疑窦重重地观察着敌人，而他的炮手们继续对敌舰开炮。

秋山再一次提出抗议：“阁下，武士的精神道德不是要我们停止射击吗？”

这一次东乡以他对海战规律的广泛的知识作了回答：“敌人的军舰仍然保持编队，敌人的军舰还在行动。”一直到涅博加多夫首先升起一面白色台布，然后日本舰上升起太阳旗，全部俄国舰艇的发动机都停了下来，清清楚楚地停在海面上不动，东乡才下令停火。

俄国舰队的投降对于东乡仍然是一个神秘莫测的问题。“完全出于我们的预料，”后来他回忆，“我们下了最大的决心要歼灭他们，但是没有用。这实在是最奇怪的罕见事件，我们都大吃一惊。”

这位日本将军如果能在近距离看到被连续炮击的俄国战舰，或者在听到涅博加多夫准备接纳由秋山率领的日本检查团登上尼古拉一世号时对自己手下的军官们谈话，也许他就不致于如此吃惊了。

“弟兄们，”涅博加多夫说，“我已经决定向敌人投降，否则我们只有毫无目的地被歼灭。在我作出这个决定时，心情是沉重的，但是我知道，就是忍受再大的痛苦，也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或者祖国的命运了。让我来承担投降的耻辱吧。”

然后，在这位战败的将军攀上三笠号的舷梯和东乡谈判投降条件时，他受到严肃而谦恭的接待。正式投降条件经双方同意以后（俄国战舰由日本水兵押送，但沙皇的军官可以保留他们的短剑），这两位彼此对抗的将军相互干杯。但是，这出短暂的、暴力戏剧的最后一幕还没有开场。

历史上最大的海军胜利

那天一清早，罗日杰斯特温斯基将军被人从乌伊鲁号转移到驱逐舰贝多夫伊号。贝多夫伊号的情况比较好一些，暂时恢复知觉的罗日杰斯特温斯基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他再度陷入昏迷状态。贝多夫伊号和它的姐妹驱逐舰格罗兹尼号一度的确是往北加速前进。但是大约在下午三点，两艘日本驱逐舰冲了上来，结果只有驱逐舰格罗兹尼号逃脱了。贝多夫伊号不敢冒高速的危险，因为罗日杰斯特温斯基头部的伤势十分严重，高速的震动可能会导致他的死亡。在同僚军官们的同意下，罗日杰斯特温斯基的参谋长克拉皮尔·德·柯龙固耳勉强决定投降。

在克服若干困难以后（驱逐舰细浪号的舰长芝合上尉如同东乡一样，很难相信这种投降），投降生效。当芝合登上贝多夫伊号上时，他发现一群俄国军官，他们富丽堂皇的服饰似乎和这艘小得可怜的驱逐舰很不相称。跳上贝多夫伊号以后，芝合立刻用他的指挥刀把舰上的无线电天线剃得稀烂，然后宣布：“现在我就是本舰的司令官。”

有一段时间，芝合不相信俄国舰队的最高司令官就在他的俘虏之中。但是他最后还是被说服了，相信罗日杰斯特温斯基的确是在舰上，但是伤势十分严重，不能被人打扰。这位年青的上尉让他的焦虑不安的俘虏们放心。

“诸位，我不会打扰他，”他同意，“但是最低限度，我必须亲自看看他。”

亲眼看见重重绷带的罗日杰斯特温斯基以后，芝合把俄国全体军官都带回细浪号，在罗日杰斯特温斯基的房舱门口留下

一名日本卫兵。四十八小时以后贝多夫伊号被引进日本南部的佐世保港，罗日杰斯特温斯基被送进海军医院。

东乡发给天皇的捷报特别简练。“由于上苍的恩赐，”它开头说，“我们的混合舰队已经胜利，几乎全歼敌人第二和第三太平洋舰队，战斗是五月二十七和二十八日在日本海进行的。”但是，只是在这以后，这次海上大捷的全部意义才弄清楚。

在全部进入对马海峡的三十八艘俄国战舰中，除了三艘以外，全部被击沉、俘掳或拘留。最后颠颠簸簸地驶入震恐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是两艘驱逐舰——一艘是格罗兹尼号和一艘轻巡洋舰。日本只牺牲一百一十七人，而俄国阵亡的却是四千八百三十人，另外还有六千人被俘。日本舰队总共击沉俄舰十四万七千吨，另外还有五万八千吨舰艇不是被俘就是被拘留，而日本舰队的损失只有三百吨。

在罗日杰斯特温斯基克服种种病痛而恢复健康时，这场巨大的灾难渐渐地被他知道了。六月三日，当东乡平八郎亲自前来拜访罗日杰斯特温斯基时，这位战败的将军至少获得了某些安慰。坐在战败者病床边上，东乡首先对医院的设备简陋表示歉意，然后赞扬对方的英勇。“对于一位军人来说，光荣的战败并不可耻，”东乡说，“两军对垒，非胜即败。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已经尽了职责。你英勇地执行了你的伟大的任务，一直到受了重伤。我真诚地尊敬你。”

“败在你的手下，我并不觉得可耻，”当这两位将军握手告别时，罗日杰斯特温斯基回答。离开医院时，东乡下令，必须对这位俄国伤员给予最好的治疗，并且要给他提供充分的通讯设施，以便他同他自己的政府通报。

对于罗日杰斯特温斯基的战败报告，沙皇的复电是宽大而同情的：“你对俄国和我本人的报效，我衷心感激，”电报说，“没

有赐给你胜利，这是上帝的意志，但是俄国为你的英勇而感到骄傲。愿上帝赐给我们大家安慰。”

但是在圣彼得堡，其他的官员决定为这场灾难寻找一个替罪羊，罗日杰斯特温斯基八月回国以后，他们把他交付军事法庭审判。以当时失去知觉为理由虽然宣布罗日杰斯特温斯基本人无罪，但还是命令这位将军退役。尽管罗日杰斯特温斯基坚定地为其下属辩护，参谋长克拉皮尔·德·柯龙固耳和涅博加多夫将军还是被判处死刑，理由是他们要对投降负责。以后虽然沙皇给他们减了刑，但这两人仍然遭到长期的监禁。罗日杰斯特温斯基过了三年多痛苦的退隐生活，于一九〇九年逝世。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五月号美国《读者文摘》杂志
香港版 余杰译）

东帝汶的独立和革命

〔日〕鹤见良行 前田透

。 葡属东帝汶

帝汶岛位于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中间，坐落在东印度群岛的东端。全岛总面积为三万两千平方公里。岛的东半部原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西半部在殖民地时期属于荷兰，因此后来归属印度尼西亚，其中有一块叫做欧库西的葡属飞地。十六世纪中叶，多明我会的传教士在帝汶建立的第一块葡萄牙殖民地，就是这个欧库西的利富奥。从那时到现在，东帝汶一直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东帝汶的人口约六十五万，在人种上，同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居民一样，是马来血统和波利尼西亚^①血统的混合（据估计，马来血统本身是若干种族的混合）。在东帝汶，有六个种族集团、三十七种方言。葡萄牙殖民者同当地妇女通婚，所生的混血儿叫做托帕塞（意思是黑肤色的葡萄牙人）。他们就象菲律宾的混血儿那样，逐渐发展成为第二个有势力的阶级。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帝汶曾经同马六甲、巴达维亚（现在的雅加达）、吕宋岛北部一起为英国军队占领过。

如人们所熟悉的，推动十六世纪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

① 中太平洋的岛群。——译者

的殖民地贸易的是香料。葡萄牙人在帝汶岛经营的主要是紫檀香木。由于滥伐，紫檀香木濒于灭绝，以后引进的是咖啡。现在它占着帝汶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八十。

居民的幸福等等，作为欧洲的殖民地，当然是谈不上。而帝汶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则尤为不幸。葡萄牙在殖民地的经营上，并不热心于增加当地的生产和扶植工业，也没有在当地居民中培养官吏领导阶层和民族资本。

因为露骨的掠夺，就是在同样的殖民国家之间，葡萄牙的殖民地经营也是声名狼藉的。它的内容是奴隶贸易、强制劳动和对成年男子征收人头税。其它的殖民国家，特别是英国，慢慢地废除了强制劳动，使它转变为近代的工资劳动，可是葡萄牙废除奴隶制才不过是上一世纪末的事情，强制劳动则一直继续到最近。

葡萄牙的殖民统治的另一个支柱是天主教会。天主教教义同古代传下的万物有灵论结合起来，不仅妨碍了合理的思考能力，而且有轻视工业社会的勤勉和积累财富的倾向。

这样，葡属帝汶的山谷地区，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仍然停留在几乎没有开化的黑暗状态之中。

百分之九十是自耕自给的农民

葡属帝汶的经济生活是怎样的呢？一九七三年的预算总额约为五百万美元，其中岛内的税收只不过十万美元。这就是说，岛内的经济只能负担行政经费的五分之一，此外的四百九十万美元是由葡萄牙政府负担。如此不上算的殖民地经营委实是罕见的。在同样是葡属殖民地之中，同拥有矿物资源的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比较起来，帝汶是格外贫困的。

一九七三年的预算，还是刚开始谋求改善帝汶经济的葡萄

牙政府慨然把预算增加三倍以投资于道路等基本部门的结果。这种道路仅仅是指铺筑了三英里长的首府帝力的主街。同已经在太平洋战争前就完成了相当长的公路网的英属马来亚和荷属爪哇岛比较起来，这是显著的差别。教育和福利设施几乎等于零。文盲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六十五万的居民，医生仅有二十名，而且其中十二名集中在首府。迈出首府一步，整个地区等于是缺医少药的村庄。疟疾和结核是两大疾病。帝汶被称为是世界上结核病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帝汶的经济具有极端的农产品单一化和长期入不敷出的特点。一九七三年的贸易收支，进口为六百六十万美元，而出口为四百四十万美元。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是在种植园中生产出来的咖啡，其余是椰子肉和花生仁。出口如此单一，使帝汶经济极大地为咖啡的国际行情所左右。出口的流向，从一九七二年的数字来看，百分之七运往葡萄牙，百分之五十二运往葡萄牙以外的欧洲，百分之三十三运往美国。

工业如此落后，又缺少矿物资源，因而连吸收外资也没有进行。至于石油，是由澳大利亚资本的国际石油公司和帝汶石油公司共同经营，英国的伍德赛德·巴尔默公司最近参与其事。据报告，一九七四年二月发现了油层的苗头，然而以后没有进展。岛内全部矿物开采权为布罗肯·希尔控股公司^①所有，最近两年由两个地质学家负责勘探，不过没有成功的消息。日本帝汶友好协会投资一亿八千万美元从事发展电力事业之说，曾经在当地流传过，可是根据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和岛内的政治不稳看来，这个传说的根据是不足的。

因为岛内经济的现代化部门微不足道，所以，百分之九十

^① 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垄断企业。——译者

的岛上居民是靠非常原始的自耕自给的农业来生活。

帝汶的村落是以崇拜祖先为纽带，基础是按照父系的大家庭制度。在南海岸，存在一部分母系制度的种族。土地为村落公有，被分配给各个家庭。在帝汶的这种部族社会里，明确地区分为五个阶层：被称为利乌利的大酋长或王；叫做达托的小酋长；叫做埃马列诺的自由人；叫做阿塔的奴隶；叫做鲁托温的家畜饲养员。

他们的农业方法是典型的火耕轮作，每两三年就迁移一次。主要作物是玉蜀黍和大豆，有时也种棉花和木棉等纤维植物。肥料一概不用。农机具也是极其原始的。帝汶气候极其明显地分成旱季和雨季。在有水利灌溉设施的地区，也有象巴厘岛和吕宋岛北部可以看到的那种水稻梯田。水稻梯田产量比火耕地高，显然是一种进步的农业方法，但是为长久而严重的旱季所限制。成为岛上居民维持生活的重要辅助来源的，是用弓矢狩猎野生动物或采集野生水果，应用原始方法的渔业，等等。然而，这些辅助办法也仍然处于采集阶段，同其它东南亚地方比较起来，也是特别落后的。

三党纷争，各持己见

葡属帝汶的居民因为上述经济的极端停滞和殖民当局的政治压迫，迄今一直处在孤立于亚洲其它解放运动之外的状态。从前，虽然几度发生过村落单位的绝望的叛乱，但那些孤立的斗争立即都被镇压下去了。就拿最近的一次事例来说：那些在北面的苏拉威西（西里伯斯）发生佩尔梅斯塔运动时逃至帝汶岛的居民，在一九五九年举行了暴动，可是，由于五百个居民遭到斩尽杀绝而被镇压下去了。这个事件间接地影响到今天的情况。

不管怎么样，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在葡萄牙本土发生了军事政变，法西斯政权垮台，部分的自由化一开始实行，帝汶民主联盟、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帝汶人民民主协会三个政党就成立了起来。这是一九七四年六月间的事情。

三党纷争，各持己见，是由对于有关帝汶前途的选择有所不同而引起的。当时最大的政党是帝汶民主联盟，不过到现在，多数的支持者都背弃了它。帝汶民主联盟的支持者是同殖民当局最靠拢的统治阶级。他们是：殖民政府的高级官吏、天主教会的修道士、种植园主、从殖民当局获得利益的酋长，等等。当时有这样的情况：这个党因为有酋长的袒护，独揽了村落居民的支持。

帝汶民主联盟的纲领，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促进葡萄牙指导下的经济发展；经过在葡萄牙联邦内承认帝汶的自治权的过渡期，逐步达到完全的独立。说穿了，它是一个希望尽可能长久维持同宗主国关系的保守政党。

同它相反，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如它的名称所表明的那样，是一个谋求通过立即独立和改变存在于岛内的殖民体制来解放人民的激进政党。这个党最初是一个以激进的新闻记者拉莫斯·奥尔塔^①为中心的只有十四、五个人的地下讨论小组，在四月葡萄牙政变后，立即组织了工人保卫委员会，它在一次领导殖民地政府低级官吏要求增加薪金的斗争中得到成功。因为有这样的发展历程，这个党的支持者是工人和下层农民。在反殖民主义这一点上，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是彻底同帝汶民主联盟对立的。以奥尔塔为总书记的这个党，推戴政府的低级官员弗朗西斯科·沙维尔·多·阿马拉尔为主席。奥尔塔是葡萄牙人父亲和帝汶人

^① 当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宣布独立后，奥尔塔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就任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外交和新闻部长。——译者

母亲所生的混血儿。阿马拉尔是纯粹的帝汶人，是在澳门的耶稣会派神学校肄业过的修道士，一九五九年离开了教会。奥尔塔也属于受过教育的百分之十的有文化的特殊阶层，在官办报馆工作时，因同葡萄牙人的上司发生冲突，被驱逐到莫桑比克。

第三个最小的政党是帝汶人民民主协会，是归并印度尼西亚派。据这个党的总裁霍塞·费尔南多·奥索利奥·苏亚雷斯说：“东帝汶太穷了，完全独立甚至是一种空想。”这个党从印度尼西亚的古邦^①的实业家们那里得到经济援助，还得到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的支持。印尼中央政府的阿丹·马利克和苏哈托说，“东帝汶人民如果希望归并印度尼西亚的话，大门是开着的。”古邦对帝汶的广播，每天用机关枪的射击声来开始它的播音，它的威胁性的内容是十分露骨的。

这个党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东帝汶的居民未必希望同印度尼西亚合并。因为东帝汶虽然穷困，而印度尼西亚的帝汶则更加穷困，而且语言等也不一致。帝汶人民民主协会在反殖民主义这一点上同帝汶民主联盟对立而跟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相同，然而因为后者的纲领具有社会主义的激进性，所以不可能同它共同斗争。印度尼西亚政府自一九六五年九月军事政变以来，采取了极端的反共政策，对它来说，即便是一个小国，也难以默认在它的东邻成立社会主义的政权。而且，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方面也是积极反对归并印度尼西亚的。该党的纲领批评说：“只有不能够信任群众的创造性的人们，才会同意归并印度尼西亚。”但是，在拥有强大军队、人口一亿三千万的大国面前，东帝汶是非常渺小的。防止印度尼西亚的干预，成为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的首要急务。

① 印度尼西亚帝汶的首府。——译者

群众中高涨起来的独立要求

在防止印尼干预的那一方面，奥尔塔总书记的活动是相当巧妙而又积极的。他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以后访问了澳大利亚，赢得惠特拉姆工党政府的同情，通过这个国家的心照不宣的压力，事先牵制了印尼的干涉。他还访问了雅加达，从阿丹·马利克外长那里得到包含肯定了三内容的书面的东西。其内容如下：

“印度尼西亚政府遵守以下三项原则：一、各国的独立是每个民族的固有权利，帝汶也不例外。二、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无意扩大领土，或占领现行宪法中规定的疆域以外的地区。重申此意，是为了使你方明确理解我方的意图，得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愿望。由于同样的理由，帝汶独立后无论建立何种政权，都有希望同印度尼西亚政府建立友好、亲善与合作的关系。”

可是，不论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的保证是如何友好，古邦广播的语气却日趋激烈：帝汶民主联盟被说成还不如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的成员则变成共产主义者了。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在帝力组织的反对归并的示威游行，被指责接受了左派华人提供经费的帮助。印尼军方的机关报《战斗报》报道说：葡萄牙军队内的华裔军官给华裔市民进行了特殊训练，卸下武器的轮船也得到了证实。在印尼帝汶的边界地带集结了部队。

澳大利亚从工党政府的基本方针出发，虽然不能冷漠地坐视不救希望独立的帝汶，但也不愿意为了这个小岛而完全搞坏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因为地理上的毗邻，澳大利亚在印度尼西亚的投资迅速增加；对澳大利亚来说，这个国家过去也是接近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桥头堡。

另一方面，在葡萄牙本土，政局不稳，谁也没有闲暇注意远

方赔钱的殖民地。本土在政治上的不稳，也使帝汶人民延迟决定自己的路线。到一九七五年一月，传说帝汶民主联盟同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合作。这个消息最后没有得到肯定，但是人们认为它是很有可能的。理由之一是因为印度尼西亚的武装干涉迫在眉睫。然而可以推测更大的必然性是在帝汶民主联盟这一方，这是因为人民对于独立的要求日趋高涨，即使是持延期独立主张的帝汶民主联盟，在这一点上也被迫作了妥协。

倘若帝汶民主联盟的支持者是以殖民统治势力为主力这个观察是正确的话，那末这种妥协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只有通过承认人民的独立要求，统治势力才能够留在它的位置上。这样一来，独立和解放就暂时分离。独立居先，解放则被推后。

但是，帝汶民主联盟虽然为了维持他们的特权地位而作了煞费苦心的妥协，却犯了致命的错误。他们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日突然发动了袭击警察局夺取武器、占据机场和通讯设施的武装政变。接着，他们向皮雷斯总督要求立即独立并逮捕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的成员。据说，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的成员到这时已经发展到六万人，有的说是二十万人。在六十五万的人口中有二十万人成为该阵线的成员，这大概是流于稍微过高的估计，可是一九七四年六月以来，发生了一股潮流，群众的支持从帝汶民主联盟改变到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这边来，这是确实的。因此，由于害怕自己地位下降而出此暴力行动的帝汶民主联盟，就不能不要求立即独立。不能放心让左倾的本国政府来处理独立问题的那种急躁情绪，大概也发生了作用。

两大政党的对立发展成内战

从这时起，葡属帝汶进入内战状态。很明显，葡萄牙的本国

政府和当地当局都失去了解决问题的能力。葡萄牙政府八月二十二日要求联合国干预。

武装起来的帝汶民主联盟盟员，袭击华裔人民的商店，掠夺砂糖和米，焚烧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支持者的农场和村庄，战火逐渐扩大到山区。据传，该联盟发给身分证，要居民宣誓效忠，还一面高喊“团结、独立、反共”的口号，一面胡乱开枪。据九月十日澳大利亚国营广播电台广播，帝汶民主联盟同帝汶人民民主协会密切合作，签署了表示“希望归并印度尼西亚”的致印尼政府的请求书。

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立即进行反击。八月底前后，把帝汶民主联盟的部队赶到边界的山区。后者逃到印度尼西亚境内，得到印尼军队的支援而重整旗鼓，现在即将重新占领帝力。在这个过程中，有几千名帝汶人死亡，全境无法播种玉蜀黍，即将发生粮食匮乏。不知不觉地变成这样的情况：以印度尼西亚为中心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出于反共立场，支持帝汶民主联盟，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则一面同反共势力对抗，一面期待葡萄牙的左派和各共产党国家的支援。然而，从葡萄牙的本国情势和中苏对立看来，它们还很难对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的期望作出反应。澳大利亚也迫于国内问题而无法对帝汶采取积极的态度。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于十一月八日初次向印度尼西亚要求谈判，但是，他们终究要打游击战的吧。这么一来，在帝汶，从太平洋战争结束经过了三十年，那里的人民又要重新在长期动乱之中颠沛流离于山岭原野了。

（摘译自日本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潮》和一九七六年一月《中央公论》杂志 丁日初译）

蒙古建国五十周年

〔美〕W·R·希登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蒙古庆祝了建国五十周年。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在一项指示中阐述了两个最为突出的问题：民族独立和民族发展。这两个问题在今天的重要性同过去五十年来不相上下。蒙古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中苏论战开展以来）是在牺牲独立的条件下取得的。

在六十年代，蒙古日益依附于苏联。也许是由于对苏联的依赖性如此之大，以致某些作家甚至提出蒙古已经“苏联化”了。在六十年代里，蒙古党内，在亲苏的一派同主张和中国维持较密切的联系并在中苏论战中保持中立的一派之间，展开了权力斗争。结果以泽登巴尔为首的亲苏派取得胜利，泽登巴尔也就加强了他的领导地位。

在一九七四年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上层统治集团并无重大的人事变动。但在同年六月举行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十六届八中全会上，却出现了出人意料的行动，宣布泽登巴尔将出任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而部长会议主席一职，由一九七一年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新人巴泽孟和教授担任。八中全会并委任巴泽孟和为政治局委员。他是一位经济学家，四十八岁，曾在中央高级党校、乌兰巴托经济学院和蒙古国立大学执教并担任过校长。他是在提升为部长会议主席之前没有几个星期才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的。

在这些调动之前，泽登巴尔曾秘密访苏，同勃列日涅夫商谈，大概就是商讨有关这些更动的。他一回国，立即任命巴泽孟和为副主席。把一个经济学家提升为部长会议主席，大概足以表明蒙古的当务之急是经济问题。国家计委主席索德诺木被任命为部长会议副主席、接替巴泽孟和，也颇引人注目。

蒙古的政治结构是按苏联那一套“并行机构”组织的，由党监督其它团体和国家机关。所以，蒙古人民革命党控制着各级人民呼拉尔，也控制着各个部。根据最近的数字，蒙古人民革命党目前拥有党员近六万名，占蒙古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四点八。

大人民呼拉尔是蒙古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每年开会两三次，听取部长会议报告并履行正式立法程序。休会期间，由主席团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前几个月中，大人民呼拉尔颁布了新《家庭关系法》、新《劳动法》以及《提高劳动人民法律知识新纲要》。

不言而喻，蒙古照抄照搬的是苏联的那一套。最近从苏联抄来的是，蒙古在一九七二年底和一九七三年初撤消了国家监委并成立了司法部。一个庞大的苏联法学家代表团访问了蒙古并帮助它建立新机构。

总之，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泽登巴尔及其亲苏同僚已经稳住了他们的权力地位。同时他们鼓励党吸收青年工人，使党员人数迅速上升。党的统治集团之门，向着技术人员，特别是那些搞经济工作有一套的人开着。他们希望，这么一来，既可维持党内领导班子的稳定性，又能处理迫切的经济问题。

在过去几年里，蒙古日益依赖苏联的经济援助，目前它每年所接受的援助约两亿五千万美元，比蒙古每年的对外贸易总值（约为两亿美元）还多。这种援助的大部分都用于支付五年计划中的资金投资，蒙古的第五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预计的资金投资总额为十二亿美元（每年约相当于两亿四千

万美元)。此外，蒙古也作为经互会独一无二的亚洲成员国，接受东欧的援助。一些东欧国家对蒙古提供了肉类和食品加工联合厂、乳品和饲养设备、制革厂以及其它工厂等援助。蒙古还参加联合国举办的各项计划；一九七三年联合国发展计划在乌兰巴托设立了常驻代表处。

苏联和经互会国家的援助，对弥补蒙古对外贸易的巨额入超，也是有好处的。它的进口总值超过出口总值达百分之八十。此外，蒙古的出口商品中，有百分之八十是食物和其它原料；而进口商品中有百分之七十三是经过加工的食品、机器和工业消费品。特别是由于目前承担的那种促进蒙苏关系的援助和发展计划，所以蒙古永远是处于出口原料和进口成品的不利地位。在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四年间，由于出口总值比进口总值增长多一些，外贸逆差略有好转，但入超的绝对数字还是非常大的。

六十年代中期以前，蒙古很强调发展工业。但是由于同苏联的关系（包括苏联向蒙古要肉类和原料的关系）继续发展以及农业部门的失败，这项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改变。一九六六年农业投资占投资总额百分之十四，而一九七〇年则超过了百分之四十二。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继续占用投资额的大部分。

蒙古农业生产所强调的是畜牧业和支援畜牧业的饲料作物生产。官方数字表明，蒙古拥有将近两千三百二十万头牲畜，其中一大半是绵羊，其余的则是山羊、马、牛和骆驼等。本五年计划规定，到一九七五年，牲畜头数要达到两千五百万头，而且牛的比重应有所增加；但鉴于每年增加的牲畜头数均不到五十万头，所以这个指标是无法完成的了。蒙古出口商品总值的百分之三十是畜产品，而且蒙古生产的百分之六十六的肉类产品又是供应出口的，可见增加畜产量是何等的重要。官员们把未能完成畜牧

业增产计划指标的原因归之于气候恶劣，但管理失当也是一个原因。

畜群由农业社和国营农场经营。全国二百七十二个农业社经管牲畜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和满足国家统购任务所需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六。农业社生产的羊毛占全国产量的百分之九十，而其耕地则为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蒙古的三十三个国营农场拥有牲畜七十五万头。农业社是蒙古在长时间内经历了激烈的合作化运动而取得的成果。合作化是在三十年代开始的，但直到一九六〇年前后才完成。在这一时期中的大部分时间内，由于阻力重重，以致蒙古的牲畜头数减少了。党为了缓和牧民的不满，终于采取了允许私人所有权存在的灵活政策。按目前情况估计，自留牲畜之多，竟达全国总牲头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牧民也被允许拥有自留地。

政府为了促进农业社生产的发展，大搞物质刺激。例如，一九七三年提高了付给农业社的收购价格，并引导农业社把增加的收入用于兴建学校、集体宿舍、托儿所和其它公共设施。国家也在各农业社之间组织“社会主义竞赛”，以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一九七三年秋收时，组织了一次社会主义竞赛，鼓励农业工人加快收割速度。优胜社所得的奖励，包括现金六万图格里克^①、奖状和机动车辆。农牧民个人超额完成生产定额的百分之十至二十者，也有现金奖。

农业生产在蒙古经济中将继续保持其重要地位；但今后，矿产也可能成为蒙古经济的重要因素。一九七三年二月，蒙古与苏联联合成立“蒙苏有色金属企业”，对矿藏进行勘探和开发，其第一个主要规划拟在乌兰巴托以北的地区开采铜和钼。建设计

^① 蒙古的货币单位。——译者

则包括建立一个六万居民的新城，铺设一条长一百七十公里的铁路，建筑新公路，开辟水上交通线以及通过长达三百公里的输电线路把蒙古的中央电力系统和苏联联结起来等等设想。据《蒙古新闻》预计，此项新设施将使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出口总值增加一倍。蒙苏两国政府经济科技合作委员会副主席吉米道尔吉声称，“蒙苏有色金属企业”也将开发布尔汗的萤石矿。苏联的萤石需要量的半数早由蒙古提供。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业已引起政治上的依赖。尽管如此，蒙古领导人还是乐于接受这一点，以便取得经济方面的进展和社会变革，而后者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来说是同样重要的目标。

蒙古目前的人口约为一百四十万。其中百分之六十左右是二十五岁以下的人，而近年来，平均寿命已增至六十五岁。整个人口正日益向定居城市发展。乌兰巴托现有人口三十一万，约占全国人数的四分之一。然而大部分人仍为农民和牧民。

由于青年在蒙古人中占很大比例，而国家又急于控制社会主义化进程，它就特别注意教育问题。一九二四年当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识字的蒙古人还不到百分之一，而现在识字的比例约为百分之八十。蒙古现有各式学校五百三十六所，全部在学人数为二十四万七千多人，目前，正力图在本五年计划结束时，把在学人数提高到二十八万五千人。另一目标是普及七年制中等教育。整个教育制度的重点在于技术学科而不在于社会科学，但对政治学科也极为注意。体魄健全和体育运动亦属课程设置的重要项目。

蒙古对培养各经济部门的专门人材极为重视。例如在一九七四年，约有四千五百名受过高等教育和中专教育的专业人员和将近七千名职业学校和技术学校毕业的技术工人就业。在国外求学的蒙古学生也有九百名，其中八百人在苏联的各种技术

院校留学。最近又有一项革新计划，年在三十以下工龄满三年的工人可脱产学习，接受进一步的技术训练后，再返回工作岗位。蒙古人民共和国期望通过各种方式来克服技术工人的短缺。

蒙古最大的社会问题一直是公共卫生、住房建造和消费商品问题。公共卫生部部长在一九七三年年中被解职，理由是“未能完成党和政府的委托”。此后，公共卫生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数字被修改得大大降低了。国家计委主席也承认，消费品生产和基建方面存在问题。以乌兰巴托为例，只有大约百分之四十五的居民住在建筑物内；和一九六七年的百分之三十三相比已有好转，而政府承认必须作出更大的成绩。同样，公众对于消费品的质量和数量也颇有怨言。

在蒙古的艺术界和知识分子中，持不同政见的人的遭遇显然不象在苏联那么糟糕。例如一九七三年年中，在乌兰巴托初次召开的作协代表大会上，著名教授兼作家林克清因“狭隘民族主义”和其他“错误”而受到谴责，但当天蒙古通讯社还发表一篇文章，并附了他的照片，赞扬他所写的有关蒙古人民生活与斗争的历史著作。可是，似乎为了儆戒知识界的潜在异端分子，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报刊忠实地重复着苏联对索尔仁尼琴的谩骂。

蒙古和苏联的紧密联系也表现在它的外交政策上。根据一九六六年蒙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条款规定，苏联在蒙古驻有部队三万至五万人，并设置军事基地和导弹发射场。蒙古在国际组织中一直唯苏联的马首是瞻；在外交政策方面，也一直是苏联路线的应声虫。它对苏联的“亚洲集体安全”大唱赞歌。

虽然蒙古一贯保持恶劣的对华关系，这是令人毫不感到意外的，但中国人采取的态度显然不象它那么不友好。一九七四年三月，中国报刊报道了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华牺牲的蒙军人员敬献花圈的消息。而蒙古和中国之间的每年贸易额和铁

路协定都继续维持着，并在彼此的国庆节互致礼节性祝贺。中国报刊持克制态度不公开攻击蒙古。而蒙古却一贯在报刊和广播电台上攻击中国的政策。蒙古人民共和国持续地替苏联对华宣传战帮腔。

蒙古的外交政策，一方面谴责中国人并和苏联保持日益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力求和西方改善关系，使关系正常化。它现与六十五个国家有外交关系，最近又同菲律宾、泰国、西德和冰岛建交，并企图和非社会主义国家改善文化和贸易关系。一九七四年泽登巴尔对印度和伊朗进行的国事访问就是此类努力的征兆。有迹象表明，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和蒙古即将建交。

为了弥补继续出现的贸易赤字和筹措资金，通过经互会取得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援助，对蒙古来说，是不可缺少的。随着采矿新设施的发展，蒙古将日益城市化，政府必须继续对付由此产生的住房、教育和消费品等问题。在乡村地区，教育事业有所扩充，生产设备也有所改进（虽然畜牧生产仍然在极大程度上受天气的摆布），而当前这个五年计划中预定的目标看来大概是要削减的。

蒙古将继续建立和扩展国际接触，特别是在贸易方面。对于那些指责蒙古是中苏分歧中的“马前卒”的话，它是极为敏感的。蒙古的行动自由受到国家的大小、地理位置和经济处境的限制，但领导人有责任最终由自己加强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政策。这种努力的最后结果将取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否有能力克服过去那些管理不当、官僚主义的低效率等问题，以及它有无能力逐步而稳定地满足社会需要和经济要求。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冬季号加拿大
《太平洋事务》杂志 石浮、中绳合译）